

# 独立阅读

##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 2009年12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王晓渔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 编者按：

整整 20 年前，1990 年 1 月，哈维尔发表了他出任捷克总统之后的第一次新年献辞，他这样说：“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

让这位曾经三次入狱的“七七宪章”发言人的梦想，陪我们一起度过漫漫寒冬。

## 来信：

你好，提一个板式上的建议：放大字号，加大左右两侧留白空间。

现在的字号偏小，即便是125%的大小在14寸笔记本的屏幕上看着依然很小，即便在17寸普屏上依然不够理想；两侧留白空间过少，在普屏上一放大便得左右拖动浏览，很不方便。

现在一行是53、54个汉字，在17寸宽屏打开阅读器侧栏、采用合适宽度模式（这时的字体大小比较合适）阅读时头部（眼球）摆动幅度较大，建议缩减。

望能加以考虑，多谢。

——nJ.G

## 回应：

您好，对于您的意见我们作了一下尝试，但是发觉如果一旦缩小页边距，增大字体，PDF效果似乎不如以前的版本。此前我们曾尝试改版，但是因为很多读者“喜旧厌新”而中止。建议您将PDF阅读模式设置为133%大小。假如您本人仍有需求，可以发信到编辑信箱，我们会把WORD版本发给您，由您自作调整。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 目录

### 头条

---

蓝 蓝：阿克苏诗笺（组诗）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童 书：燕 舞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日 本：孙传钊：洋人新左派之舍韦纳芒

### 焦点·阿凡达

---

张无极：我们的天神何时下凡？

成 庆：阿凡达：大梦不愿觉

### 书单

---

羽 良 贾 葭 王晓渔

### 书评

---

夏佑至：民国律师业的“终极试验”

罗四鸽：不由得捏三把汗

王晓渔：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朱芳艺：在路上

凌 越：爱的实质高于信仰的规条

### 随笔

---

杨小刚：德国学生运动观察

范绅士：从蛇皮袋到黄鱼车：大陆地下书摊的春天和秋天

### 视觉

---

燕 舞：云南稻农的影像武器

### 译介

---

查尔斯·库兹曼：在德黑兰读韦伯

### 演讲

---

刘 柠：东洋出版的秘密

## HEADLINE 头条

### 阿克苏诗笺（组诗）

蓝蓝

#### 克孜尔

克孜尔，我知道你还在用你洞窟的深眼窝  
看着我。那里有  
永在的美和被摧毁的美。有你的千行泪泉  
滋养着芦苇和桑椹。你谛听  
我沉重的脚步，在北京的楼顶  
让星星和夜风向你呼唤。

你在比高更高的高处，在沙漠造成的灼热里  
收拢我的梦。当我回忆  
你就醒来，阳光照进你的眼睛  
两排黑杨闪开一条道路，在沙之书的扉页  
有两行葡萄架的诗句  
为你朗读一个女学生的情书。

克孜尔，在飞驰的六月我和你曾度过一个  
新婚的夜晚。歌声的深井  
溅落一块玉；而在褪色的经卷里  
它是一盏向你不停赞美的灯。

当岁月一层层被风沙翻过，克孜尔  
我依旧是你衰老的情人，我那走在北方的  
松弛的双腿，变得臃肿的腰身和  
含着凄凉的眼睛，还会为你而  
用来微笑或者哭泣……

#### 沙漠

沙漠。沙漠。  
看不到尽头的沙漠。似乎为了让我拥有更多  
在贫瘠情感中淘出的金子  
你在令人恐惧的辽阔里扬起了  
一柱高高的旋风。

祝福你无涯无际——除非  
我找不到你藏起的  
一小片湖水。除非

我没有认出被你全部干旱  
所虔诚供养的  
低矮的芨芨草。

风沙，永不休止地吹吧——  
在没有倒在你燃烧的怀抱之前  
我离你是如此遥远，恐惧于  
泥淖中慢慢的腐烂。那些  
电闪雷鸣的深夜，暴雨整夜哭诉  
对你的疯狂渴慕。

此时，在火焰蒸腾的戈壁沙漠  
我将要把沉重的船缆  
抛向你被吸干了全部海水的  
焦渴上。

## 戈壁夜歌

你的歌声里有我注定要失去的  
美梦，好像一个亲吻使嘴唇紧闭，  
往昔岁月的哭泣  
在你缓慢的经过里悄然响起

一定有更伟大的孤独，所以才有了星空。  
如此遥远的注视，在你说出“悲伤”这个词  
的时候，有微弱的灯火  
闪烁在露珠里。

黎明在曙光深处把我年龄的黑暗  
纺织，直到它成为一片写满诗行的  
田野，驴子和公鸡醒来  
为一个人造出新的清晨。

一定有更痛楚的爱，才会有  
干旱沙漠里的草木。  
翻越群山的风，吹开我的眼睛，  
奔跑了一天的大地使它  
平静。——哦，黑夜里忽然响起的歌声

你几乎是一次车祸的理由。在我所有死去的白昼  
你几乎是幸福的提醒。

## 苏巴什故城

苏巴什寺在一片阳光中高高地燃烧  
下面是滚滚的沙砾。  
风造出丹霞火红的力将把一切  
夷为平地，惟有

苏巴什被无尽的时光吹拂；  
夏天正午的黑暗跟随  
玄奘脚踝上的一小团火，并在信仰的跋涉中  
耐心修撰荒城的记录和  
风的呜咽。

这里是石头和沙砾的王国。  
近乎完美的磨损，把一个人内心  
所能具有的坚硬交付给砥砺；  
直到他在无限中消失，并在这消失的归还里  
伴随独行者的身影不停地  
向这里走来。

## 手鼓

脚步踏响四季的田垄。分秒有着  
均匀的足音。  
是雹子的击打，是轻雷  
在指缝中滚过——死与生的号令  
以寒颤赞美火焰，四肢的抖动  
惊醒为哭泣和歌唱  
而存在的器官。

节奏。节奏。节奏。  
飞逝的时钟！

为了获得其中片刻的停留  
诗人们恭敬地在你身上写下  
自己的名字。

## 沙雅·萨塔尔

伟大的死亡在这停步。沙雅  
你的胡杨林  
以站立不倒的姿势迎面拦住了它。

迪力木拉提，只有你知道

最初的男低音出自恐惧于人的黑暗而  
钻进萨塔尔的颤抖。  
那也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没有原因的出生。

一棵胡须花白的老树蹲踞着，你的父亲  
眺望远去岁月的身影，  
它们来自琴弓——你双手沾满的蜜？  
烈日下，恭顺的小毛驴并拢四蹄  
用沉默向我翻译  
戈壁的风，以及  
消失的塔里木河滚滚的流淌。

我在一个喉咙的沙子里  
翻拣出昔日的钥匙。那里的窗台  
还晾晒着龟兹古老的葡萄；  
一个妇人在河边呼唤淘气的孩子；  
戴花帽的青年赶来黎明的驴车  
为了把深夜捉到的闪电  
放到恋人油灯谦卑的  
光芒之中。

迪力木拉提，音乐把它膝盖的尊贵  
留给了你。  
萨塔尔把最悠长的回声  
留给了倾听，犹如  
幸福再次降临——  
在歌声缓慢的脊背上，  
失踪的人和羊群从沙丘后慢慢露了头：  
驼铃叮当，村里的炊烟  
袅袅升起，安排着开始变蓝的  
星空的顺序……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的受难曲：  
维吾尔族人迪力木拉提，歌手阿肯  
榨干的胡杨林和  
被流沙湮没的家园——  
你抱紧萨塔尔宛如抱紧众多生灵  
并把伟大的死亡纳入其中。

注：“新诗写新疆”采风团曾在沙雅的魔鬼林听民间艺术家迪力木拉提唱奏萨塔尔。

## 南疆

在一团压低的云里穿行我带着热风

那些苜蓿草和棉花地  
接近了采摘的手。  
她们和平的放生  
有着和时间搏斗的名字。

皑皑的托木尔峰竖起蓝色阴影  
笼罩并祝福火星闪亮的饕餮。  
她们围裙的果实中有磷  
杏仁里有脆弱的心，在一双  
无法了解自由的眼睛深处  
被羡慕和追问。

多浪木卡姆，麦西来甫  
强壮于死亡所渴慕的爱，新月  
安放在清真寺蓝色的圆顶。  
还有叶儿羌河把恐惧化为玫瑰的安慰  
在被沙漠包围的荒凉里，萨巴尔  
又开始了歌唱。

我几乎迷了路——在“被睫毛扫干净的”  
名叫库车的地方  
隔着汉字的拥抱  
我几乎无限地挨近了你。

注：“被睫毛扫干净”出自《福乐智慧》。

## 沙之书

因为有人走过，沙漠不再荒凉。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垂直的  
降落，在夜晚高高的宁静中  
生活的草地上开始有了露水。

孩子们白昼的喊叫在那上面  
留下了珍珠。生活是如此漫长的  
跋涉！干渴和烦恼的风  
吹光了一个人耐心的头顶。

犹如对诅咒所回答的祝福  
每一步脚下的沙子开始涌动  
直到它成为漩涡，呼唤一场甘甜的雨——

我在向大地扑去的摔疼中

拥抱了它。

## 差别

在这里  
他们受苦，他们幸福  
他们唱歌跳舞  
诉说着他们的苦难和幸福。

苦难和幸福在舞蹈和音乐里常驻。

而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人受苦  
或者幸福  
他们默不作声。  
蹲在屋檐下叹息或者忍受。

一阵风吹过，掩埋了他们的尸骨。

## 七月——给新疆

我不知道怎样遭遇了绝望，这绝望  
没有借用我的名字。没有我的性别。  
没有任何的肤色和语言。没有宗族。

甚至没有我。没有一个大脑带着它的  
对世界的认识。我只感到绝望。  
我只想睡去，沉沉不醒。

阿瓦提，美丽的胡杨和白杨  
我的嘴唇留下过的杏子的甜蜜  
拥抱我的沙漠的热风和夜空的星辰  
在这个时刻惩罚了我：  
木卡姆，你的歌声  
是多么美——有着黑色洞口的绝望！

弹琴的维吾尔老人，我还是你的客人？  
你善良的眼睛像湖水那样深。而我的心  
是沉甸甸的石头。是火山在变凉。

它没有一个可以安放祈祷的平顶。  
它没有一株用沙漠富饶的全部荒凉  
养活的细细红柳。我不是羊群  
能在热瓦普的草丛和尘土里行走，  
我没有那样的痛苦。

我曾相信星空和母亲怀抱的起伏  
并用它相信人间的道路，  
它们画出我的地平线，墨水和泪水的  
地平线——今天它像一把刀子剖开我的胸膛。

我不知道我如何遭遇了绝望，它没有声音  
没有形状。它什么都没有，除了  
塔里木，我对你的思念。什么都没有除了  
在黑暗中颤抖的歌声，  
我的因为和我的所以——给你的祝福……

2009. 7-2009. 8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mailto:susumartin@hotmail.com))

这个月我主要读张五常在大陆新出版的3本书,《五常学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多难登临录》(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11月),后来又读了阿玛蒂亚·森的一本新书,《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张五常老先生的经济学智慧,多年来一直随手可



掬,我读得开心;森的学说始终是我的热爱,他的学术语境和我们有那么多的相似性,所以我读得醒悟。

先说五常老先生的三本书:

上帝总是公平的。张五常老先生这些年日进斗金,虚名四起,必然在其他地方就出现损益。比如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颁给了威廉姆森,这个在企业合约边际理论方面卓有建设的经济学家,某些方面可能带有张五常先生的传承。所以有人说,威廉姆森获奖,心里最失衡的人,当属张五常。理论意义上看,张老是有资格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又比如,在中国经济这个庞大的纸老虎面前,多年以来

张老只能隔岸观火。说上一些无人问津的言辞。眼见着那些半桶浆糊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出入庙堂,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济学建议被提升为国家政策,张五常内心的寂寞,可想而知。

在张五常老的文字面前,我是折服的。他能把抽象的经济学现象写得活色生香,文笔轻松,但却力透纸背。华人经济学家家里,张五常不仅学术功力排在第一,经济学随笔,也是无人望其项背。但这些显然不能成为张五常的人生筹码。他时不时提到自己的书法,还有摄影。我看过老先生的书法作品,线条汪洋,不合逻辑,完全不像他的合约理论那样步步为营。当时

我就在想，能写出如此不羁汉字的人，怎么能在一个完全靠数学工具支撑的经济学世界里得有大成。张老的内心有多丰富同时又有多纠结，只有神才知道，我还看过他的摄影作品，关于这一点，他是如此自我解读的：“一个摄影家重视基础，仰慕前人，但不守常规，对光与物的看法皆与众不同”。这种才高八斗式的自我肯定，除了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老人家内心深处不媚俗，不守旧、不停滞、不自足的方法论跃然纸上。

如果说书法、摄影是张五常先生的修身之为，那么在他自己看来，经济学散文，便是他的治国平天下之举。“一个散文家影响了神州大地对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认识，也开辟了整个中国经济学散文的新天地”，这看上去像他人对张老的介绍，我却宁愿相信是老人自己亲笔所为。至少在我看来，近10年以内的张五常老，的确就是靠散文写作纵横天下，虽然当局在有些时候甚至讨厌他的文章，个别媒体似乎也想封堵他的言辞，感谢网络，尤其是感谢博客这种互动的个人言论平台，张五常的大好知识，终于还算顺畅地抵达了人们的内心。

有时候张老有些别扭地说，“张教授在经济学上的兴趣，只限于解释世事。他少用数学，喜欢赤手空拳，凭自己改进了的基础价格理论，纵横天下”，我相信这绝对是他的自我解嘲。张五常何许人也！阿尔钦的学生、弗里德曼和科斯的座上宾，一本《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曾经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如此高深学问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不依赖数学？事实上我看见他对于数学有的时候几乎就是无师自通，几年前我看见张老评价杨小凯，立意挺高，说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如何重要，但末了却加上一句，杨小凯的软肋应该是英语和数学技术不够，原因在于，数学这门技术，需要提前进行规范、专业的训练，可杨小凯年少时就入监牢，他错过了数学和英语梦想的黄金时间。

如此，张五常对数学的刻意规避，在我看来，是一种入世而不得的姿态。想想这些年来，张老蜗居香港，心系中国，大好言辞不被领导上重视，一个经济学家对世界的关注由此不得不沦落为文人的自我把玩，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想想刚刚去世的萨缪尔森，8年时间出任肯尼迪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帮助美国人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真正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子，有人这么评价，萨缪尔森通过研究、教学和著述，他对这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任何政府经济官员和很多总统。一代

风流，后无来者。可是张五常呢？不仅直到今天为止，无缘诺贝尔大奖，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减。凭心而论，华人世界出了一个张五常，对于一个经济后发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莫大的福音，可是张五常这些年却一直深处边缘，用一种传统的中国语境来讲，他似乎是真正的报国无门！

是不是传统的“学以致用”精神消解了张五常的大好学问，我们不得而知。现实情况是，他的朋友如弗里德曼、科斯一辈子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为政府献计献策，而是在学院深处深度开掘，而另外一个被张



五常尊重的大师，如米塞斯，一辈子固守清贫、固守寂寞，却建构起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沿着这个向度，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张五常窝在香港之滨，对着大陆的经济风景评头品足，实在是有点浪费才气。为什么晚年的张五常老不做深度学院研究，反而热衷于将散文、书法、摄影和中国经济的当下演进一锅烩呢？为什么明明知道他的言辞并不受当局追捧，依然喋喋不休地说那些早已被人说尽的常识呢？有时候我甚至看见他越来越优美，越来越乐观，乐观到真的以为今天中国的制度，是500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这真是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发出的最让人无语的声音。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因为寂寞，也许是张五常的背后，有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化。也许张五常老真的这么想。

说完了张五常先生，再说说我读森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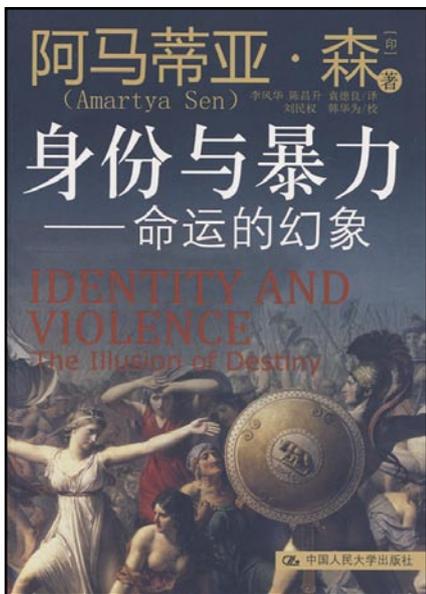
多年前我阅读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隐隐约约发现某种学术不足。后来我听见某些中国官员在不同的场合慷慨陈词，把民族、中国、东方这样一些宏大词语锁在人们的身份上，言语之间，他们理所当然把亨廷顿的观点当成了了不起的理论工具。实话实说，当这样的陈述蔚然成风，我和很多人一样，真的以为东方和西方本来就是敌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还有中国的儒家文明之间，冲突可能才

是主旋律。而所有的人们，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生活、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可能真的主要由他们背后庞大的文明体系所决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沿着亨廷顿的解释，那些看上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些以文明的不同而延伸出来的对普世价值观的排斥、甚至包括那些因为文明的冲突引发出来的战争和流血，似乎就在情理之中。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感谢阿玛蒂亚·森，他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亨廷顿的软肋，并告诉人们，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一开始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分类观，即仅仅把人置于所谓的文明圈子内，而这种文明的圈子，甚至是以宗教派别来划分的。森认为，亨廷顿的这种粗野的身份界定方法，一旦将全世界的人们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佛教世界”、“东方世界”，或者仅仅归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伊朗人”，则支配性的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了。一个极端的程度，最后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由此，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人和人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被彻底抹杀，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等诸多事物也会被间接中断，整个世界最后以文明的名义发展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格斗场。

我们的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分类，而每一种都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政治立场、个人爱好等等。森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份如此丰富，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我们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之间，如果仅仅立足于国家属性，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至少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如果立足于一种职业特征，也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可能都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这种职业上的相互认同感，能够迅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文化距离，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一个可能的产业链上进行理性的、有建设性的技术合作。而一个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高级白领，和一个生活在外省乡村的农夫，如果沿用中国城乡之间的对立身份来考察，他们可能就是一对真正的利益冲突者，但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是民俗文化的共同爱好者，当他们以文化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朋友。

多样性这个优美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森说，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在这种暴力和对抗之中，大多数人只是一种牺牲，一道祭品，事实上那些煽动家，那些将简单的身份推向极致的、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家伙，他们正在自己计算自己这一轮蛊惑，又能收获多少美钞、或者黄金。



让我们沿着森的思维模型，去看看那些与身份有关的强权，多年以来，是怎样糟蹋了我们原本丰富的生活。

现在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最大的身份陷阱，是很多人都以为，民主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仅仅属于西方人，而所谓的东方人、中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还有朝鲜人、古巴人，显然不适合民主制度。

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由于把东方和西方这种粗暴的身份定义当成了工具，竟然可以大行其道。不仅那些拒绝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振振有辞地阻挠民主，就连美国人试图向全世界传播民主理念也被他人界定为“民主强权”，界定为西方人对东方人生活与文化的一种破坏。

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制度现象或者文化现象，民主真的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吗？

博学如森这样的大学者，当然不认同这样的身份预定。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串了不起的非西方民主史料见证。诚然，雅典是西方世界最早实行民主的古老国度，但森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的选举治理经验对现在的意大利、法国甚至还

包括大不列颠英国产生过影响。相反，与雅典同时代的亚洲城邦，比如伊朗、印度，却或多或少吸收了雅典的民主经验。所以，森列出了一串东方国家与民主有关的历史掌故。

——与雅典差不多同时代的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在长达 12 个世纪的时间内，拥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一个人民大会以及由委员会提名、人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官；

——而在早期的印度，阿育王时代，这个有见识的国王曾经在公元前 3 世纪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教徒会议，他试图编纂和推行印度最早的公共讨论规则，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规则后来成为 19 世纪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早期版本；

——7 世纪早期的日本曾经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坚持“重要的决策不能单独一个人做出，必须与众人商议”，这比 13 世纪英国人签订的《大宪章》早了 600 多年，日本人当时还特别解释了多数人讨论的重要性，“当他人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

时候不要憎恨，因为人皆有心，人各有向，他是而我非，我是而他非”，后来的评论家认为，这才是日本人“逐步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曾经雄霸四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也领教过民主批评的滋味，公元前 325 年，亚历山大在印度驰骋，他问一群印度智者，为什么印度人对伟大的征服者置若罔闻，结果亚历山大听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批评之声：“亚历山大陛下，每个人都只能占有我们脚下站立的这么一块土地，你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你总是忙于无益之事，弃家远征，累己害人，你不久就会死去，那时你拥有的不过是一堆仅够埋你的泥土”。

——伟大的曼德拉对民主的追求，并非来自任何西方人的强加，曼德拉的民主梦想毫无疑问来自他的非洲家乡，来自他作为一个非洲人对民主的渴求，因为在南非的西方人多年以来一直拒绝民主，而黑皮肤的曼德拉却是南非民主的梦想家，所以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这是最纯正的民主形式，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某种等级，但是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地主还是劳工，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的聆听”；

所以森推崇托克维尔的结论：尽管美国的民主看上去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却是历史中最为连续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趋向。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世界里，民主是所有人的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将存留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身份的不同，而与民主素不相识。

森注意到，在当代世界各种身份陷阱中，有一种醒目的观点需要辨析，这就是被诸多东方人尤其是亚洲人称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依据人的身份属性来界定价值观的代表。他们认为，欧洲是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故土，而亚洲则是纪律和秩序的集大成者。由此他们向西方人宣称，西方人可以继续保持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亚洲人则更适合坚持秩序化的行动和纪律化的行为。

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当然对这样的宣言烂熟于心。李光耀是这么说的，“当我说东亚，意思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他们与东南亚明显不同，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体，虽然印度文化也强调自身的价值观”，这样的表述具有典型的身份归属，所以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强调要将亚洲价值观同抵抗西方霸权的要求联系起来，要全力抵制美国人的控制，强调新加坡“并不是美国人的一个附属国”。

应该说，正是这种基于亚洲人身份的言辞，最终形成了一部分东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1993 年，在维也纳人权会议上，相当一部分亚洲国家的代表强调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甚至警告说，如果用普遍性来掩饰或者否认多样性的事实，那么，对人权理想的普遍共识将会带来有害的结果。而中国外交部长干脆直接指出，“在亚洲人所做的优先选择中，个人必须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森显然认为这些基于身份归属的文化诊断站不住脚。现实情况是，对自由、公共讨论以及所谓人权的支持，这些年来亚洲人一点不比西方人少。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对“亚洲价值观”的判断本身具有争议，也不仅仅是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亚洲知识遗产的范围和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事实上是一批迷恋专制的官员对西方人价值观的一种人为的抵制性反应。森认为，这是一种后殖民时代亚洲人的思想延续，当诸多亚洲人热衷于谈论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亚洲的政治家需要站出来说明，我们亚洲人自有亚洲人的优点。

毫无疑问，无论是新加坡人的陈述，还是中国人多年以来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事实上都是基于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他们需要把丰富的亚洲人、新加坡人、中国人锁定在简单的地理场域、国别场域，同时有意识屏蔽掉人们其他的身份认知。但事实是，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不要权利，我不要自由。但事实是，当站在高处的政治家们呼唤人民将自己的权利让位于国家和民族，一方面这些权利很有可能已经被少数特权阶层俘获，人民成了一连串口号后面的道具，政府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大肆行伤害民众权利之事。

作为一名印度学者，森经常用自己的身份来解说学术问题。他说有一次在伦敦机场，当他出示印度护照，他遇到了检察官的怀疑，尽管他的入境单上的家庭地址是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在口岸检察官看来，这名皮肤颜色很深的印度人，不应该与文件上的三一学院院长有关系，他认为三一学院的院长仅仅是森的朋友。事实上森正是院长本身，但这样的身份疑问让森很伤脑筋，他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怎样向检察官解释，而这个犹豫的过程又被检察官发现，他开始怀疑森的身份，而当森最后确认了自己的三一学院院长身份之后，这名认真的检察官甚至再次提问，为什么要犹豫，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本人就是院长？

我当然知道森的犹豫，他应该是陷入了一种对身份的思索之中。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当人们把他人的身份单一化之后，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时候，森将身份与暴力联系起来思考。是的，当森看到那么多种族冲突，那么多宗教之间的仇杀，当森看到塔利班愤怒了撞垮了双子大厦，当他看到在中国，一张简单的户口薄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成两个等级，

他知道，这种单一的身份幻想事实上隐含着极为深厚的仇恨，这正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的源头。到处都是阻挠，到处都是隔离，人和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笑容正在从人们的脸上死去，而这一切的理由，竟然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身份真的那么单一吗？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一个农民在某些人眼里，难道就只是一个农民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父亲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流行歌曲的热爱者吗？一名日本人难道他永远只是一名侵略者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音乐家吗？一名杀人犯难道仅仅是一名杀人犯，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母亲的孝子么？一名用汽油将自己点燃的钉子户，难道她仅仅是一名暴力抗法的钉子户，难道她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母亲么，难道她就不能是勤劳的企业家么？一名穿着迷彩服、开着推土机的城管队员，难道他仅仅是一件拆迁的机器，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父亲么，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女人的儿子么？

一个人的身份本来如此丰富！当你看到孩子们溺水，你本应该想起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一名理性的经济人；当你贪污受贿，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你本应该想起你是个公民，你需要廉洁，你不能只想到你是一名大权在握无人监督的官僚。可是很奇怪，更多的时候，人们似乎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单一化。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一个存在多重身份的世界里，在单一性身份显得极为幼稚的情况下，这种对单一性身份的强调仍然大行其道。森认为，这其中一直隐含着某些权力拥有者的精心指挥。比如，一群城管队员被他们的领导们不断强化成单一的打手，以至于他们只要一上街就可以对任何在他们看来不符合规范的人大打出手；比如一群青年人被他们的管理者不断强化成单一的爱国青年，以至于他们在街头可以向美国大使馆扔石头，或者砸坏正在行使的日本车玻璃门，爱国终于成了一群流氓和无赖的遮羞布。

这正是单一身份与野蛮暴力的陷阱。多年以来，总是有人在这个领域大兴土木，他们遮蔽掉每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重新界定每个人的单一身份，并且命名为我们惟一的身份。正是在这里，卑鄙、暴力以一种看上去正确的力量趁虚而入，这个本来美丽的世界，本来宽容、丰富的生活，终于被他们弄得惨不忍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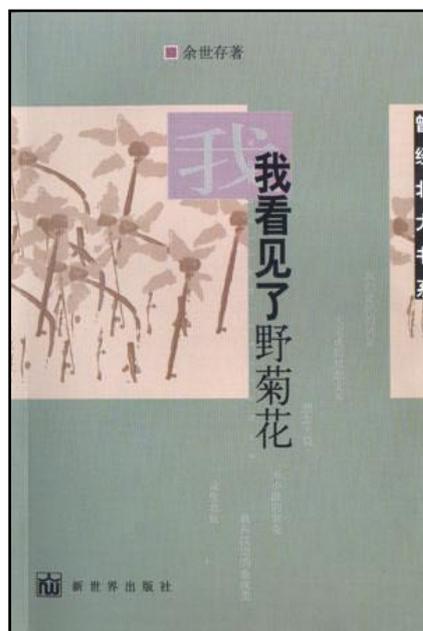
图 1 为森，图 2 为张五常。

##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mailto:zhm7976@126.com)）

选择旅途上的读物，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不久前因为要和几位朋友到南方去开会，就大为带什么书上路而犯难，临行前想起早先在网上打印的一叠资料，便匆匆带上了。当车子在冬日清晨的薄雾中前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资料中有很厚一叠是余世存先生在成都的《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曾以“浮世心思”的专栏名称行世，至今也没有成书。我在车上断续地读这些文章，分别是余世存先生关于写出当代汉语奇书《永恒的孤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的毛喻原先生，流放海外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英年早逝却留下一部小说巨制《神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9月）的云南作家孙世祥等人的论述，还有他所屡屡提及的朱学勤、吴思、刘小枫、王力雄、胡平、崔卫平、老威、李昌平、章诒和、谢泳、陈桂棣、春桃、朱大可、萧夏林，等等；而那篇《我的世纪华宴》读来最为动人，余世存写到自己浪迹京华时遇到的那些当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由此想到我数年前在极为困顿中读到了余世存先生的一部随笔文集《我看见了野菊花》（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因为这些文章之间其实是有一种血脉上的联系的。那部随笔集《我看见了野菊花》集中写到了诸多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诸如李慎之、何家栋、汪丁丁、北岛、喻希来、王小波、汪晖、王康、毛喻原、张远山等等，这册书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中存在的另一种风景，正如余世存所形容的那样：“我看见了野菊花”。后来我北上读书时，将那册书送给了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也许他也能从余世存先生的那部著作中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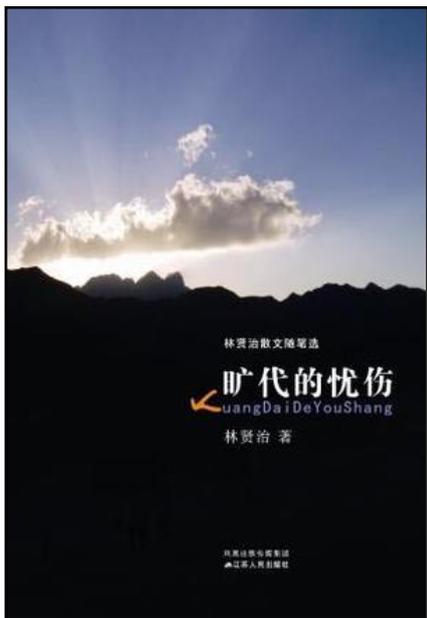
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有机会见到余世存先生，那时他的那册《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正热销南北，但余先生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好过，精神世界本就惶然不堪，身体却也时常被无理由地限制着自由。那天他得知我曾经



在南京读过书，便问我是否是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我当时很疑惑，后来余先生说那所学校有个很好的老师，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热爱读书和探求真理的学生。而直到那日我在南去的路途上读《青年作家》上的那个专栏时，才在其中的一篇文章《全部的人类经验》中得知，南京邮电大学的樊百华老师因为思想特立独行，被校方发配到图书馆，但他正好通过学生们的借书情况来判断这些学生的精神和思想状况，并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真正能够独立思考的读书种子，然后一个个地播撒到全国各地。余先生说，正是有樊百华这样的朋友存在，他才不感到真正的孤独。当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我被余先生笔下热烈而沉郁的文字所感动，更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这种高尚的精神道义所敬佩，仿佛点燃了内心里一片冬眠的火种，顿时有一种炽热的滚烫。余世存在《我看见了野菊花》的后记中说，他的梦想就是写出一部当代中国的“异行传”，而这些只能算是他所作的一些初步的尝试罢了。

恰好近来读摩罗的《西风的竖琴：摩罗文学作品自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其中有一篇《思念仁者》的文章，写到隐居内蒙古草原的民间思想家徐无鬼先生，其多年努力也是在准备写出一部《中国异端史》出来。由此便将这册书通读了一遍，其中还有关于钱理群、吴洪森等师友的文章，也非常打动人心。摩罗的文章久已不读了，当年他的那册热销的《耻辱者手记》我是翻读过的，只是觉得这些篇章之中有太过于深厚的哀怨之气，这次读这册《西风的竖琴》也还是相同，但他面对这个世界的坦诚与仁爱还是很让我尊敬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中十分难得的精神因子。读摩罗，我总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在我看来，摩罗并不具备一流的文学才华和天赋，但他曾在底层遭受心灵的折磨和创痛使得他自觉地担当了这个时代苦难的代言人，尽管可能是那么地不合适，但因为稀少而让人备感珍贵。《西风的竖琴》中的第一辑“讲述底层”便是关于这个社会苦难的集中叙述，诸如《城里的姨妈》、《我是农民的儿子》等篇章可算佳作，读来颇有辛酸之感，但翻读全书，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篇随笔长文《我的财富观》，其对于这个时代的剖析和见解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锐利的批判和清醒的思考读后让人感到安慰；我之所以喜欢这一篇，因为它还代表了摩罗对于这个世界苦难的表象背后的深入挖掘，从而在精神世界之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

林贤治先生在我的心中有一种精神使徒的感觉，他所出版的那些著作我曾用心的收藏过，那是一个人在启蒙时节最好的文学读物之一，而他所编辑的那些书刊更是提供了一种纯粹的精神食粮，诸如他所主编的一套“流亡者文丛”就是我床头的读物之一。如今我可能已不再会去追读林先生的文字，但他在我的心中仍然是值得敬佩的，我相信在很多读书人心中的这种感觉都是一致的。《旷代的忧伤：林贤治散文随笔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中的篇章我都曾断续地读过，而如今购买和重温便也带有一种致敬的意味。这册散文随笔选主要收录了林贤治先生关于人物素描的文字，其中包括鲁迅、李慎之、顾准、董乐山、遇罗克、陈寅恪、张中晓等，也有国外的米沃什、凯尔泰斯、布鲁诺·奥威尔、索尔仁尼琴、依薇、左拉、爱因斯坦、别林斯基、卢森堡、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等等，从这些人物的名单之中不难看出一个作家的阅读口味，但它更代表了一种精神谱系，那便是追求灵魂的自由与独立的高贵精神。林贤治先生说他起初打算给这册著作命名为“看灵魂”的，因为讨论灵魂，在古希腊那里不但是最常见的话题，而且还是最深邃迷人的篇章。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关注人类真正的灵魂的文章真是太少了，我们终日在粗糙的娱乐中消费光阴，却无法正视自己心灵的苍白与平庸，这其中便是缺少更多灵魂标高作为我们存在的准绳。《旷代的忧伤》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



或许是写作诗歌的根底，林贤治的散文随笔有一种诗意的况味。但恰恰是这种诗意，曾使我迅速的接近它，也导致我现在开始疏离它，因为过多的诗意会形成阅读的疲惫，从而造成一种空洞的抒情。但对于林贤治的写作，我仍然尊敬他的文字，还是因为他能够坚持一种诗意的独立，那是一种真正寻找精神真相的抒情写作，而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写作者在思考和写作之前便已经开始思考写作的限度或者表达的困境了。心灵的束缚影响了思考的独立与自由，这便是我们时代众多写作者的悲哀。林贤治的写作则不然，他能够于时代的真相中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决不人云亦云，无论崇高还是卑微，诸如他在《纪念李慎之先生》中写到十年前李慎之先生那篇名动一时的雄文，便有这样并不盲目的思考：“几年前，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李先生的一篇文章，记得展诵已是黄昏，窗外下着大雨，正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读罢颇多怅触。后来想，李先生说的唯是大实话而已，何以有如许力量？因而想及一个语境问题。其实，言说的价值有时并不在言说本身，而在它与语境所构成的关系。就说左拉，他为德福雷斯案件所作的《我控诉》，力量在哪里呢？在道德、良知和勇气那里。因为言说以外的这些东

西，正是那个语境所稀有的，所以才有了金子一般的价值。可以设想，如果换了一个语境，开放，宽容，还有左拉吗？”

我从来不隐晦我曾经受教过的那些文字，因为那些思考曾经深深地震撼过我，惊动过我，启蒙过我，也影响过我，甚至是修正了我，从而才有了今天我的思想。更为关键的一点则是，我正是通过他们，仿佛找到了一座座精神的桥梁，从而开始走向无限的广阔。因此，我向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真诚而独立思考的写作者们致敬。记得我拜访余世存先生时，他得知我自己的那册《我看见了野菊花》的命运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书房中仅存的一册又赠送给我，那是我至今珍藏的几册不多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更多的是珍藏了一种美好的情感与愿望，便是无论在怎样的个人困境之中，选择独立的思考和写作，便是选择了自我。在2009年自己出版的一册随笔集《精神素描》（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中，我在跋记的末尾引用了学者刘晓波先生在《读〈布拉格精神〉》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因为我太喜欢那其中坚定的信仰与美好的诉求，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愿意重新引用一次，献给即将到来的新年，献给我们自己：“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放弃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我要把这段话抄给妻子，让她与我的共勉。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像一对农民夫妻。”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2009年12月16日，著名的俄罗斯“休克疗法”执行者盖达尔因突发血栓病逝于莫斯科的家中。他将要安葬的公墓，就是当年的老上司叶利钦身后埋葬的所在地，后者尽管曾处在争议的浪尖上，但毕竟还能从容地在卸任之际来一番告别言说，请求俄罗斯人民原谅他当年的施政失误。相比来看，盖达尔的“突然死亡”有如他曾经推行的“休克疗法”一样，既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同时也是一种命运的解脱。

普京在他去世后，歌颂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梅德韦杰夫则只是低调地称呼他是“出色的经济学家”。这些评价并无法消除盖达尔当年执行“休克疗法”的争议，雷日科夫这样的左翼人物就认为盖达尔的这一套激进市场经济改革方案，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而对于右翼人士而言，1992年的“休克疗法”



是挽救俄罗斯不至于内战和分裂的重要一步，盖达尔是“俄罗斯的救星”。

盖达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到底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信仰者，或者只是一个技术官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或许可以窥得他的一二真面目。

他说，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不过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专制政治崩溃后，也无法确保马上就能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从这里开始，盖达尔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技术官僚本色，在专制制度崩溃与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两个选择上，盖达尔一直模棱两可，他时而认为民主作为长期目标是必然的，时而又会觉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秩序是最高价值，甚至为此破坏民主程序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暧昧态度也使得他在解释前苏联的崩溃时，对于国内的异议运动只不过轻描淡写。认为尽管当时80%的大学生都经常收听外国广播，而且“私自出版”物也开始大量传播，但是知识精英阶层的异议运动是微不足道的，对统治集团没有构成任何威胁。按照盖达尔的这一逻辑，民族矛盾、经济问题才是前苏联崩溃的根源，“道德异议”仿佛是天边的一道彩虹，美则美矣，并无任何实际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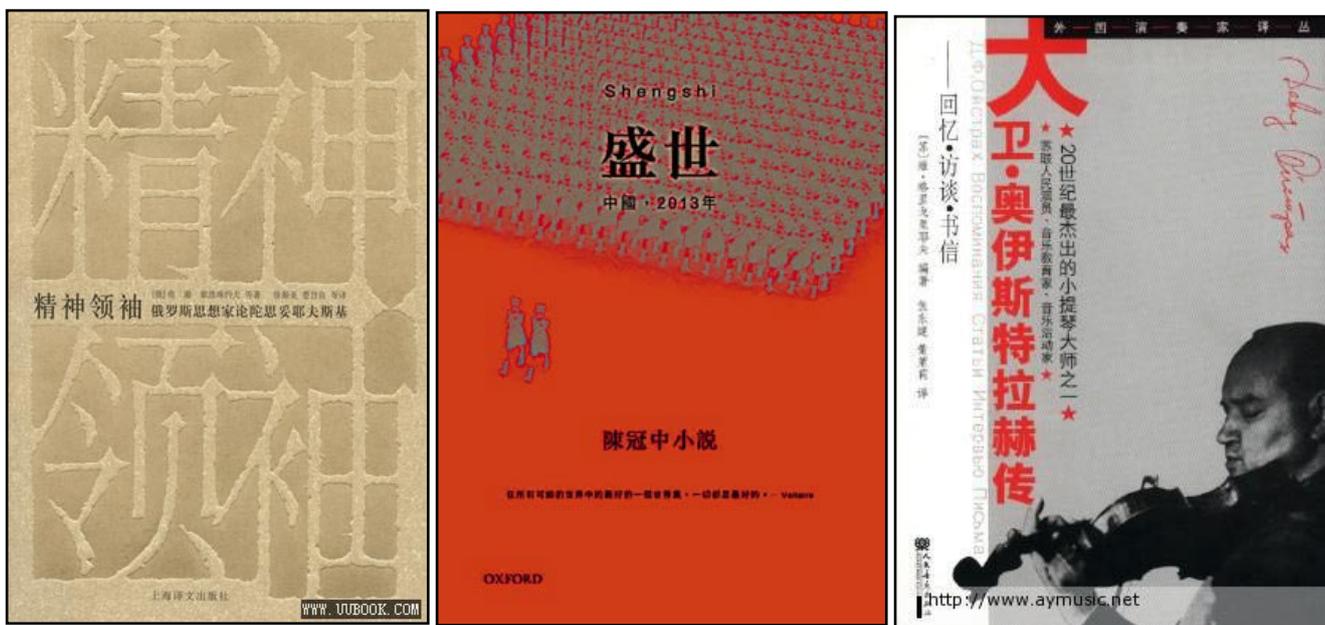
这样的态度并不稀奇，在前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博布科夫的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王仲宣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中，博布科夫谈到党在经济问题上的失策，谈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对于道德异议问题仍然是同一种态度，“嗯，那是重要，不过比起其他事情，并不算太重要。”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于，假如前苏联在1989年进入“经济盛世”，这一切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崩溃或不崩溃，是衡量一个政权的最终标准吗？这个问题在陈冠中新出版的《盛世：中国·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中也被反复地提到，“经济”和“秩序”假如能维持，这一切就正当了吗？这种政治真的就符合人类的价值吗？

这些问题，或许还是留待读者自己慢慢思考吧。

谈到俄罗斯，自然要谈到俄罗斯的思想与文化，2009年初出版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2月）中有这么一段话，是索洛维约夫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悼词：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俄国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或者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领袖。



只要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尚在继续，恶就不可避免，和恶斗争有两种权力：世俗和精神的。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

姑且不论这种世俗与精神二分法是否正确，俄罗斯思想中的这种善恶二分倾向无疑是清晰的，这也使得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阿赫玛托娃这些政治异议分子变得易于理解，只有一个模糊善恶的社会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标准浮出水面，让人目不暇接。

宗教分辨善恶，但是艺术却不总是如此，在音乐领域里，出过像卡萨尔斯那样嫉恶如仇的大提琴家，也有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而迎合纳粹的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艺术家之所以在难以分辨政治的善与恶，并不说明艺术本身就是善恶中立的，而往往是与艺术家的具体历史情境相关，使得他们摆脱不了作为一个人的局限性，或是因为无知，或是因为“原罪”。最近出版的《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传》（维格列戈里耶夫编著，焦东健 董茉莉 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6月）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我从不脱离党和国家的任务考虑自己的活动”，这位著名的“大卫王”在党和国家面前，变得有如《圣经》中的羊羔，脆弱温顺。他这么写道，“我就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接受了这种思想教育，我从不脱离党和国家的任务考虑自己的活动，党和国家的人物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重要！”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混淆艺术与政治的乐迷，但是读到此处，我的后背还是不由自主地冒出一阵寒意，仿佛“大卫王”拉的不是贝多芬，而是列宁同志的宝训。

艺术家难以分辨善恶，哲学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读过马克·里拉同志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箐 王笑红 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的朋友都很清楚，哲学家对于善恶，也未必能拥有通天慧眼，相反，许多哲学家一旦遇到政治，就马上化身撒旦，就如海德格尔、施米特。

莎迪亚·B·德鲁里曾出过一本《列奥·斯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批评斯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政治右翼之间的关联，不过那本书由于“意识形态气味”太过浓重而招人非议，尽管许多人暗地为德鲁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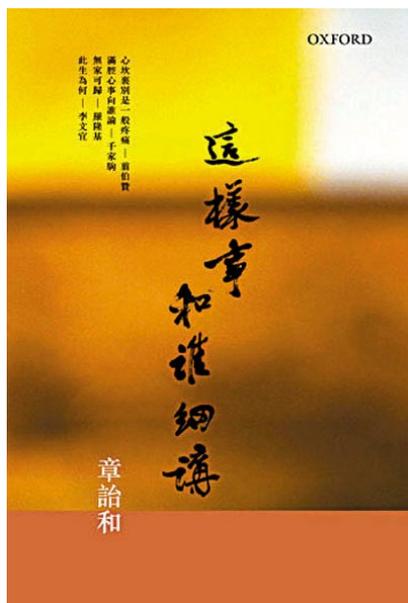
批判叫好,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那本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存在缺陷。不过最近出版的这本《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却是德里早年批判斯特劳斯的力作,获得了大量好评,就连斯特劳斯学的学生Michael Zuckert两口子都要赞不绝口,认为她提供了反施特劳斯最为清晰的理据,可见此书对于理解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关于此书,可论之处甚多,或许需要一篇更为详尽的书评方可仔细评说。

2010年在即,但我却不敢确定,前方所要面对的,是不是“盛世”大戏前的“消失的28天”。

图1为盖达尔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mailto:wxy1978@hotmail.com))



查阅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12月25日的资料：1989年，原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死；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98年，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投向柬政府……这些情节，可以组装成一部当代历史，也可以组装成一部后现代小说。

我们看不清刚刚过去的2009年，可以看看过去。章诒和先生的文章，总是让我一读三叹，《这样事和谁细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也不例外。这本书的标题，让我想起了一条著名的公务员语录——“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询问“天津市每年要偿还的公路建设的贷款量有多大”，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回答：“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此话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各级公务员纷纷掀起发明语录的活动，你追我赶、此起彼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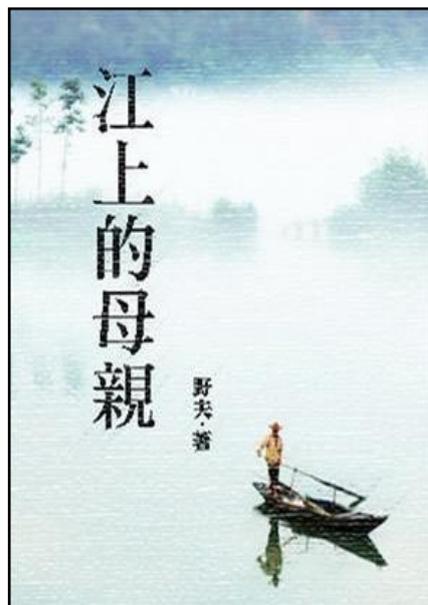
2009年的众多公务员语录，并无太多新意，“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宜粗不宜细”。当“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时候，“宜粗不宜细”依然是很多领域不可动摇的清规戒律。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也非空穴来风。在新闻界，一直有“喉

舌论”和“公器论”的分歧。就在不久前，2004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还曾发表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文章开篇就庄严宣告：“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文章接着以雄辩的语言表示：“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的媒体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利益。”如果有所谓“老百姓”不能与党保持高度一致，那说明他们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滑到了敌人的阵营，轻者说服教育，重者也不过11年面壁思过。一个不杀，以说明组织的宽大为怀。

重新回到《这样事和谁细讲》，此书收入四篇文章，主人公分别是翦伯赞、千家驹、罗隆基、李文宜。章诒和总是能在宏大叙事一笔带过之处，记下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当宏大叙事慢慢枯萎，那些细节开始复苏，生根发芽，直至成为集体记忆中不可缺少的茎干。她在自序里表示：“这类文章，未必有人阅读，遂有‘这样事和谁细讲’的感叹。”这种感叹，稍嫌悲观。“不能说得太细”绝不等于“未必有人阅读”，正是因为有太多的读者期待读到那些湮没的细节，所以才会有“宜粗不宜细”之说。《这样事和谁细讲》背井离乡，于香港出版，接着又再次偷渡，以盗版的方式出现在像我这样的读者面前。出口再转内销，充分说明不愿“细说”的只是一小撮，期待“细讲”的却是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一读三叹的我，读到《满腔心事向谁论——父母和千家驹》，屏住了呼吸，不仅是因为千家驹，更是因为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5月35日之后，李健生让女婿买两桶汽油，准备公开自绝于“人民”，在女儿、女婿的劝说之下才打消这个念头。1990年春，李健生去世，中共中央统战部发给新华社的通稿竟然表示她对一年前的政策“坚决拥护”，章诒和坚决反对，但反对无效，只能泪如雨下。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这也算是盛世里的又一个奇迹？读完这篇文章，抬起头来，只觉得照进房间里的阳光，是那么的 not real。

章诒和先生是野夫的粉丝。野夫的《是非恩仇二十年》、《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是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的当代版，只是“地下工作者”从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换成了文学中年熊召政。谁说历史已是往事？告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代代相传。相似的情节日日演、月月演、年年演，第一次是杯具（悲剧），第二次是洗具（喜剧），第三次呢？大概是餐具（惨剧）吧！这些公案的主角，除了已经去世的冯亦代生前抓紧时间“供认不讳”，黄苗子如入定老僧，一言不发，熊召政如宫中黄门，欲言又止。章诒和、野夫的文章，仅是一家之言，未必准确。如果有失实之处，大可摆事实、举例子、讲道理。可是，士林之中却有不少清流，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不够宽容。以至于章诒和不得不撰文表示：“我没错。”



只要对章诒和、野夫的文章稍有接触，就会发现两位已经宽容到“几乎丧失原则”的程度。章诒和在《卧底》最后写道：“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野夫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里表示“从来不要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难道遗忘才是宽容？那不是宽容，而是绥靖。士林清流一边号召宽容卧底以表明自己的菩萨心肠，一边又苛责旧事重提的书生以表明自己的金刚怒目，在这种双重标准下他们同时超越了卧底和书生，融菩萨与金刚于一体。对章诒和、野夫最严厉的指控不是缺乏宽容，而是指控他们进行“清算”，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这与文革手法无异。文革的“清算”动用了国家机器，章诒和、野夫的著作，常常在内地无法问世，他们不被“清算”已是万幸，哪里会去“清算”别人？遗忘历史，并不等于历史不曾发生、不会重演。

野夫还写下了一组家族史系列，讲述“我们大陆这些年”。有时，个人记忆是抵抗集体遗忘的最好方式。这些文章集结为《江上的母亲》（台北：南方家园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5月），仿佛一曲《长恨歌》——“回看血泪相和流”。我期待它早日被盗版，作为一名侵权的读者，我随时愿意向作者和出版社赔偿损失。

## CHILDREN'S BOOK 童书

燕舞(北京, yanwu1924@263.net)

必须承认，人所具有的有限性。

我一直以为我的阅读在同龄人中是相对广博和严肃的，但当我越来越多地接触一些精品童书，我就发现：真是隔行如隔山，在我长期关注的人文社科领域之外，童书出版也是别有洞天。

还是国庆长假，回湖北老家时，给上小学一年级的侄女带了一套“第一次发现”丛书（接力出版社，2009年8月）——概念、技术、动物、植物和天文地理等五大类共42册，蔚为壮观。书是从法国著名的迦利马少儿出版社引进的，据说在法国国内早就是国宝级的儿童科



普经典；加之引进后又有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和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的胞妹、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等权威人士推荐，所以我基本上就放心了。

“第一次发现”丛书最大亮点莫过于，它为了更生动形象地向2至8岁的儿童普及科学常识，加印了很多透明胶片。这样，小朋友们阅读“植物”分册中对苹果的介绍时，正面的纸质印刷页是苹果的表皮，翻开透明胶片页，就能看得到苹果的内核了，立体而直观。

我原本期待着小侄女会像我一样赞叹这套丛书的精美和新颖，会翻来覆去地摩挲着那些透明胶片页，没想到喜欢画画的她，居然拿着白纸在描摹透明胶片页上的图案。一时间，我哭笑不得，觉得似乎我“寓教于乐”的目的似乎又宣告失败了。

但回北京后仔细想想，未必我就是对的，可能我是对小侄女太缺乏耐心了，她一点点长大，我就觉得她变得越来越调皮了。当她和我抢频道要看动画片时，我索性换一台电视去看我感兴趣的电视剧。她让我教她写假期作业，有一道题目让归纳《西游记》里四位主人公各自的性格特点，她不会，我就很恼火，假期里她“霸占”电视机看各个台的《西游记》最多了一唐僧不就是“优柔寡断”吗，这都不会归纳，这电视不是白看了么？

一个小孩子，做什么都要考虑是否“有用”，这是否有必要？每次春节回家，邻居盛情邀请我作为榜样去他家里给上小学的孩子讲讲“将来怎么考上好大学”。每次介绍我都无一例外的是，“我们是看着这个哥哥长大的，他从小就很乖巧，每天傍晚放学回来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写作业”。邻居意在夸奖，可我听了心里一凉，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丰富的童年记忆，我对我上小学前看过的童书的记忆少之又少，可惜那么早就早熟得不让爸爸妈妈担心、要做个好孩子好学生。

也许是某种巧合，台湾作家很注重身体力行地参与亲子读物的写作，我随手就可以拿出《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认得几个字》（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和《学飞的萌萌》（朱天心文，谢海盟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朱天心通过自己的笔记录了女儿盟盟从出生、牙牙学语到7岁多的成长过程，还将女儿的话辑成“盟盟语录”并辅以盟盟的幼年画作。但不是每个小朋友都那么幸运地拥有一位作家老妈或作家老爸，不过不要紧，还有那么多热心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在致力于亲子读物特别是儿童启蒙读物的写作和推广。

回了北京，第一场冬雪过后的第二天，去了中国儿童中心听一个报告，一位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毕业的儿童心理专家推介的是一套四卷本“儿童哲学智慧书”（[法]奥斯卡·柏尼菲著，接力出版社，2009年10月）。最打动我的，还是这套丛书的追问。对于大多数成人而言，我们有时也会感叹于童言无忌的单纯和洒脱，我也常看到一些刚刚晋升为父母的年轻同行在MSN的签名档里收集自己孩子的无忌童言。有心收集生活中这些童言，当然是加强亲子交流的一个重要开始，但那些无忌童言仅仅只具有被欣赏的幽默价值么？我们又花了多少精力去认真倾听并努力回答孩子们的那些提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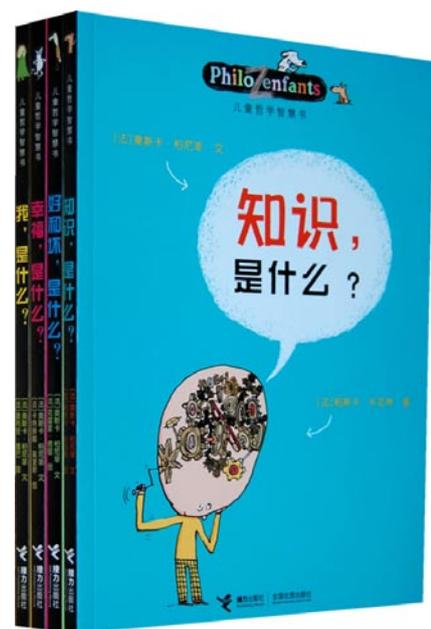
听“儿童哲学智慧书”的专家解读时，正是诺贝尔奖刚刚发布。每年到这个时候，国人就习惯性地反思中国是如何缺少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可生活中我们面对小孩子们那些貌似无聊实则颇有价值的提问时，我们表现出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耐心

吗？来自法国的畅销童书作家、教育培训人奥斯卡·柏尼菲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他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他的哲学工作室，以推广成人与儿童哲学智慧课程。收录在“儿童哲学智慧书”中的众多问题，就是奥斯卡·柏尼菲在法国南特市各小学中与孩子们交流时收集起来的，也荟萃了他在世界各地进行哲学推广的实践精华。

我一个成年人，看热播的电视剧《蜗居》时，都会疑惑，对李念饰演的“小三”郭海藻，到底应该责骂这个时代“笑贫不笑娼”，还是应该对她的悲惨命运寄予更多的同情。郭海藻的婚恋观是“好”还是“坏”呢？

比起我这样的成年人，懵懵懂懂的儿童和涉世未深的青年想来会面临更多的人生疑惑，当电视、网络等新媒介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中那些复杂现实与课堂上被灌输的那些依然宏大的理念发生冲突时，孩子们的心底肯定会泛起无数个疑问“好和坏，是什么”。像其他分册一样，《好和坏，是什么》围绕着书名中这个大主题，会分解出6个次主题。

围绕着每个次主题，又会展开完全开放式的探讨，对次主题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紧接着又来一个“对，可是”——在承认刚才给出的答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时，又对这个答案面临的悖论和困境以及各种复杂性给出提醒。如此循环往复，才试着给出作者的理解和一个并非标准的“标准答案”，并通过一个“小朋友，问这个问题，是想告诉你……”的小贴士来传递出哲学博士的善意提醒。



小朋友，问这个问题，是想告诉你……”的小贴士来传递出哲学博士的善意提醒。

就是在这样一套小书里，孩子们那些千奇百怪的“胡思乱想”被平等地尊重，哪怕是最简单最幼稚的个体思考也被赋予了合法性。以《好和坏，是什么》这册为例，它将这个大主题分解成了“法律：你能偷东西吃吗”、“友善：你应该善待别人吗”、“服从：你应该听爸爸妈妈的话吗”、“说话：你应该实话实说吗”、“自由：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和“慷慨：你应该总是帮助别人吗”等6个次主题。

在“友善：你应该善待别人吗”这个次主题下，奥斯卡·柏尼菲试着给出6个可能的答案：“应该！如果他们也善待我的话”、“应该！即使他们并没有善待我”、“应该！这样我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回报”、“不应该！因为有的人对我不好”、“只有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才会善待他们”、“应该！不然别人就不会喜欢我了”，将日常生活中友善这一行为具体而复杂的条件性和一些场合下的利益驱动特征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答案后面，作者又发出一连串的深刻追问：“你应该先善待别人，还是别人应该先善待你呢”、“你可能每时每刻都善待所有人吗”、“你也会友善地帮助很坏的人吗”、“为什么你一定要当好人呢”、“如果没有回报，你就对他们很坏吗”、“你希望别人只是为了得到好处而善待你吗”、“如果别人心情不好就对你很坏，你愿意吗”……

最后，奥斯卡·柏尼菲才就“友善：你应该善待别人吗”这个次主题给出一个善意的建议——“大人们希望你是个好孩子，善待每一个人”，而且还不忘记提醒小朋友：“不要总是被动接受别人的好，要主动善待别人”、“不要光看表面，要去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好”……

天啊，这哪里只是一套“主要面向6岁到12岁孩子的启蒙绘本”和“法国畅销多年的儿童启智读本”啊，这些带有终极性的追问分明是值得所有中国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思考的！据说，法国的高考作文题目就充满思辨性，很多题目让中国的本科生都紧皱眉头。我们成天价地鼓吹创新和发散性思维，恐怕补这一课，要从阅读“儿童哲学智慧书”开始。

既然是图文故事书，言简意赅的文字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全面的成功还少不了生动形象的图。《好和坏，是什么》中在回答“你应该听爸爸妈妈的话吗”时，很夸张地画了一个双腿倒挂在家里吊灯上的小女孩儿，对面是她那鼻子都气得鼓出一寸长的父母。看到这个造型，我会心一笑，我老家形容小孩子调皮说“坏得上墙”，看来小孩子的调皮也是全球化的教育现象啊。

而《知识，是什么》一书中，在肯定思考的重要性时，画面中的小男孩儿右手摇着大脑上的齿轮组合，这些齿轮的组合最后延伸开去撬动了地球，再形象不过地诠释了哲学博士的说法：“经过思考而得出的思想能够改变世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再次会心一笑。

《幸福，是什么》的主题应该是整套“儿童哲学智慧书”的关怀重心所在了。几年前，有出版商试图在中国推广“积极心理学”，但《幸福的方法》（[以色列]泰勒·本·沙哈尔著，汪冰、刘骏杰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0月）并没有像作者在哈佛大学主讲“最受欢迎”且“改变人生”的同名课程那样受到中国读者追捧。但我并不认为，“幸福”的真谛需要靠那些所谓成功人士布道和传递，与其听于丹那样的犬儒主义学者兜售心灵鸡汤，不如回家陪小侄女或孩子看《幸福，是什么》。

在这套图文俱佳的“儿童哲学智慧书”之外，由欧洲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意大利籍童书作家大卫德·卡利和法国籍插画家塞吉·布罗什联袂创作的温情绘本《我等待……》（谢逢蓓译，接力出版社，2009年9月），更是值得一看。同样来自法国的6卷本的“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堪与“儿童哲学智慧书”、《我等待……》媲美，著名的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讲师、专治康德的法国国家哲学博士米歇尔·毕奇和莱索邦大学进修的年轻妈妈碧姬·拉贝合作，为8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先生了这份“哲学下午茶”。



以普及哲学而知名的作家型学者周国平在“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得很好：“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的真相之探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恰是发生这种探究的最佳机会。然而，在多数人身上，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曾经有过的那种自发的哲学兴趣似乎完全消失了，岁月把一个个小哲学家改造成了大俗人”，“如果你真正爱孩子，关心他们的前途，就应该把你自己的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挫伤孩子自发的哲学兴趣，而要保护和鼓励，而最好的鼓励办法就是和他们一起思考和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使我们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

以普及哲学而知名的作家型学者周国平在“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得很好：“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的真相之探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恰是发生这种探究的最佳机会。然而，在多数人身上，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曾经有过的那种自发的哲学兴趣似乎完全消失了，岁月把一个个小哲学家改造成了大俗人”，“如果你真正爱孩子，关心他们的前途，就应该把你自己的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挫伤孩子自发的哲学兴趣，而要保护和鼓励，而最好的鼓励办法就是和他们一起思考和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使我们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JAPAN 日本

## 洋人新左派之舍韦纳芒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mailto:sunchuanzhao@yahoo.com.cn))

《“共和国”能超越全球化吗?》(《共和国はグローバル化を超えられるか》)是一本由让·皮埃尔·舍韦纳芒(Jean Pierre Chevènement, 法)、樋口陽一(日)、三浦信孝(日)三人的文章和对话构成的“新书”(平凡社新书, 2009年9月, 第一版)从著者同时也是编者三浦信孝撰写的第一部分“共和国论的思想地图——讨论的前提”来看, 樋口陽一、三浦信孝等日本学者邀请舍韦纳芒访问日本, 与舍韦纳芒讨论以及编写这本书的目的, 是为了探讨追求民主为主的法兰西共和国与追求自由为主的美利坚合众国、天皇制日本三个国家民主主义制度的异同及其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潮流前各自面临的课题。但是, 即使日本有樋口陽一、三浦信孝这样了解法国、了解法国的学术界地图的“法国通”学者, 对于一般日本读者来说, 舍韦纳芒毕竟是个很陌生的人物, 而且舍韦纳芒这次访日仅仅逗留两天, 与两位日本著者交流对话也有限, 所以这本小册子介绍舍韦纳芒生平与思想的文字, 也不得不占去其大部分篇幅, 冲淡了编者本来想表达的内容。当然, 对于我来说, 舍韦纳芒也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物, 翻了一下这本小册子, 发现舍韦纳芒也是个洋人“新左派”, 最近我阅读的焦点正好集中于洋人“新左派”, 喜欢把洋人各色各样“新左派”介绍给中国读者, 让大家了解、分辨洋货与国货的异同。



顺便说一下, 日本各大出版社出版冠以“新书”名称的“新书系列”的出版物实际是一种普及文化、学术的、便于携带, 可以放在男子衣服口袋里的小册子, 今天新书的内容五花八门, 良莠不齐, 不成系列, 书的尺寸是长 170mm、宽 105mm。比以文学类名著为主体“文库本”(长 150mm、宽 105mm)要大一点。这种最初为了启蒙初学者教养水平的准学术书(最早是 1930 年代岩波书店推出“新书”, 后来又由中央公论社“中公新书”, 比较浅显、通俗, 论题、也比较随便。现在不少大众文化热点、时事评论也都成为“新书”选题了, 出版“新书”的出版社将近 20 家吧! 像丸山真男那战前完成学术训练世代的一流日本学人 1950、60 年代还不太愿意为写“新书”, 那时代日本有教养、高雅学术人认为“新书”有失自己学术身价的著述。“新书”的篇幅翻译成中文的话, 大多在 5、6 万字左右, 日本的大学教授、评论家在谈自己读书经验的著作里, 多数号称每天能读 2、3 本书, 我想其中至少包括一些“新书”、“文库本”这样小册子。每月最畅销书, 往往从“新书”中诞生, 但是时过境迁, 几年后旧书店放在门口 100 日元(购买力相当于 1 元人民币)均一的贱货, “新书”占了很大比例。

说是“独立阅读”, 谁能做到真正独立阅读? 阅读之前谁的大脑都已经被先前阅读的文本洗脑而受感染, 难以从空白开始独立阅读。我独立阅读这小册子之前, 先在网络上搜索, 看看中文学术圈里左派洋学大师们对舍韦纳芒关注程度和反应。搜索下来, 只有一篇文章中有不到两行文字提到舍韦纳芒, 说他是“左翼民族主义”, 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影响力, “无足轻重”。发现舍韦纳芒其人其事确实是我国读书界的空白时, 我才动手写这篇介绍文章, 否则是“炒冷饭”, 不仅对中国读者、对《独立阅读》编者也是不负责任。

让·皮埃尔·舍韦纳芒生于 1939 年。15 岁时因为受到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战败的冲击, 开始倾向左翼政治、倾向于社会主义改革, 青年时代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 曾服役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这一亲身经历使得更加左倾。至今其政治左倾未曾有过动摇和改变。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个老左派, 但是如果以战前完成学术训练、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界线来划分, 相对于萨特那一世代, 舍韦纳芒只能说是与 1968 风暴时代同步的新左派。1966 年舍韦纳芒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以后一直站在社会党左派密特朗一边, 1981 年进入内阁任科学技术部部长。以后几次进入内阁曾担任教育部部长、国防部部长, 在 1997 年至 2000 年的担任内政部部长。按理来说舍韦纳芒本人在体制内掌权, 很难说是一个今天在中国很时髦的“公共知

识分子”，但是，舍韦纳芒屡任屡辞，屡辞屡任。第一次辞职后，他有个口头禅：“当部长的时候闭嘴，张嘴的时候辞职”。当与总统观点不合时，坚持自己立场走人下野，相合时走马上阵。如1991年围绕海湾战争，与密特朗意见相左，辞了国防部长。2000年因为与社会党政府在处理科西嘉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不一致而辞去内务部长一职。2003年他建立新的左翼政党“共和主义公民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et Citoyen，缩写为：MRC）。从建立新的左翼政党的角度来说，称舍韦纳芒为新左派，是恰当的。因为舍韦纳芒今天的政治活动已经脱离了社会党，许多政见都与社会党背道而驰，所以人们把他的心路历程归结为：“从社会主义到共和主义”。人们也注意到他的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反对金融全球化、肯定法国历史上殖民主义有积极内涵、主张实施限制在法国外国人的福利政策等等在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上表现除民族主义立场，所以舆论会把他的“共和主义公民运动”看作是“左翼民族主义”政党。但是，舍韦纳芒不承认自己赞成民族主义，强调自己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反对封闭的社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理主义。



舍韦纳芒不仅是个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政治家，今天还是上议院议员，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精英荟萃的国家政治学院，有15部著作，说起学术词儿来，比我国时髦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要得体。在《“共和国”能超越全球化吗？》一书中，他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立场也作了一番自圆其说的理论解释。他基本上已经不谈社会主义，光说他的共和主义，极力脱去被舆论戴上的“左翼民族主义”的帽子。他说：“nation是民主主义的基石，与民族主义无关。民族主义是nation患了病，不健康的表现。所以nation首先要是在民主主义的范畴里，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共和主义主张爱国主义，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主义把自己的nation看得高于其他nation，对其他nation摆出教训的架势。如果单是摆出教训的架势，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分清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所谓nation，首先是个公民共同体，有普遍的公意参与可能性，因此谈民主主义时候不能把nation放在一边。欧洲有30多个nation。我反对欧洲统一，并不是因为欧共体扩大了，倒是要强调不是从上述意义上的nation出发，就不能建成统一的基础。……法兰西共和国传统是nation万岁、民主主义万岁和公意万岁。这三个词是同义词。并不是第五共和国形成了共和国理念及对其认同的同一性，也不是第一至第四共和国完成了这样的理念和认同。共和国理念是从卢梭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继承来的。……人不是天生就是公民的，公民是习得的结果。大革命时期孔德塞和拉卡纳尔重视公民教育运动就是为了培养共和国公民。公共教育培养了公民批判精神、批判能力，他们成为分清善恶的公民。”学界外的人们、对法国共和主义历史渊源不了解的人，读到舍韦纳芒这段话，会不以为然地认为他是一种缺乏逻辑的诡辩。但是，笔者认为他的说法与共和主义大师穆里齐·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观点非常类似，这里要插点“延伸阅读”的话题了

1990年代人们重新关心民族主义浪潮时期出版的穆里齐·维罗里《关于爱国：试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For Love of the Com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1995）一书的宗旨是要通过“patriotism”一词的演变史来划清爱国主义（patriot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两个词的界限，划清一般被作为同义词使用的‘love of country’与‘loyalty to the nation’之间的界限。民族主义研究在追溯、判定民族主义现象和观念的时候，有两大流派，作为“近代主义”一派，把民族主义的发端界定在18世纪（大多认为18世纪后半）；而“原始主义”那派的观点是民族主义萌芽是与人类共同体产生是同步的产物。维罗里基本上持前一种“近代主义”观点。他说：爱国主义经历了多少世纪，作为唤起一个群体对支持共同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爱、对共和政体的爱一个概念来使用”；相反，民族主义是在18世纪后期在欧洲产生，为了强调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的、言语的、种族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制造出来的一个词。”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吴睿人译，上海世纪集团，2005）中，对两个概念不加区别，“从宗教和亲族意识入手，只是作为种族主义的倾向给与否定”，这种混淆起来的叙述使得著作逊色。把它们混淆不仅是历史的错误，而且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如果能真正理解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解毒剂。

维罗里指出，18世纪随着启蒙主义登场，传统的爱国主义也重返欧洲大陆。他以三位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和维

柯的观点为例来展开爱国主义在这一时代演变。他认为三人中以孟德斯鸠推崇爱国主义最为有力。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孟氏认为“patriotism”是义务，也是德行，对特定的善的爱——爱自己祖国，强调这不是基督教的宗教道德，而是一种政治德性，认为对祖国的爱，就是对平等的爱，是对捍卫自由的法制的爱；而这种政治德性正是自由的基础。因此必须建立共和政体，来捍卫自由。原始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平等的，近代以后只能通过法制和公民权重新获得这种平等。但是由于人对私利追求有非常强烈的欲望，要官员和市民实践这种德行很困难，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来抑制人们的私欲。另一方面，孟德斯鸠指出爱国与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一致的特点。因为共和政体是国民安全、幸福的源泉，所以捍卫法律、祖国是公民最大义务和责任，并不是牺牲个人利益，而是捍卫自己利益。这样，爱国也就是博爱，不仅是对父母的爱、也是对友人、同胞的爱。在标志着启蒙思想的《百科全书》中也反映出孟德斯鸠共和爱国精神强调自由的侧面对执笔者伏尔泰的影响——强调暴政下不存在爱国主义：

东洋专制统治下，那里除了掌权者的意欲外。没有任何法律；人民除了对这种意欲崇拜外，没有任何原则；除了恐怖手段外，没有任何统治原理，因为财产和生命都缺乏保障，人们都没有爱国心，甚至不知道这个词儿，而这个词却表达真实和幸福的含义。



舍韦纳芒也把爱国主义作为法国大革命、法国共和主义的遗产。但是他承认法国大革命曾企图用枪炮来输出“共和国理念”，建立一个兄弟共和国，但是又说：“罗伯斯庇尔在 1792 年反对输出革命，因为这种共和国理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应该让其他国家自己发现这些价值观，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找到自己应走的道路。”（124 页）与他以前称“法共十莫斯科的乖女儿”一样，无疑这是隐含着反美国霸权主义的意思，

樋口陽一、三浦信孝与舍韦纳芒对话时,问到：既然整个欧洲规模的共和主义实现时机尚不成熟，那么欧洲如何在民主主义范畴内实现一个中等规模的 République?目前欧洲各国公民权 (citoyenneté) 与公民道德 (civisme) 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之中？舍韦纳芒没有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而把他心目中的共和主义的基石遭受损害的根源归咎于盎格鲁·撒克逊美、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金融全球化，强调自己一直坚持政府必须运用公的权力对市场发挥作用。因为金融、资本可以自由移动、通行无阻，最终只保障了股东利益，牺牲了企业、牺牲了 natong。权力不在于人民，被金融市场操纵。而民主主义是要攻击金融资本的，目前金融资本具有权力优势。舍韦纳芒认为这 20、30 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凌驾于公民之上。经济至上主义、消费过剩、超自由的个人主义过度发展，使得民主主义内部空虚，共和主义也陷入危机之中。欧洲共同体市场主义的法令压力的结果，削弱了这样对话和讨论，当然 EU 首脑还在对话，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产生成果。舍韦纳芒认为还得依

靠民主主义从这样的危机中解脱出来。首先必须有广泛对话、讨论，不仅需要经济学家，还要经济团体、知识分子、工会通过包括电视在内各种媒体进行对话讨论。没有对话和讨论就没有共和国。日本人都说不出自民党和民主政策上的不同，就是缺乏这种对话、讨论的结果，反映出政治危机。法律的权威和共和国的权威来源于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话和讨论。

《“共和国”能超越全球化吗？》一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展开日本学者樋口陽一、三浦信孝的论述，所收文章都是提纲挈领式的短文，但是还是可以从看出他们的问题意识。他们除了关心日本天皇制下民主主义危机之外，也关心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冲突的宏观问题，与舍韦纳芒为其共和主义辩解的理论保持一定距离。他们都认 **nation** 一词在表达时候内涵往往不能保持一致（国民？国家？民族？）会产生歧义，所以都认为法国的另一位也是与社会党分道扬镳的、法国激进左翼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莱[Regis Debray，曾是格瓦拉的密友。2006年樋口陽一、三浦信孝、水林章把雷吉斯·德布莱关于共和主义文章翻译成日文，与自己相关论文编成论文集《思想としての共和国》（《作为思想的共和国》，みすず書房）出版。]的观点通过四个命题对比更清楚表达了法国的共和主义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区别，隐含地指出法国 **nation** 为何经常要和美国的“民主主义”（其实更明显地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产生冲突的原因。这四个命题：**1**，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法国共和主义政治优先，美国是经济统帅政治；**2**，国家与宗教关系，法国是国家摆脱宗教束缚拥有所有的自由，美国却是相反宗教可以不受国家权力的约束；**3**，国家与社会关系，法国共和主义国家在上，俯视社会，美国是社会压倒国家；**4**，社会与学校关系，法兰西共和国中，社会必须与学校相似，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却是学校必须模仿社会。总之，美国社会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美国城镇以教会为聚集中心，学校不仅遵循市场原理，还通过宗教信仰来保护孩子们。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个人实际是个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个体。而法国人的观念，个人是共和国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把普遍的公意放在第一位，岂能容忍个人利益优先。法国革命追求的公意下的平等共和主义屡屡要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优先的民主主义发生冲突。法国共和主义是由卢梭、贡斯当至托克维尔创建起来的。托克维尔最早看出法美两国最初政治理念之间的矛盾，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法国不是不是它的榜样，而是一个威胁。总的感觉像舍韦纳芒这种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还是喜欢宏大叙事，喜欢从体制根本谈起，这一点上与出自后学的同辈西方左派拘泥于个别事物、个别问题的差别的批判有所不同

《“共和国”能超越全球化吗？》虽然是本小册子，如果按照它提供的可以延伸阅读的线索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日本的学者思考和阅读的速度和耐力在东亚的领先地位。

[法]让·皮埃尔·舍韦纳芒(Jean Pierre Chevènement, 法)、[日]樋口陽一、[日]三浦信孝：《共和国はグローバル化を超えられるか》，平凡社新书，2009年9月，第一版。

## BOOKLIST 书单

### 羽良

#### 购书：

[美]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中华书局，2009年10月，58元。

黄冬娅：《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8月，48元。

汪东林：《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4月，20元。

[德]沃尔夫冈·迈克尔、亚历山大·佩特林、克里斯蒂安·亨克斯、克里斯托弗·爱格勒：《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能力：西欧六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比较》，重庆出版社，2009年10月，45元。

[日]广松涉著、小林敏明编《哲学家广松涉的自白式回忆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26元。

[美] 杰克·A·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35元。

陈冠中：《盛世：中国·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HK\$70元。

[匈]科尔奈：《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HK\$160.00。

[英]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38元。

[荷]洛蒂·范·德·珀尔：《市民与妓女：近代初期阿姆斯特丹的不道德职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0月，20元。

[美]詹姆斯·A·卡波拉索、戴维·P·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31元。

阚治东：《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38元。

## 贾葭

### 购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人物传》（第十二卷），中华书局，2005年9月，48元。

措如·次朗：《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月，22元。

赛仓·罗桑华丹：《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2002年1月，宗教文化出版社，12元。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20元。

苏发祥主编：《历辈班禅额尔德尼传》，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32元。

[美]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1月，54元。

### 已读：

陈庆英主编：《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月，68元。

江平：《班禅额尔德尼评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6月，8.8元。

洛桑珍珠：《雪域求法记》，三联书店，2008年11月，36元。

周炜：《活佛转世揭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1月，12.8元。

许有成：《于右任传》（第三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19元。

屈新儒：《关西儒魂——于右任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12.9元。

### 在读：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1993年，NT\$330。

## 王晓渔

### 已读：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梦幻宫殿》，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22元。

陈冠中：《盛世：中国·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HK\$70元。

## FOCUS · AVATAR 焦点 · 阿凡达

### 我们的天神何时下凡？

特约撰稿人：张无极（北京，zhangwujibook@126.com）

一个资讯飞速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容易遗忘的时代。作为艺术工作者，12年的空窗期或者说是12年的缺席，后果是非常致命的。谁也不敢去这个时间的险，除非你做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醒客和隐士。当然，这个论断并不难理解，只要去看看喧嚣尘上的这个“门”那个“门”就可以了。事实上，这些无一不在表明，大家都不甘寂寞。虽然整天价喊“我抽的不是烟，是寂寞”，“我发的不是贴，是寂寞”，只有在这个时代，在不甘寂寞中叫嚷寂寞，使得“xxx不是xxx，是寂寞”才形成我们语法里一个有着大众共鸣的古怪句式。当然，这其实不是题外话，它旨在说明，我们绝大部分人做不了陶渊明，除了没有这个时代土壤之外，也没有陶渊明的勇气，更没有此类基因。因此，我们的时代就如一个巨大的铁球滚满了尘世的喧嚣。人们惧怕遗忘，但是又快速的将一个个春笋般冒出的新事物无情的out。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时代人们也学会了遗忘，否则信息膨胀的不是时代，而是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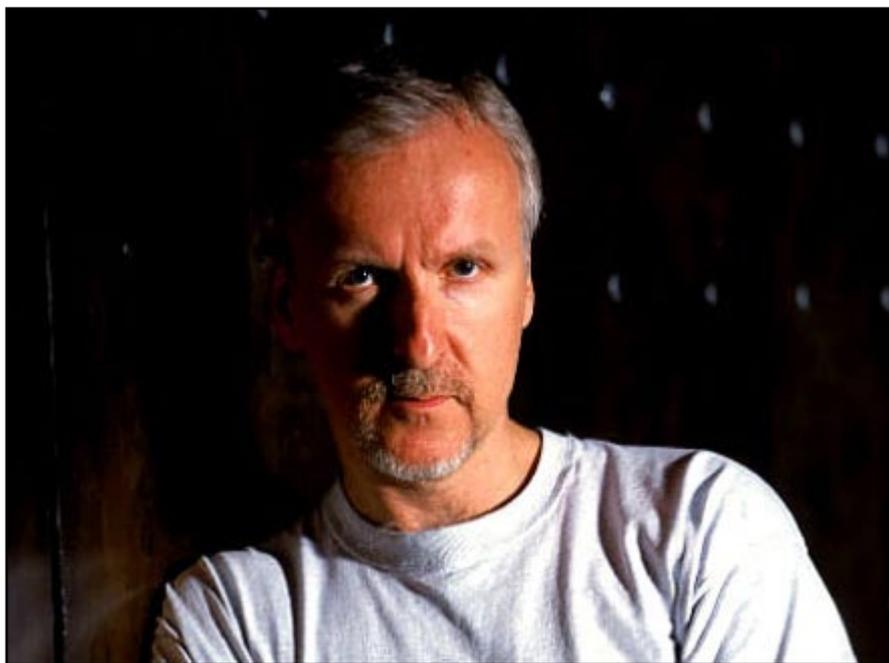
可以想象，时间的淘洗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试想一下，12年的翻江倒海早就人间换了新貌，即便当年再风光，再轰动，12年后知者何几？但是，天地之大，肯定有牛人执牛耳让我们满怀期待。卡梅隆便是一牛人。12年前他的《泰坦尼克》名利双收盆满钵盈声震全球，一举以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几近电影史上的神话。12年后，同样是这个人，犹如“王者归来”给我们带来了的是一部号称人类电影史上最伟大变革的电影，现在地球人都知道这部电影叫《阿凡达》。影片投资达到

5 亿美金,按照现在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是 40 亿元人民币之巨。有人撰文说卡梅隆如此巨大吓人的投资势必引起好莱坞新一轮的装备竞赛,显然这使得一种电影环境更趋恶化。这就是说,在将来的电影环境里,人们在“比大”中逐渐无语。事实上,陆川等人的“磕头论”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比大”的本质是什么呢?无外乎是源于人本性深处的那耽于声色的贪婪。

在观影后一次京城饭局上就有一个美女语出惊人,她言词灼灼说:这个比大心理很雄性,很 MAN。好像如此罕见的大制作还没有一个女人去作,都是你们男人的事,你们男人从小不就喜欢比那玩意吗?饭局美人的话虽说有点露骨,但可谓一针见血。据说,现在独立电影方兴未艾,大有势头昂然直上的趋势。那么在我看来,独立电影显然是一种“做小”电影。“小的有时候也未必不更智慧,更强悍”。我不得不想起前不久贾樟柯刚刚得到法国的骑士勋章这事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卡梅隆和贾樟柯是一个纬度上的两极。

不过,从个人志趣上来讲,小投资的电影更值得我的敬意。无论从内在的兴趣还是外在的素质,譬如环保,要知道我们每年要接受多少信息垃圾啊。哥本哈根大会上倡导环境的“去炭”,那么我觉得无论电影、文学等都需要这么一场运动:去炭化的清理垃圾运动,还我们一个洁净环保的人文环境。可悲的是,这个至今人们“熟犹盲肠”,视若无睹。

《阿凡达》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讲述了一个身份置换的故事。这使我不由得的想起诺贝尔奖获得者,土耳其文学巨擘帕慕克的小说《白色城堡》,在这个不满 10 万字却才情丰沛无比的小说里,帕穆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威尼斯学者在一次偶然中被俘虏,他成为一个叫霍加的土耳其人的奴隶,两人貌似非常。就在两人逐渐相处中,他们彼此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最后风云际会,霍加逃离,而威尼斯年轻学者作为替身成为霍加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这是一个吊诡且富有哲学意味的故事。卡梅隆是否读过帕慕克的小说不得而知,他的《阿凡达》和帕氏小说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一个叫杰克的半瘫青年,因为他的孪生兄弟被害身亡,他因为基因相同而被选中。他的被选择不是偶然。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卡梅隆告诉我们这个人在潘多拉星球实际上是一个拯救万物,强大无比的魅影骑士。一个人类现实的半瘫青年,在另一个世界里却是一个极大能量的王者,这就是卡梅隆给我们的一个互联网式的隐喻。



身份迷失的故事我们似乎司空见惯,身份置换的故事似乎更有趣,更有吸引力些。极具偏执气质的麦家就是热衷身份故事,多年如一日的

经营终于修得正果;当下《潜伏》谍战剧的火爆,这两个特例皆可作如是观。身份置换,其实就是一种潜伏,在电影《阿凡达》中,他既不潜伏办公室,也不潜伏国民党。卡梅隆是玩的宇宙视野,因此他安排杰克是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潜伏到潘多拉星球。毫无疑问,他的潜伏自然是一场阴谋,在最终他势必让娜维族美女 Neytin 责骂和唾弃,她向他咆哮:你骗了我。当然这个场景属于爱情的典型场景。这个电影里的爱情在前半段,让我们倍感熟悉,甚至使我们想起八十年代我们的电影里滥觞的爱情桥段。但是后半截,却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起初因为割舍不下的爱恋,杰克决定再次潜伏,当然他的潜伏手段自然是极具科幻色彩,通上电极进行 DNA 合盟就可进入另一世界。杰克在潜伏过程中他发现这个美丽的圣地不容践踏,为了让潘多拉星球不被人类殖民,他成为了人类的叛徒。是爱情,更是责任,唤醒了。这是一个可爱可敬的叛徒,他的决定得到了一些同事的呼应,他们一起加入了对抗。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这个可爱的叛徒功德圆满,拯救了潘多拉,也拯救了自己的爱情。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潘多拉星球上的稀有矿藏同样是一个隐喻,我们完全可以视为我们逐渐消失的美好事物。就如我们身边那些日益稀薄的草原、良田、壮木,当然还有我们的淳朴善良与和谐。可以这么说,杰克最后放弃了

人类的身份果决地成为纳维人，除了说明杰克本人对人类的失望之外，我愿意理解为是卡梅隆实质上对我们的一种审判。这显然是一个寓言故事。让一个叛徒成为一个背负重大使命的人，与其说“这是唯一一次让叛徒这个词成为一个褒义词”，还不如说是卡梅隆骨子里的深刻嘲讽与反思。

多年前，张艺谋从《英雄》开始掀起国人的大片热情，也培养起了国人对声色影音的强烈胃口。我们带着期待和强烈好奇走进了电影院，《阿凡达》终于还是将我们震得无语了，且不说那种极佳状态的画面清晰度和临场感，也不说那种地球人和虚拟的娜微族人的对决，单就看看那个画面本身，它的瑰丽奇幻与美妙。因此我想，我们震惊的除了技术风暴的巨大革新，应该还有这样强悍的想象力，而这可以拿来久久拷问我们：不论在电影还是在文学，我们的天神何时下凡？我们的电影和文学中想象力的匮乏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糟糕而无奈的常识之一。

在观影的全过程中，我注意到当影片中的人类骄傲而蛮横的推土机挺进神圣的美丽腹地时，当残忍的火光冲天的弹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听见了看电影的观众里有小声的啜泣，此刻，我们不仅仅为爱情而感动。如果，同样使用卡梅隆强大的技术装备，来将我们这个星球上 36 个国家同时播映《阿凡达》时产生的这种啜泣辍连一起，这也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景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哀鸣，或许这才是卡梅隆所需要的，我也相信，足使他必然要感到骄傲的不仅仅是可能几十亿的票房。因为那些只是在升腾变化的一些冰冷的数字，观影人数和票房将是一个无聊的关系链，而泪水与反思才是对卡梅隆的一种最高敬意。



图 1 为导演 James Cameron，图 2 为一拆迁现场

## FOCUS · AVATAR 焦点 · 阿凡达

### 阿凡达：大梦不愿觉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看完近三小时的《阿凡达》，走出影院，似乎刚刚从梦中醒来，清醒过后，又猛然发现，这部电影在各家影评人嘴里，几乎成为一部后现代的《红楼梦》，环保主义者看到的是大财团血腥的环境掠夺，后殖民主义者想到的是那段辛酸的各国殖民史，国内同胞或许心里惦记的是如火如荼的“拆迁斗争史”，这么一部好莱坞大片，能让各路“意识形态拥趸”都能从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敏感点，不能不让人佩服好莱坞的电影工业，能用 5 亿美元的华丽外衣完美地包裹着各种能让全世界人民欣然接受的“激进”意识形态。

关于这部电影，坊间曾有人这般评论，“矛盾的是，影片用最先进的拟真技术讲了一个反技术的故事，砸最多的美元说了一遍原始社会的美好。”此话固然在理，但是“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梦想”表面上虽然水火不容，但是将人类和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并置起来加以褒贬，去除掉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可以窥得导演卡梅隆的浓浓“后现代意味”了。

法国那位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曾模仿尼采说过一句震天动地的名言，“人已死”。他的潜台词是，17 世纪以来的“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宣告破灭，人已成为彻底无所依附，漂浮的生灵。在卡梅隆那里，人是邪恶的，满脑子金钱利益，动辄就开枪弄炮、搞拆迁，他想寻找一个参照系，来对比今天人类那无所约束的心灵。他没有去找“上帝”，却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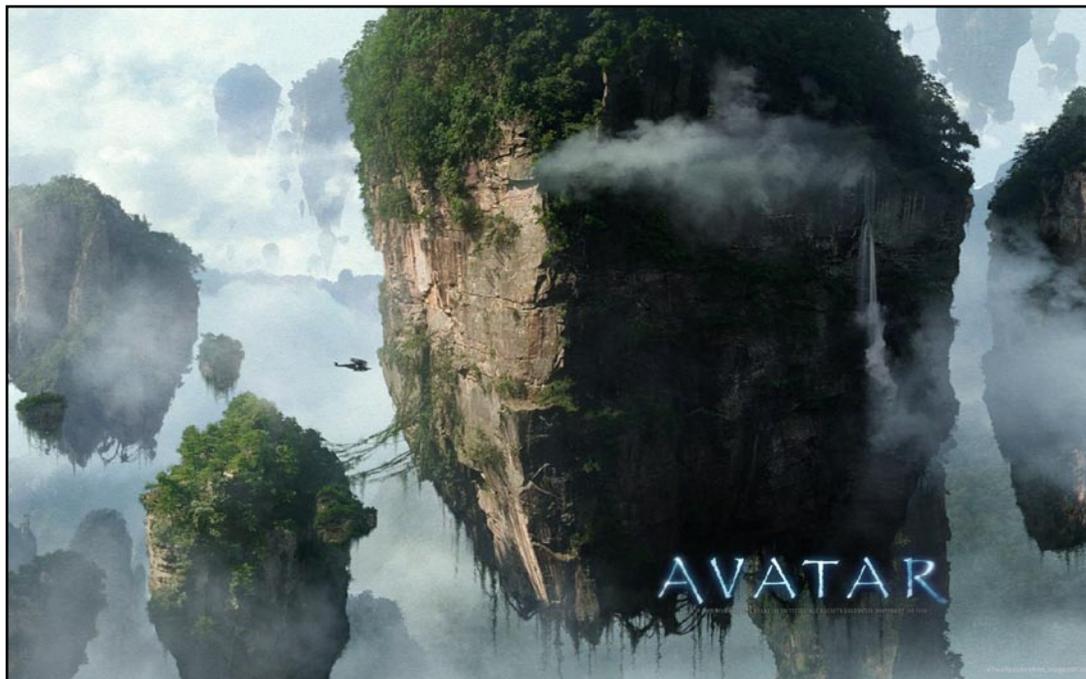
活生生造出一个潘多拉星球出来，那里的“宗教”是一种类似萨满教式的原始“圣树”崇拜，那里的人会随着巫师的咒语一起摇摆歌唱，熟悉当代传销与“疯狂英语”的对此应该不会陌生。卡梅隆用只会舞刀弄箭的纳威人对比武装到牙齿的人类，让我想起《与狼共舞》中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的对比，其潜台词不言而喻：人类是有“原罪”的。

在电影中，地球已被成荒芜，人类离开地球，四处掠夺，这样的画面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已经成为某种预言式的未来。于是带有末世论的“2012”也已隆隆出台，让中国也做了回世界的“香格里拉”。但是在卡梅隆的电影里，他所描述的最为深邃的悲剧性，其实并不是地球的终结，而是人心的末途。

用一种后现代式的观念来描述一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症候，难免看上去仍像是个童话，潘多拉星球上的丛林溪流，光影斑驳，的确是常见的童话场景，不过里面恶兽丛生，连纳威人也不免要过得谨小慎微，他们的生命哲学是来自于天地，死后复归于天地，这样的自然主义哲学，听上去颇有老庄的气质，说来也不奇怪，电影中那座悬浮的哈利路亚山，取的正是“黄山”

的意境，拿东方文化意象来补救西方精神的阙失，我们自己都早忘了，老外却还惦记着。

但是切莫因中国文化而骄傲，骄傲的人还是看看《三枪》吧，如果说《阿凡达》是用现代的技术、后现代的批判，来讲述一个“前现代的童话梦想”，《三枪》则是在用准现代的技术，“前现代”的恶俗，来讲



述一个“现代的庸俗二人转”。中国导演一方面喜欢用尊重“劳苦大众口味”的观点来搪塞任何对其“恶俗品味”的指责，不过另一方面又喜欢在国外电影节“挟洋自重”，或许这并不矛盾，毕竟西洋媒体的名气加本土的市场才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绝配，只要能让观众完成走入电影院的动作，这场商业推销大戏就已宣告成功。

还是回到《阿凡达》吧，相比首映时的“低烧”状态，近日影迷对它的追捧已呈疯狂之势，各地都出现排长龙购票的场景。我并不知道这些影迷是去寻找“殖民”、“环保”、“拆迁”这些“硬政治”的关键词，还只不过想去走进电影院作一场“美梦”而已，在这场梦中他们可以暂时逃避朝九晚五的枯燥，远离朝不保夕的担忧。

尽管这场梦，卡梅隆已经拉长到近三个小时，但对于我们，还是显得太短。

##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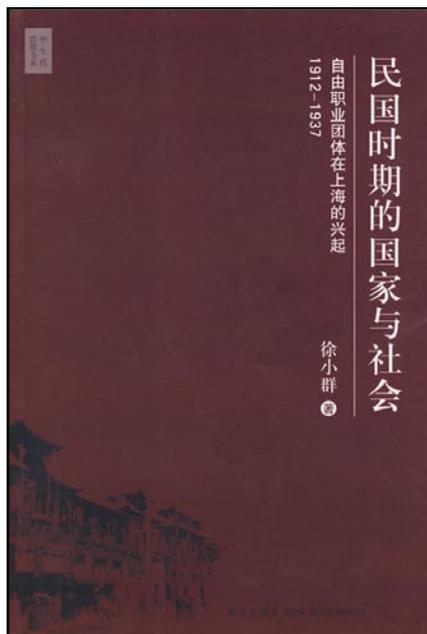
### 民国律师业的“终极试验”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

徐小群先生最近出版了《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梳理了上海律师界与民国政府的一段关系史，对今人理解律师这个群体与政府及执政党的关系，仍有启发。

其中，上海律师界与国民党的纠葛最久最深。其间既不乏互相利用的谋略，也有“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脚”这样控制与反制的互动，当然也不缺法庭剧那样轰动一时的老牌庭审桥段。凡此种种，都堪称精彩。

也合该律师和国民党之间要发生纠缠不清的关联。该党诞生不久，就碰上代理党魁被刺，正要以革命精神发动民众化悲愤为暴动的紧要关头，又碰上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律师，刻板而雄辩，怎能不让人愁而恨来。



事情要从“宋教仁遇刺案”说起。1912年，国民党赢得了年底的国会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还没有来得及组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就于次年3月被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杀手被捉拿归案，由租界工部局移交给中国当局，原本预备在上海审判厅受审，但还没来得及开庭，一个杀手武士英就神秘地死在了关押场所。

宋教仁一死，让刚刚有点眉目的政局陷入了混乱；而武士英一死，让刚刚有点眉目的宋案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宋案受到空前关注。用今天的话说，称得上是“世纪审判”，轰动程度远非今日重庆“打黑”能够比拟。另一个杀手应桂馨的家属替他请了律师。答应为他辩护的是上海律师杨景斌。他受到的压力，当然也比那些为重庆“黑社会”辩护的律师要大很多。但杨景斌没有退缩，而是尽到了一个律师应尽的职责。他首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抗议警察未经合法程序就关押了他的当事人；然后又写信给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要求程德全保证应桂馨的人身安全（因为程德全曾经说过，犯罪证据确凿，不需要律师），不会像武士英那样死得不明不白。鉴于有人提出要将宋案提交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杨景斌就给司法部打电报说，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应该就在案发地所在的上海的普通法庭审理此案。他同时要求司法部，将与宋案牵连的北京内阁秘书洪述祖从青岛的租界引渡归案。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想到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因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倒袁，被告应桂馨没等到案子开庭，就趁乱逃跑了。杨景斌碰到了大麻烦。司法部以他代理应桂馨期间侮辱法官为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

结果，是成立才6个月的上海律师公会站出来支持了杨景斌。上海周边几个地方的律师协会也开会通过决议，如果律师惩戒委员会要审判杨景斌，将派律师为他辩护。来自职业共同体的坚定的道义和技术支持，最终迫使司法部承认，对杨的指控是无稽的，恢复了他和其他6名被指为“乱党”的律师的执业资格。

这是上海律师公会第一次和国民党发生纠葛。其时，律师公会成立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资历也尚嫩。14年后，形势发生了大逆转。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4天后是上海律师公会循例举行春季大会的日期，会长通知律师们说，由于国民政府还没有制定律师法，大会要延期召开。但当天仍有67名律师到会（不足法定人数），要求对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同时到会的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出的一个代表。到场律师选出了30人的改组委员会，并邀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30人名单中挑出15个人担任正式委员（其他15人为候补）。当律师公会的会长拒绝交权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政治分会发给改组委员会一个书面指令，命令他们接管了上海律师公会。



新的律师公会执委会成员全部是国民党员。这次改组行动被徐小群称为“夺权政变”。3个月后，北京政府颁发的律师执照被宣布失效，律师必须向南京政府申领新的执照。国民党随后宣布，和其他社团组织一样，律师公会必须在国民党党部以及教育局或社会局登记注册。

向律师公会“掺沙子”绝非行业管理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但徐小群发现，历史的

复杂在于，即便是那些党员律师，也仍然“拒绝将上海律师公会变成国民党的政治啦啦队”。他认为，“公会领导人和会员中存在一种情绪，即抵制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对国民党表现政治忠诚。”

例证是律师公会拒绝在国民党党部登记。律师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保障人权，保持司法独立，律师的职业行为不容党派干涉。在给国民党上海市总部的信里，律师公会说，为了使“律师得尽量依据法律而为人权之保障”，律师执业必须独立，就如同“议员在国会中进行会议不受会外任何干涉”一样。律师公会并没有因此向执政党敞开门户，或者掉头要求律师“顾大局”，甚至变成专政机关的一部分。相反，对执政党侵犯人权，开法治倒车的野蛮行径，律师们层层防守，进行了堪称激烈的抵抗。

根据南京政府的《律师章程》，律师公会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但正如国民党对律师公会的控制有政治目的，律师们寻求司法独立、程序正义和法治的职业行为也具有政治内涵。国民党接管上海之后，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在全体大会和新的执监委员就职时，必须诵读总理遗训，向国民党党旗鞠躬。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律师们废除了这个做法，代之以向抗日烈士致敬。公会的执委、党员律师李时蕊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出党，他所属的党支部要求司法部吊销他的律师执照。接着又传出风声，说他可能被秘密逮捕。还是律师公会立刻出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一边为李的清白辩护，一边申明，坚决反对秘密逮捕和审判，从而点破了党国的计划。李时蕊安全着陆，得以继续上海的律师生涯。

律师公会职业共同体的利害的考量，超越了个人在理念和行为上的分歧。他们否决过一份要求律师学习国民党党义的提案。不久，提案的党员律师本人办案时，被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打伤，并送到南京入狱七天。律师公会照样出面，抗议政府的暴行，替他争取权益。最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被起诉。案件转移到南京审理时，当地的律师公会出面，为被打的律师提供了法律援助。

1931年1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任何以破坏（或鼓动他人破坏）公共秩序、组织集会或社团、宣扬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而危害民国者，可以判处15年徒刑、终身监禁乃至死刑。在紧急治罪法之下，戒严地区的军队和剿匪区里由县长和承审员组成的特殊法庭有权处决被告。这些伤害人权、危及法治的条款引起了上海律师公会的严重不满。该法颁布只有四个月，公会就提出修改建议，要求类似案件必须公开审判，被告必须有法律辩护和上诉的权利，而且，南京政府必须说明该法何时过期。

南京政府对律师界的呼声置若罔闻，而为了修改乃至废除该法，上海律师公会可以说不屈不挠，屡败屡战。1931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又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致电，要召集全国司法会议，废除《紧急治罪法》，解散法院以外的其他审判机构，除了士兵以外的所有被告不得由军事机构来审判。1935年，他们再次向司法部情愿，要求废除该法。

这还不算完。1936年，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不久，“救国会”七名领导人物被逮捕，其中有四名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次年6月，他们均被以《紧急治罪法》中的罪名被起诉。爱国有罪，舆论哗然，宋庆龄等人自请入狱，要和“七君子”一起坐牢。上海律师公会更是派出了21名知名律师，代表“七君子”（每人3名）出庭。这支“上海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法律辩护队”反响空前，首席律师张志让（时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1949年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撰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辩护词，称“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流传一时。

在“七君子”案中，上海律师公会没有发表过政治声明，但这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担当。他们从职业本位出发，以专业人士的姿态介入案件，将法治和程序正义的理念变成辩护词，传播广泛，堪称最佳普法教材。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公会又专门为四位会员举行了一个晚宴表示慰问。对政府晓之以法律、对同行动之以人情，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法律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和行事弹性。

“七君子案”是民国律师业的华彩乐章。我们能够得到的教益，有些是老生常谈：律师权益得不到保障，人权就会失去凭藉，法治就无法落实，任何美好的政治目标，都只是空中楼阁；有些则值得深思：民国已矣，党国依旧，今天的法律共同体安在哉？

徐小群先生说：“当政府对律师加以攻击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能否顶住压力，这是对它作为自由职业团体的生命力的一个终极试验。”这个对法律共同体的终极试验远远还没有结束。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28.8元。

图片2为遇刺后的宋教仁

## BOOKREVIEW 书评

### 不由得捏三把汗

特约撰稿人 罗四翎（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mailto:luosiling_china@163.com)）

老吴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形容我写论文的样子——“在押劳改犯”，我只能无奈地笑笑，将满肚子怨气和牢骚发泄在自己的博客上，以致于习惯一个人在博客上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写点自己的小芝麻破事，以免郁积成病。前几日，牢骚尤甚，照例跑去博客上发泄，却发现 space 因“圣诞”上不去，这让我郁闷异常。古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了不让肚皮“壅而溃”，我只好看闲书“决之使导”，然后“宣之使言”。



马达汉（C. G. Mannerheim, 1867-1951）的《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阿拉腾奥其尔、王家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和《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马大正、王家骥、许建英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后一本书基本是晚年马达汉撰写《回忆录》根据当年的日记缩编而成，内容与前一本书多重重复且缩水太多，非常不推荐）这两本书是我离开夏日塔拉草原离开皇城阿瓦和昂噶（爷爷和奶奶，裕固语）家的前一天晚上，裕固族朋友安晓冬特意来与我告别时，向我推荐的。

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天很冷，阿瓦和昂噶早早躺进羊粪烧的热炕上休息了。我坐在火炉边，看着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记录他们民族历史的一本书《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铁穆尔著，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和他多年采访整理的一本口述史《在库库淖尔以北》，这是我那一个月来断断续续看着的书。快十点的时候，介绍我去草原牧民家但却一直没见面的安晓冬，突然给我电话，要来与我告别。

在生于70年代的安晓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裕固族人的特征，实际上他的母亲是藏族人。与藏、蒙、汉通婚，在这里其实已经是普遍现象，甚至我没有发现一个家庭完全是裕固族人。他们的生活已经渐渐汉化，与西部汉族家庭区别不大。不过，当我们的话题聊到裕固族时，安晓冬掩饰不住骄傲，说：你知道马达汉吗？他最近有一本书出版，里面有一个报告是专门针对一百年前的裕固族的，我姐曾翻译过这个报告，但现在这个书的译本不是她翻译的。这本书在当当可以买到。安晓冬强调。

安晓冬的姐姐安惠娟翻译的报告《访撒里与西拉尧乎尔》，我在《皇城区志》后面附录中看到，但我没好意思向牧场兰阿瓦要这本书。因为安晓冬的推荐，回上海后我上当当买了这本《报告合集》以及《纪行》，因为我非常惊讶于一百年前马达汉对裕固族做的这份非常专业的人类学、语言学、历史文化方面的科学考察，里面有着无数冷静的表格、数字和描述，犀利又冷酷，以致于我想到他拿着头盖骨测量仪，用“诱人的匕首、镜子和鼻烟”等来奖励那些勇敢面对测量的人时，内心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却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份了解裕固族面貌的好资料，并不得不佩服他对裕固族的历史以及当时的部落、人种特征、语言的考察和分析。因为即便热情接待我的昂噶是裕固族一个部落头目的女儿，即便有着铁穆尔的书的指导，我仍没弄清楚这些部落的历史，始终也只能说非常简单的几个裕固族词语。甚至马达汉一些毫不客气的评价，也让我心虽不悦但却诚服，如：“尧乎尔（即现在的裕固族人）看来本性不好娱乐。没有看到有弹奏的乐器，甚至不跳舞，也没有合唱。”“这支小小的、迷失了的突厥部族，居住在南山脚下，缺乏精力和男子汉气魄，肯定正在走向消亡。”“尧乎尔族人口已经大大减少，现在还在快速减少。原因是死亡，还因为融入汉民血统的缘故。”

再次看完这份报告，突然感觉平日里看到的穿着民族服装戴着民族头饰整日载歌载舞的那些图像有些像周正龙的老虎照片，非常真实却找不到模特，这让我尴尬得大冷天冒热汗，几乎一个月不想再搭理冷酷的马达汉，而是兴致勃勃地与那位“与中国结婚”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一起在西域探险，直到大汗平息，才又开始看马达汉的《报告合集》和《纪行》，来满足自己的神游。

无疑，芬兰人马达汉与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样，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让人着迷的人物。先来一段网上对马达汉的介绍：他来自一个瑞典裔的贵族家庭，其家族于十七世纪移入芬兰-瑞典王国属下的一个省。随着近代以来瑞典从一个欧洲强国衰落为相对次要的国家，芬兰也于 1809 年易手成为依附于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很容易在众多研究著作中，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马达汉：前一个马达汉，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俄国军官，参加过 1904 年的俄日战争，杰出地完成了亚洲腹地的情报探险，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俄国出生入死；后一个马达汉，则在十月革命后辞去俄国军职，回国帮助芬兰摆脱俄国而独立，直至 1946 年辞去芬兰总统职位为止，他几乎都在抵抗俄国的控制和入侵的岁月中度过。

1906 年至 1908 年，由于俄国总参谋部的指派，马达汉对新疆、甘肃及内地进行了政治、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其行经路线，自俄境塔什干、安集延而至清境喀什噶尔、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再由河西、甘陕而终至北京。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呈交俄军总参谋部的长达 173 页的《上校马达汉男爵奉旨于 1906-1908 年穿越中国新疆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并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或收集的从新疆到内地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这份“引人入胜”的报告，使得马达汉回圣彼得堡受沙皇尼古拉二世召见的机会，从原定的二十分钟延长了一个小时。“这份‘殊荣’为马达汉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马达汉的这份《考察报告》是《报告合集》中两个报告之一，但其实可以说《考察报告》是他的正产品，而《访撒里与西拉尧乎尔》只是一个副产品，或是说一个伪装。他自己在正产品《考察报告》中毫不掩饰地说：“做人类学测量和搜集许多民族学实物，主要是为了当着我旅伴们的面，进而当着中国当局的面，为自己的工作增添一点学术的色彩。”而实际上的旅行目的，马达汉在《考察报告》前面详细地列出六条，以及六项特殊任务。用一句话说，就是从军事角度考察新疆和西北边境地区，以便当时的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用两个字概括，就是“间谍”。

若借用马达汉冷静客观的脑子来评价，马达汉无疑是一位冷静且强悍型的优秀间谍，且不论一路上自然环境的险恶以及缺水少粮，就他在卡加寺，动用火枪“以防凶狠的唐古特喇嘛”，在五台山不顾严密监视和阻挠执意谒见达赖喇嘛，便可想见他强悍的脸庞。而他的敬业精神可以毫不愧疚地面对任何劳动奖章，哪怕是行走在路上，他还在想着如果俄国部队进来，那座桥需要爆破，那座桥可以就近取材加固，那条道路可以不受牲口的影响。甚至到了兰州，因为碰巧过年长假不上班，他因此无法开展他的间谍工作而恼火不已。

不过，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达汉是如何进行他的间谍工作的。因为在报告正文中，只能看到一个和探险者所写并无二样的见闻录，而附录中却有着各省有关军队、兵工厂的详细数据，详细到每一个营或旗的步兵、骑兵、工兵、马兵、炮兵、军官的数量、心态和作战能力的评价，以及军工厂火药场的子弹生产数量、拥有的步枪、大炮等兵器的数量，看得人直为当时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冒冷汗。好在时过境迁，一百年后的我不必为当时的清政府捏把汗了。但最后看到马达汉短短三页的“专门的结束语”中，指出的“那些哪怕是一个最外行的和毫无经验的探险家，在中国北方各省旅行期间所目睹的中国现阶段最为鲜明、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后，又不由得再三捏把汗，特摘录如下：

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觉醒，但从目前改革（指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情形来看，这一觉醒多大程度上包括了愚昧无知的人民大众，改革行动及纸上谈兵的理论与多大程度上对国家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这一切最清楚不过的人，大概就是不仅熟悉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之脉搏的几大中心，而且还曾有机会了解中央政府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之余声勉强能到达的偏



僻省份的那个人。

在穿越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旅行中，我通过与各地当局代表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的交谈得到的印象是，……所有地方都缺乏社会政治生活，他们对与自己的钱袋子无关的事情都采取冷漠的态度。经验丰富的官老爷可以对任何事情不管不闻。因国家遭受屈辱所激起的民族自尊的爆发，对让帝国遭受那么多艰难时日的王朝的愤怒，中国北方居民对这一切非常陌生，他们对这一时的激情尚未适应。某个地方官员的贪得无厌，倘若超过传统早已约定的界限，就可以渐渐突破人民的忍耐力，并且引起动乱的爆发。这是唯一可以表达人民意志的轰轰烈烈的反抗活动。不付出血的代价，事情就得不到顺利的解决，但是，未经长期酝酿突然点燃的暴乱，注定没有前途，正如它突然发生的那样，会突然熄灭。

[芬]马汉达：《马汉达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阿拉腾奥其尔、王家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32元。

图片 2 为 1937 年的马达汉

##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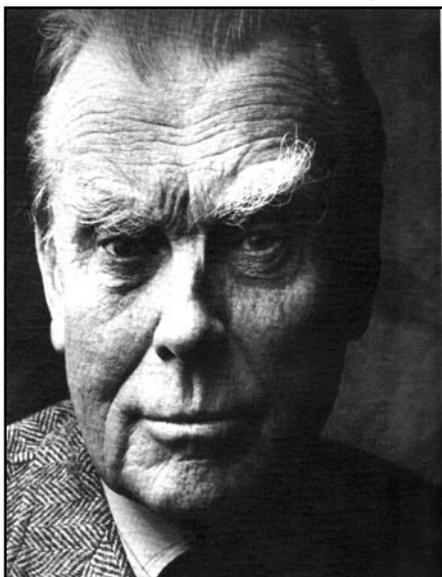
###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mailto:wxy1978@hotmail.com)）

18 世纪德国的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20 世纪捷克的哈维尔却说：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究竟是仰望天空，还是潜入井下，这取决于繁星的位置，阿伦特将繁星隐没的时代称作“黑暗时代”。我们习惯于随意使用“黑暗”一词，对立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黑暗”的壮观，触目可及。阿伦特对黑暗时代有着清晰的描述，特指公共领域消失、人类无法通过言语和行动展示自身的时代。但是，她同时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在《黑暗时代的人们》里，她认为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本雅明、布莱希特等发出启明的光亮，这是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却“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阿伦特表示，自己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哈维尔替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启明的光亮既不是来自蜡烛也不是来自阳光，而是来自井里的繁星。蜡烛照亮别人的代价是自焚（“蜡炬成灰”），阳光会灼伤人们的眼睛（参见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只有繁星发出的光亮，“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却更加永恒。

《欧洲精神》的三位主角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是黑暗时代的人们，也属于那些隐没于井下的繁星。

米沃什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拆散的笔记簿》、《米沃什词典》和诗歌已经陆续译成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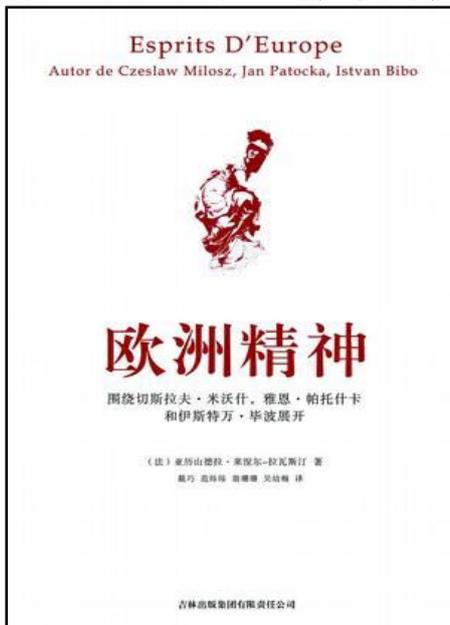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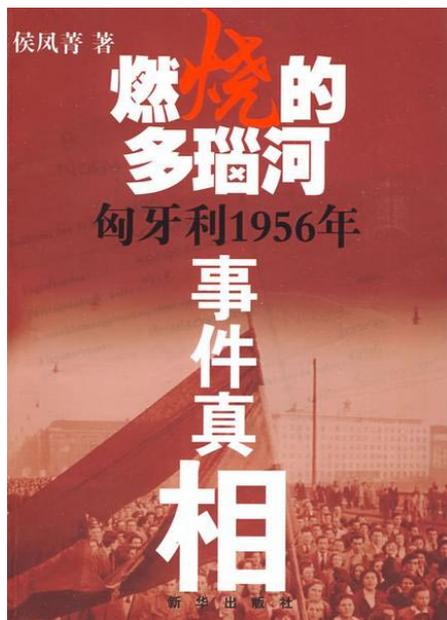


1951 年，时任波兰外交官的文学中年米沃什利用工作之便“叛国”，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大约四十年，直到波兰转型之后，重返故国。米沃什逝世后，波兰总理将这位昔日的叛国者称作“伟大的波兰人”。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帕托什卡（又被译作帕托契卡）几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绝大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由于德国入侵和“布拉格之春”，他公开执教的时间只有七年。帕托什卡没有因为处于地下状态而沉默，他不仅在家中开设私塾，传授苏格拉底的哲学，还担任了“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因此遭到逮捕，1977年3月13日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讯问之后，因脑溢血“被自杀”。帕托什卡的葬礼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惊慌失措，那一天布拉格的花店被勒令关门谢客。以“解构主义”而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将他的手稿带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种种努力，1981年，德里达到布拉格与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交流，在机场遭到“老大哥”拦截，以“交易毒品”的罪名被捕，后来在法国政府和总统密特朗的介入之下，方才得以释放。德里达以积极介入黑暗时代的方式，反驳了对于“解构”的误解，他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

毕波，我此前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在这个夏天两次与他相遇。一次在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里，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出现“布达佩斯之春”，苏联悍然干涉他国内政，派兵占领了匈牙利，当士兵冲进国会大厦，只有一个人还在坚守工作，他就是国务部长毕波（侯凤菁译为“比波”），这位部长正在起草一份抗议苏联武装侵犯匈牙利的声明，他客气地告诉士兵，自己正在处理紧急公务，士兵大受感动，竟然自动地在门外站岗，保护毕波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看到这个阿基米德式的传奇，我既对苏联士兵产生了有限的好感，他们毕竟没像罗马士兵那么二话不说、拔刀就砍，也对毕波充满好奇，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一位部长如此视死如归？直到在《欧洲精神》第二次遇到毕波，才明白他主要是位思想家，而非行政官员，支撑他临危不惧的与其说是职业伦理，不如说是价值理性。在他视死如归的细节上两本书有些出入，《欧洲精神》认为是苏联士兵无视毕波的存在，使他得以继续工作了两天。但这似乎低估了苏联士兵的能力，毕波最终被捕，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几个小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改判为终身监禁，后来遭到大赦，在监视之下度过余生。

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来自我们称之为“东欧”的地方。东欧曾经深陷黑暗时代，贡献的繁星却不只以上三颗，捷克的哈维尔、赫拉巴尔、克里玛，波兰的米奇尼克、希姆博尔斯卡、柯拉柯夫斯基，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为何同样是黑暗时代，一些地域始终有星星点灯，另外一些地域却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但是“东欧”既承接了欧洲精神又是“二等欧洲”的双重身份，为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资源和现实观照的双重视野，这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在《帷幕》里，昆德拉反复强调东欧应是中欧。这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应该视为正本清源。冷战的东/西二分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政治地理学的版图里被划到东欧的范畴里，但是从地理自身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位于中欧，如果从历史、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说，他们承接的不是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精神、波兰精神、匈牙利精神，也不限于中欧精神，而是整个欧洲的精神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会把全世界的精神成果引作自己的资源，这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中/东欧知识分子来说，欧洲精神不是他者，不是他山之石，而是内在于自身的传统。即使在“脱中（欧）入东（欧）”的时代，欧洲精神的传统也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中断，甚至他们的“带头大哥”苏联，绝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在自我认同上也“脱亚入欧”，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

法国学者拉瓦斯汀选取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作为《欧洲精神》的主角，不仅因为他们承接了欧洲精神，还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到“未来思想欧洲的开端”。昆德拉着重于把东欧从苏联的卫星国拉回到欧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倾向与认为中/东欧知识分子呈现了“另一个欧洲”。一度深陷黑暗时代的他们，拥有对欧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萨达姆的问题上，一些中/东欧知识分子支持美国的行动，与欧洲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具有很大差异。拉瓦斯汀反对轻易将他们打入另册，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对萨达姆的战争归入波兰反对希特勒或者芬兰反对斯大林

的战争系列，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是因为米奇尼克对黑暗时代记忆犹新，认为“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立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欧洲的主流知识分子把反美视为承接欧洲精神的表现，却不对一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面对极权国家的绥靖政策进行检讨，欧洲精神就会逐渐单一化。欧盟对中/东欧的接纳不是一种恩赐，而是收获，曾经黑暗时代的“二等欧洲”，将会提供“另一个欧洲”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意识，使欧洲一体化不是欧洲精神一体化，而是带来欧洲精神的多样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特征：“一方面承袭了某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不含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文化多元性的一贯坚持和尊重，同时另一方面继承了启蒙时期的普遍主义，表现为不含等级倾向的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可以这样说，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创造着具有东欧特色的欧洲精神，这种东欧特色并不固步自封于“东欧模式”，反而更具普世价值，即使遥远的东亚读者也会从中有所收获。

“纯洁性”一向为各方喜闻乐见，作家主张“清洁的精神”，政府主张“清除精神污染”。但是，米沃什有着不同的“纯洁观”，对极权的亲身体验，使得他没有天真地站在清洁、净化、纯粹、整齐的一边，他没有极权美学常有的那种“洁癖”。两个事件对他构成了挑战，一个发生在1943年的春日，一个发生在1949年的夏天。1943年，纳粹对华沙的犹太区发动武装清洗（“清洗”也是一个纯洁的词语），华沙市民故意忽略了这个让人不快的事实，甚至在战争的烟雾中愉快地荡着秋千。1949年，米沃什已经渐渐习惯于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满足于通过这种精神分裂捍卫一些道德准则，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看到几辆载满犯人的吉普车，士兵们身穿大衣，囚犯们冻得哆哆嗦嗦，他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和在烟雾中荡秋千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沃什终身的写作，都与这两个事件有关，他总能在美妙的布景之前看到更为多样的现实。他的“叛国”一度被视为污点，但是这也可以视为他对纯洁性的拒绝。几十年后，当巴尔干地区出现种族清洗，很多欧洲国家袖手旁观，米沃什却期望它们介入这场人道危机，尽管这会遭到“相信战争”的指控，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帕托什卡只比米沃什年长四岁，但是他没能与米沃什一起见证“天鹅绒革命”，而是死于非命。面对黑暗时代，离开还是留守，这是个人选择，很难进行高下之分。但米沃什们需要感谢帕托什卡们，没有这些死于非命的“次等公民”，“叛国者”永远是“叛国者”。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帕托什卡而作，其中对水果店标语的分析，已经成为著名的段落。本文标题同样来自这篇文章，“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是《欧洲精神》的译法，《无权者的权力》的一种中文译本这样翻译：“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帕托什卡拒绝像水果店经理一样，向自己无法认同的标语表示忠诚，他公开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请注意，重要的不是“反对”，而是“公开”。黑暗时代从来不会缺乏反对者，但多是腹诽或道路以目、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多也不过街谈巷议，而且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反对的声音在黑暗中进行，他们反对的对象反而站在光明之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只有启明公共领域，才能驱散黑暗。黑暗时代的人们不是“地下工作者”，反对不是“潜伏”。帕托什卡是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当时是民主国家）首任总统马萨克（通译为马萨里克）的学生，马萨克与胡塞尔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两人谊同师友。1935年圣诞节，胡塞尔将马萨克于1878年赠送的阅书架转赠给帕托什卡。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的殷海光，他们都是黑暗时代的承前启后者。

或许是有陌生化效应，此前闻所未闻的毕波最让我惊喜，我在这一部分划了最多的线。他关于精神自治、“政治文化畸变”、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看法，比如“政治歇斯底里症总是能在给群体造成创伤的历史经历中找到病因：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让我心有戚戚。《欧洲精神》的作者拉瓦斯汀把他称作“20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深刻也最怀才不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确实，毕波的很多观点都是怀才不遇。他认为，询问是多数民族首先开始压迫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首先用破坏性行动来伤害多数民族，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因为少数民族会使用“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言语来说明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多么可怕”，而多数民族则声称“这些在外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攻击者如何煽动温和的国民反对政府，以及其他一系列可憎的破坏活动”。如何从这种死结中走出？毕波指出，多数民族应当首先迈出和解的一步。重要的不是谁先伤害对方，而是谁先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这种思路对于检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

1946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论欧洲精神》的演讲，他表示：“坚持下述三个要求，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1)借以产生真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交往，生存论上爱的斗争的深度，直至此在中诚实的自我忍耐；(2)控制住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拒斥任何形态的封闭知识，使我们摆脱任何形式的立场和主义；(3)承认爱是最终的引导，但同时把不可避免的恨当作爱的条件，使之尽可能马上重新挥发殆尽。”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要求，但后来的中/东欧历史告诉我们，那些井里的繁星实践了雅斯贝尔斯的欧洲精神。

**【法】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范炜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7月，30元。**

## BOOK REVIEW 书评

### 在路上

朱芳艺 (美国·孟菲斯, fangyizhu@gmail.com)

如果说人们经常因“离终点不远了”而感到喜悦或恐惧的话,看上去已近完美的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幻觉的肥皂泡。在这个牛顿王国里,给我一个初始条件,则一切都可以被推演。若抛开决定论可能引发的自由意志问题,我们是很可以为如此一个严整的秩序世界目眩神迷的,这是理性的骄傲,真理的健康气息,几可替代上帝的力量,似乎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修补几个小缺口,然后上帝之杯就归人类所有了。而与堂皇的经典物理大厦相比,量子论更像是叛出神殿的浪子,曹天元选择量子论为题,其实是聪明之至:若是写经典物理史话,则大致是牛大师大旗一挥,麦上将又下一城,科学如何伟大光明之类……而一个没有止境的旅途,永远是比已臻圆熟的状态更值得叙述的;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往往比看上去井然自洽的体系具有更多的价值。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从其网络连载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踪,第一感觉是惊艳:中文世界里,哪里有过科普写得如此跌宕精彩呢?光的本质问题是书的第一条主线,作者以武侠小说的架势叙述了波动论和粒子论长达几百年的纷争,就像紫霞和青霞这对佛祖面前的双股灯芯一样纠缠不休,喜欢武侠的朋友们不妨把某大牛读成某大侠,把波动和粒子当成剑宗和气宗,把柏林和哥本哈根看作武当和少林,一样能读得很 high。怎么能不 high 呢,文笔既佳,情节又曲折,又很少用方程式和名词来恐吓人民群众,恰如其分的比喻,再加上中文写作里并不算普遍的幽默感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散布各处。

但若仅仅是 high 了的话,这就不过是一个点头赞许之余,看过即忘的传奇故事而已,所幸作者写的是量子论——有史以来最叛逆得不像话的科学理论:自身充满矛盾也就罢了,还与哲学、精神、意识这些科学世界里的异客暗渡陈仓。

直到 EPR 佯谬和薛定谔的猫出场的那一刻,才是该书真正进入佳境的地方,量子论开始光怪陆离,各种各样的推论无不荒诞,如多世界解释和最终人择原理。正是这只非死非活的姓薛的猫,开启了一道大门,并用它的爪子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印上了“骰子”两个大字,门里释放出的意识的幽灵在物理世界里游荡近百年,没有人不为此头痛不已。

EPR 佯谬是爱因斯坦挑头对玻尔为首的量子论进行质疑而设计的一个悖论。简言之,假设一个粒子分裂为两个,各自向宇宙的尽头飞去,那么根据守恒原理,如果一个粒子是左旋,另一个一定就是右旋。粒子的左旋与右旋的叠加状态只有波函数可以描述,除非我们进行实际观测。假设,我们逮住并观测了粒子一号,它的波函数则瞬间坍塌成确定的状态,比如说左旋,这下不得了,已经飞过不知多少光年的粒子二号正洋洋得意它的神秘状态不为人所知呢,谁知由于它的双胞胎兄弟被捕,让它也连坐了:它肯定是右旋无疑,这时,它的波函数也刷地一下坍塌了。那么,这难道不是有关自旋方向的信息通过茫茫太空瞬间传递,超过了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限速么?于是爱因斯坦同学急不可耐地给它开了张罚单。

基本粒子到底是可以预测的客观实在,还是既左旋同时又右旋,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又幻影移形到那里的幽灵?换句话说,到底是爱因斯坦,还是玻尔?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目前看来是后者正确,而物理学的严肃形象不免要泡汤。我们不得不接受实验结果,但困惑却越来越深,回答了一个问题,发现更多的问题又摆在面前。然而正是这样,只有一个永无止境的谜题才能散发出永无止境的魅力。每一个裂口都是新生的机会。科学中新理论取代旧理论,往往不是以“哦耶”开始,而是从“怎么搞的”开始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薛定谔是怎么把他家的猫放出来,追捕诡异的粒子老鼠的。放射性元素每过一个半衰期,就有一半的衰变,对于单一原子而言,它是否衰变的可能性是 50%。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个装置,里面有一只猫,如果这单个原子衰变了,就激发一个开关放出毒气把猫毒死。在我们打开装置观看之前,这只猫是出于一半生一半死的叠加状态,而当我们观察那一刻,波函数立刻坍塌成不是死就是活的本征态。那么,我们要是一直不打开看,这只猫到底是什么状态呢?

因果律,不论在哪个领域的科学家那里都是无比珍贵的,大家穷毕生精力,不就是为了理清一两个因果关系吗?而薛家



猫所触动的正是这块科学家们的心头肉。什么时候，事实到底如何跟我们是否进行观测竟然相关了呢？波函数弥散在空间里，当我们一观测，它就坍缩了，如果我们不观测，它就像幽灵一样既在此，又在彼，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在此和在彼的概率。存在与感知，难道真如伯克萊主教所说的那样相关么？我们沿着严格的理性一路走来，竟然就是为了在此处挑战理性么？

量子论的这一点思辨意义虽然不能让科学和哲学实现自古希腊以来的首次握手，但至少提醒人们，这二者不是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鉴于科学现今被描绘成冰冷狂妄的角色，我想借此表述一下个人观点。科学与人之间的隔阂日深，有两个后果，其一就是伪科学盛行，这中间是经济利益在驱动，有人卖书，有人卖核酸，有人卖远程治疗服务。其二，也是更重要的，科学世界不但与人文世界成了互相敌视的两个世界，而且科学的那个名叫科技的儿子，还成了谋杀艺术和思想的疑凶。因此，科普已成为今日科学家额外的社会责任。目前在西方有相当数量才华横溢的科普作者，他们多是科学家出身，每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就很想与人分享，这也是为什么《上帝掷骰子吗》让我有为它写点什么的冲动。其实，科学素养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惜我们的教育只集中于教授知识，而不看重思考过程的培养。而科学精神，恰恰是清醒、严谨、尊重事实的探索精神，它源自自立的思考，这是在教材上找不到的。



我一直相信哲学是与灵魂有关的，而科学，也不是完全无关。这个说法极易引发误解，首先，请不要把灵魂二字解读成栖居于肉体当中的、要么升天要么下地狱烤火，还可以在人间飘来飘去的白乎乎的一团，相信您的解读不会如此廉价。其次，我并不认为意识能够决定波函数的坍塌，进而决定物质的运动，灵魂至少是建立在足够复杂的宏观结构上

（比如人类中懂得思想的那一部分），是比宏观还要宏观的，而不可能在微观层面发生作用。事实上，量子论正是因为与观测、或者说与意识的这一点联系，已经被伪科学的大师们无数次滥用了。

我们或许可以辩称，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到底是量子论正确还是相对论正确，薛家猫到底是死是活，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外部世界到底是什么，与我的灵魂又有何干呢？这些外在之物如何能给予内心的救赎？

然而在精神世界的暴风雨中间（如果您有过体验的话），当您回头瞥一眼这个有序的世界，是否有一丝阳光的气息透进您的心底呢？这诚然不像经典物理时代那样，一切物质皆顺从既定的轨道而行，然而严谨的理性仍然是科学世界不可辩驳的国王，只是，如今已不再能够在理性的统治下，于某个水草丰美之地安居乐业了，而需要跟着这个摩西出埃及，在不确定性中徘徊，在对过去的否定中享受冲浪的乐趣，当然也得屡次抛弃身后令人舒适的世界——那些已经近乎完备的体系。我希望可以宣称灵魂并非懒惰，只有探险的旅程才是情志所寄，而科学是以这样的方式与灵魂相关。谁不渴望一个终点，一个圆满之境？但它若有一天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大概会像每天跟上帝祈祷的教徒忽然接到上帝的电话要来共进早餐一样惊骇。而路上，才是应得的归宿，正如曹天元在《上帝掷骰子吗》中所说，怀着“深深的激动和无尽的好奇”。

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定价：3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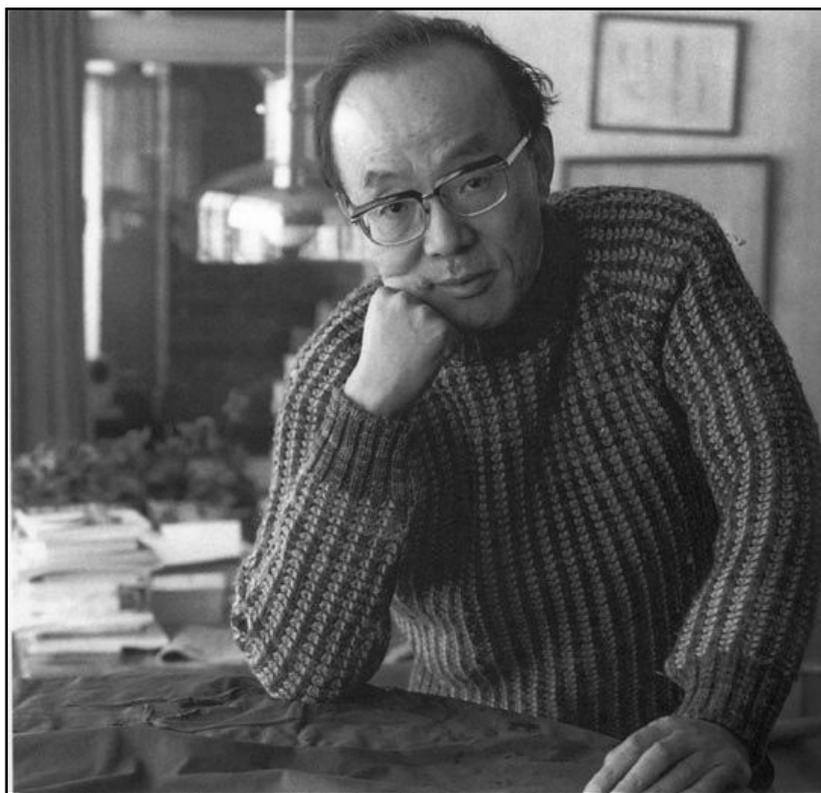
图片为薛定谔与中国物理学家彭恒武在都柏林，旁边还有一条狗，不是薛定谔的猫。

## BOOK REVIEW 书评

### 爱的实质高于信仰的规条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yahoo.com.cn](mailto:iamlingyue@yahoo.com.cn))

前年香港书展我给台湾作家骆以军做过一个专访,骆以军在谈起他们这一辈台湾作家所受的影响时,特别提到过一长串日本作家,其中就有远藤周作,而那时作为日本当代最重要作家之一的远藤周作作品在内地一本还没有出版过,我因此还特意



到香港书店购买了远藤周作的中短篇小说集《海与毒药》,内中收有包括标题小说在内的十四篇短篇小说。今年夏天,远藤周作两部重要作品《深河》和《沉默》被介绍到内地,自然引起我的兴趣。

《沉默》是远藤周作 1966 年 43 岁壮年时出版的,《深河》的出版则是在远藤晚年的 1993 年。两部小说堪称远藤的扛鼎之作,而且都和远藤毕生关注的信仰问题有关。《沉默》主要讲述的是,德川幕府禁教时代,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洛特里哥偷渡日本,暗查恩师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弃教一事。在传教与寻访的艰难过程中,洛特里哥经历了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等一系列的冲突。写作的缘起则是因为远藤在研究耶稣会史料时,发现如吉次郎或洛特里哥等判教人物都受到普遍的蔑视和憎恨,而对于这种蔑视,远藤以小说家的敏感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认为就是这些被蔑视的弃教人物内心也一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挣扎

和痛苦,这种挣扎本身就是值得尊重和书写的,因此远藤要替他们说出“被埋在沉默的烟尘下的痛苦心情”。

当然,小说中“沉默”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神的沉默”,对于神的沉默的诘问贯穿小说始终,当洛特里哥刚偷渡到日本,因为饥饿拔下一根草,在口中拼命咀嚼时,压抑着从心底里冒上来的念头:“当然,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对神的绝望,可是,神为何沉默,我不懂。”当洛特里哥被抓住后关进洼地的小屋里,他又一遍一遍地祈祷:“主啊!你为何沉默呢?你为何一直沉默呢?”这诘问一直伴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直至结束。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远藤借助人物之口依旧给予相似的控诉:“主啊,我恨你一直都保持沉默。”可是远藤自己对这诘问的解读则比表面的复杂得多,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对我们来说要证明神的存在是至难的,可是,我一直认为神透过我们的人生悄悄地作用着。神对《沉默》中主角的心声虽然没有作直接的回答,但并不能因此就说神像冰一般顽固地保持沉默,而是以肉眼看不到的‘作用’回答。”当然这解释本身也透露出远藤关注的中心问题也许和其他的作家有所不同,对于文学,尤其是形式化的文学,他谈论得不多,尽管《沉默》在小说结构上也花了一番心思:小说前四章每一章是洛特里哥的一封信,以第一人称表述,后五章则是以第三人称客观的角度展开描述,可是这种小说结构还远远谈不上新奇。那么“文以载道”也许正是远藤主要的创作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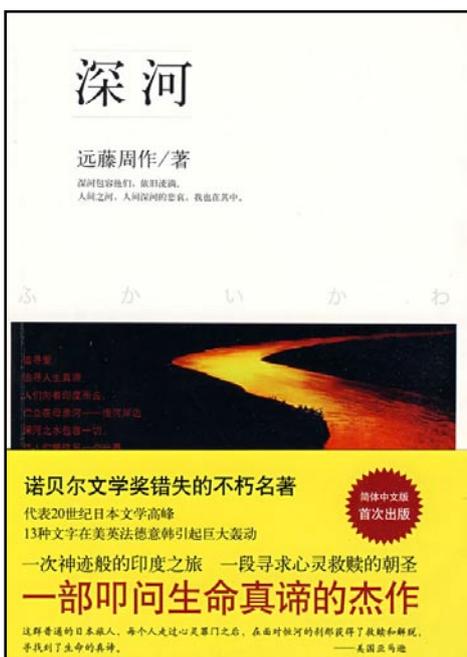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远藤的生平,对于他的这一创作态度的理解也许不无帮助。由于受家庭影响,远藤 11 岁受洗,圣名保罗,但这并不是他自愿的,他当时也不可能知道这年幼的受洗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因此远藤成年后有数次想要弃教的念头,并深深羡慕自己选择信仰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可以把《沉默》中洛特里哥数次徘徊在弃教边缘的心理描写得栩栩如生。远藤早年以批评家身份登上文坛,第一篇评论《诸神与神》及之后的长篇评论《崛辰雄论备忘录》都是受老师神西清的赏识推荐发表的。在这些评论中,远藤特别强调,“在揭发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罪恶时,相信有一道奇异的光芒,在作家不

安的眼神前将此罪恶净化，而作家应成为这道光芒的见证人”。这也成为远藤日后从事小说创作的重要出发点。1950年6月，远藤以战后日本第一批留学生身份留学法国，入读里昂大学。在忍受留学生活的孤单、寂寞时，更深地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后意识到“探讨人心深处的根源”及“追溯到罪的根源”才是自己未来文学创作的路径。远藤留法期间研究方向就是法国当代天主教作家，尤其是莫里亚克。这些可以说是远藤小说生涯理论上的准备，另一个对他写作生涯深具影响的则是1959年至1963年长达四年的住院疗养生活，其间，肺部动过三次大手术，曾数次濒于死亡的边缘，这些都令远藤对人世间的冷暖有了多一层的认识，同时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变化。从这个角度，《沉默》也可以说是这漫长的疗养生涯的产物。

《沉默》故事情节本身很富张力，起始于罗马教会获知，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穴吊”的拷刑，宣誓弃教。为了一探究竟，耶稣会方面派出费雷拉神甫从前的三个学生偷渡日本，同时他们也负有传教的任务。以此为开端，小说从始至终充满紧张的气氛，而且小说主题也很自然围绕信仰和背叛，生死抉择等极为严峻的人生问题展开。小说的感染力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前四章以洛特里哥书信的形式出现，可以便利地从人物内部的心理展开，这四章中充斥着大量自省的段落，由于小说人物本身是耶稣会教士，那么远藤也就可以借助人物的口吻直接探讨他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比如在第四章末尾有这样一段话，就直接揭示了远藤自己对于信仰极其矛盾的心态：“人，天生就有两种，即强者和弱者、圣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强者在这样的迫害时代，能忍受因信仰而被或焚烧或沉入海底，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在山中流浪。你到底属于何者？要不是因为司祭的自尊和义务的观念，或许我也跟吉次郎一样践踏了圣像。”

小说从第五章转入第三人称，其时洛特里哥正因为吉次郎的出卖而被警吏们抓住。最后几章中，作家从外部描写警吏们对于洛特里哥的威逼利诱，试图让他弃教。最极端的是将洛特里哥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如果不弃教，那些信教的百姓将会被处以“穴吊”之刑，而如果他弃教，那他则违背了自己的信仰。这处境其实正是信仰本身的尴尬境地，而这也是远藤创作这本小说最隐蔽的动机。对于这个难题，小说以洛特里哥的内心独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基督会弃教的！为了爱，即使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爱的实质高于信仰的规则和教条。——这显然是远藤真正想说的话。而之前弃教的费雷拉对于洛特里哥的劝告则更进一步表明了作者对于教会这一类宗教机构的批判性看法：“教会的神职人员会裁判你，如裁判我一样，你也会被他们赶出去。可是比起教会、传教，还有更重要的事。你现在要做的是”省略号所代表的正是一直萦绕在洛特里哥心头的弃教行为——践踏圣像。小说显然对主人公的弃教行为有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而对那种信仰的教条主义则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

小说另一个人物吉次郎也很重要，他作为一条副线贯穿小说始终。最早协助洛特里哥等三名教士从澳门经由海上偷渡日本的正是这个人——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走进屋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吉次郎，年龄大约二十八九岁，虽然喝醉了酒一双眼睛仍充满狡猾的神色。在到达日本后，吉次郎也给予了几位教士最初的帮助，但是涉及到他的描写总是充满鄙夷和暗示：“吉次郎躲在大家的背后，露出卑屈的笑容，像只老鼠，摆出只要苗头不对马上抽腿就跑的姿态。”没错，吉次郎是告密者，洛特里哥最终因为吉次郎的告密而落入警吏们之手。有意思的是随后关于吉次郎的描写，吉次郎一路尾随押解洛特里哥的警吏，到关押教士的地方，在一个雨天，洛特里哥注意到“一个穿着蓑衣的男子挨着看守大叫着”，看守一举起棍子，他就像野狗般朝门的方向溜走，之后又回到中庭，伫立雨中。这个男子正是吉次郎，他的声音如狗在哀鸣：“神甫，请听我说！我要忏悔！”这是远藤喜欢描写的“弱者”形象在《沉默》中的代表，他们作为陪衬映衬出善行的伟大，可是对于这卑微者，远藤同样给予同情：“喜欢有吸引力的、美丽的人，这是谁都办得到的。那不是爱。对容颜衰老、



如破布般的人及其人生不会抛弃才是真正的爱。”

这是一部探讨爱和信仰本质的书，同时这也是一本内容大于形式的小说。可能因为远藤早年是批评家出身，自己早有关于神和信仰的非常复杂的思考，书中许多主人公的独白和思考很像是远藤自己急不可待的发言。大段有关神的和爱的探讨本身很精彩，但是是否妥当得服从于小说整体则是一个问题了。这使小说看起来有点像为远藤的那些抽象神学思考提供的例证。小说描写的本身就是宗教事件以及宗教人物，这当然为涉及到神学的直接思考提供了便利，但是副作用则是使这爱和信仰变得稍嫌狭隘——某种教义下的爱和信仰，丧失了这个问题原本具有的更广泛的基础，似乎爱和信仰只是关乎那些教士和信教者，而其实这个问题关乎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远藤似着墨不多。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和第三人称的描写交替进行，语言方面较大的特色则在于风景描写烘托人物心境方面远藤做了有益的尝试。经常出现的海的寂静和天空的阴暗，以及黑褐色的土地，强化着小说阴郁和凝重的气氛。可是在人物的丰富性的刻画方面，小说似乎还有不足，这个问题同样是因为这是一本作者“有话要说”的书，作者的思想至少部分遮挡了人物自身某种自足的行为举止，一种基于生活本身逻辑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喜欢谈论“轻浮的技巧”的作家，多半会强调人物本身自然的言行举止实际上蕴含着更丰富的可能性和思想，可是远藤并不是这样的作家。

远藤是一位重量级作家，这重量依我看，首先体现在他的小说多半选取的题材本身就很重要很具蛊惑性，《沉默》是关于被威逼的教士在信仰前的挣扎，《深河》则是描写一个前往印度的日本旅行团的朝圣之旅，里面有刚刚丧妻一心追寻妻子转世可能的职员，也有欲将心事寄托于鸟儿的童话作家，还有曾在缅甸丛林历练炼狱之苦的老兵——每一个人都因为自己经历的苦痛而试图寻求信仰带来的可能的解脱，其中有一个点睛人物人物大津同样是虔诚的信徒，远藤设计这个人物同样是希望借助他直接探讨宗教和信仰等等重大问题。远藤早年最重要的小说《海和毒药》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九州大学附属医院，拿美军俘虏实施人体解剖的事件为素材写成的，以小说主人公胜吕和户田对于自己参与人体解剖事件麻木的态度，凸显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识。远藤不是那种见微知著式的作家，他喜欢重要的议题重要的事件，并且习惯于从正面入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心无旁骛直接切入重要议题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缺陷则在于容易被重大议题压垮语言自身的构建，那种从细节和局部通往伟大的路径被遗漏甚至逐渐被淡忘。

【日】远藤周作：《沉默》，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8月，22元。

【日】远藤周作：《深河》，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7月，25元。

【日】远藤周作：《海与毒药——远藤周作中短篇小说选》，林水福译，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NTS：380元。

图片1为远藤周作

## ESSAY 随笔

### 德国学生运动观察

特约撰稿人：杨小刚（德国·图宾根，[asukashinjirei@gmail.com](mailto:asukashinjirei@gmail.com)）

2009年11月初到12月中旬，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生抗议“博洛尼亚”教育改革计划的秋季活动已经持续一月有余，与6月份时仅仅一个星期且只限于德国境内的夏季抗议活动相比，这一次，学生们试图用更大的规模和更长的时间让寒冷的秋天也燃烧起来。虽然这个秋天比往常暖和，但在秋季活动刚开始时，德国大部分地区也下了今年的初雪，到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许多地方的最低气温到了零下5°左右。12月17日，图宾根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今年最后一次游行。时间没有选在阳光灿烂的中午，而是夜幕降临的下午四点。运动组织者推着堆放着音响和麦克的小车，放着“革命歌曲”，领喊着口号，虽然不多却也有一百多号人的队伍簇拥着小车沿着交通主干道前行时而散步，时而狂奔，队伍最后是另一辆小车，载着加热过的甜葡萄酒以供取暖。五点，天已全黑，不时飘下几片雪花，冰冷的天气冻得头疼。参加者仍热情不减，甚至在通往斯图加特的十字路口上静坐了约半个小时。

游行是穿插在这次抗议活动之中的曲目，主要手段则是占领讲堂。11月初，包括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在内的德奥至少三十五所大学的学生相继占领了本校某栋主教学楼的某间讲堂，或者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室，或者是最重要的演讲大厅。他们制订了一系列日程，在讲堂里练瑜伽、听音乐、看电影，围绕教育改革展开各类演讲和讨论，疯狂时，以图

宾根为例，从11月25日晚六点以一位教授题为“席勒与人的教育”的演讲开始，一直到27日晚6点，除了断断续续约4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外，每个小时都有一人主讲，深夜凌晨也不例外。

围绕教育改革的争议很大，暂且不论，此次持续如此之久的学生运动实在是观察德国社会运动文化、了解所谓“社会运动社会”的一面绝佳窗口。自从68学运结束、左翼思潮降温以来，许多评论者都将那场蔓延整个世界的运动视为一代学生的青春期闹剧，包括有着世界级声誉的思想家，比如本身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领袖哈贝马斯，虽然持自由主义立场但迥异于英美自由派、对马克思颇有研究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自称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设计的法国政府高参亚历山大·科耶夫，直到晚近，大量以此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持类似角度进行反思，著名者有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2003年的作品《戏梦巴黎》。然而这些从宏观层面对68一代要求的整体变革做出的死刑判决，掩盖了微观层面发生的累进式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塑造了西方民主社会普通公民的日常政治生活方式，丰富了现代民主的内涵。这一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社会运动”的变化意味着，一个成熟、巩固的民主社会不仅有宪法、代议制、权力制衡等等这些国家制度层面的安排，而且要容纳、保护公民自发组织的、诉诸各种议题的运动和组织。

德国既是68学运也是其后环保、反核、同性恋等新社会运动的策源地之一，至今已形成持久的社运传统。虽然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运动作为人类的自发行为，在形式、手段、目的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但由于文化、政治体制等诸方面的不同，产生了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民主化和非民主化社运的重大差别，前者以协商为最终归宿，后者则陷入暴力冲突的泥潭，这一差别往往决定了一国是走向民主转型和巩固还是持续的暴政。对德国成熟的社会运动做番观察，相信能呈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兹就组织、动员、抗议手段、社会舆论以及官方反应五个方面对这次学生运动做些考察。

### 一、组织

60年代的学生运动建立起广泛的组织网络，如有着明确政治立场、近似政党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SDS），和各高校学生选举产生、独立于校方的大学学生联合会（AStA）。前者虽然于1971年解散，后者则一直作为学生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机构存在下来。德国历次学生运动往往是各地大学在同一时间段统一行动，采取一致的步调，类似的形式，相同的标语、口号，并不是由某几所大学带头示范后产生群聚效应，相信AStA这样的组织扮演了高校间联络与共同计划的重要角色。



不过与60年代学运明显不同的是，如今的学运虽然也有跨区域联合的特征，但地域性特色更强，由于不再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政治诉求，而是针对教育领域的具体问题，而教育事务由各州文化部各自主管，所以诉求对象一般针对校方和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故很少有各地学生齐聚柏林、法兰克福等主要城市进行抗议的情况发生，只是随着运动的升级，会在各州首府组织本州学生的联合游行，少数情况下，如12月10日在波恩召开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各地学生借机齐聚一地进行集体抗议。因此，除了AStA这样的全国联合组织之外，在各地学生运动中进行具体策划的是形形色色的本地青年组织，在图宾根就有系科联席会议、新民主青年、绿色青年、左翼青年、马克思行动派以及各类临时性联盟等大大小小十数个组织开列于合作者名单上。

必须说明，尽管有这么多个学生组织，但并非某个或某几个组织牵头主导，实际进行计划安排的其实是少数积极分子，他们可能是某些组织成员，也很可能是临时参加、以前毫不相识的个人，维系他们之间来往的不是组织关系而是私人交往。抗议活动开始之前，一些核心分子通过网页、邮件的方式召集所有有兴趣参加者聚会，互相结识，制定计划，进行活动时则以一个临时的名义出现，比如6月份各地的组织者简单叫作学生罢课联盟，秋季抗议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每天在被占讲堂召开全体大会，故而许多安排以全体大会的名义发布。图宾根的活动传单明确标明由许多个人合作完成。可以发现，这些核心成员往往是激进的左翼青年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打扮奇特，举止触目，颇有60年代嬉皮士的遗风，在思想上也追续68

精神传统。法兰克福大学校方将这些人描述成根本上反权威的极端分子，指责他们利用学生对教育改革的不满将学生抗议引向他们所主张的反资本主义方向，对学运的领导和组织也不符合民主的合法性。但这样的组织方式正是新社会运动的特征，与传统社会运动严密的组织网络、严格的组织纪律不同，新社会运动的组织非常松散，来去自如，而且往往有多个小团体多头并进，自然，积极分子会做意识形态的引导，但他们提出的口号、计划和抗议曲目都必须经过后续加入者的实时民主讨论才被大家所接受，而且在抗议进行时随时有人会提出临时的替代方案。

最后，不能否认，学生运动背后有社民党、绿党或者左翼党等政党成员利用政治经济资源提供支持，甚至直接参与，这也是许多反学生抗议人士指责的重点，他们宣称这些政党将教育改革问题政治化，利用学生抗议谋求一己的政治目标。但如果考虑到学生利益始终也要由相关党派在议会层面进行表达，教改问题最终也需要通过政党政治在议会和政府层面解决，而且教育作为关系全社会的议题，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权介入，这些指责便站不住脚。

## 二、动员

德国大学生并不热衷于网络，其联系方式十分传统，所以博客、Twitter 甚至手机都不是他们的主要动员手段，虽然各个大学都办有抗议活动宣传网页，秋季的活动还有一个全国信息汇集的网站，但浏览的人只是少数。基本的宣传动员手段还是海报、传单以及很重要的地下自由电台。在图宾根这样的大学城，在食堂、图书馆、主要车站等人流密集之处粘贴海报可以获得很好的宣传效果，自由电台的传单则贴满了四处可见的红绿灯柱。有时还有更为原始的手段，即进入正在上课的教室分发传单，即席动员，没有老师会将此视作对他们教学活动的打扰，一律都会理解和支持，在场学生无论感兴趣与否也都会在来人讲话完毕后敲击桌面以示支持。

举行 Party 亦是动员的一种方式，当然如此的狂欢往往在某次活动之后，以鼓舞士气，为后续抗议做准备。而在重大的抗议活动，比如大规模游行之前，主教学楼前将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分析问题现状，邀请各方代表发言，申述学生要求，路过学生如有兴趣即可驻足倾听，不支持的可以立刻用脚投票。这一源自广场上召开的古罗马公民大会的政治活动简直就是西方民主的精髓。秋季抗议活动中还建立了咨询处，于固定时间在食堂回答来往学生问题，比如抗议目的、日程安排以及对教育改革具体细节的认识，欢迎即时讨论。

因为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运动组织者不会用激情澎湃的演讲鼓动听众，而是做实事求是的问题分析，政治鼓动在学生看来也颇为可疑。运动的标语与口号也避免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以幽默与反讽的方式陈述事实。比较夏季和秋季标语口号的不同，更能发现这一点。6月份金融危机余波未退，五一时德国许多城市又刚刚发生过激烈的工人示威活动，因此夏季的抗议充斥着各色反资本主义标语，一个到处可见的是“富裕父母为大家”，这简直和左翼党提出的征税富人重税的议案主旨相同。或许因为意识到有人批评将反教育改革与反资本主义捆绑，秋季的标语与口号更多针对教育本身，有条有趣的标语叫“教育太贵了，愚蠢值多少钱”，游行中一直呼喊的口号是“教育自由，否则扯淡”，或者“我们就在这，我们很响亮”，还有改编德国民歌、圣诞歌曲而来的讽刺歌谣。显然，非对抗式社会运动的标语口号与“反对”、“打到”、“抵制”这样的措辞相比需要花更多心思。

## 三、抗议手段

德国终究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策源地，诞生过无数革命分子，静坐、占领建筑物、封锁交通这些激进的抗议方式依旧是德国社运惯常采用的手段，左翼和极右翼还不时发生暴力冲突。6月17日图宾根游行时，学生们封锁了连接全市所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达四小时之久，全市交通堵塞。在左翼学生大本营柏林，抗议活动更加激烈，除了大规模封锁交通之外，学生们甚至上演了一场“抢劫银行”的滑稽剧，以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最终招来大批警察清场。海德堡大学学生在校长室的静坐一直持续到夏季抗议周的周末，也遭到校长报警驱逐。秋季占领讲堂行动自然让许多正常教学活动无法进行，《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法兰克福大学学生占领了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楼，少数极端分子在墙壁上肆意涂鸦，校长声称造成26万欧元的损失，在随即进行的清场过程中，学生的反抗还导致三名官员受伤。这次清场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强的对抗情绪，以至于抗议学生长时间拒绝与校方进行任何对话。

极端的抗议手段无疑会被人们指责，但政治的实质就技术层面而言终究是利益分歧产生冲突并寻求解决的过程，尽管民主社会抗议的最终落脚点是协商，但如果不通过一定程度上激烈的对抗引起社会关注，施加压力，没有任何阶层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以教育改革而言，其直接动机之一是减轻财政压力，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国家传统上实行类似硕士/博士两阶段划分的学制，凡考入大学者直接接受至少六年的硕士教育，且长期以来不收学费，又因为忠实于启蒙运动以降的自由教育理念，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安排有很大自主权，不少人的硕士攻读年限长达十年，这些都意味着大笔的财政支出。推行英美学士/硕士/博士三阶段学制的教育改革通过两项主要内容可大幅降低教育支出，一是学士攻读年限限定在三年，二是硕士攻读名额有限制。反对教育改革的学生抗议，除了教育理念的巨大分歧，归根结底是要夺回自己曾经享有的权益。如果抗议不升级，执政当局不可能主动让步，从春季到秋季学运规模的不断扩大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为一些会触犯法规、侵犯他人利益的激进抗议手段辩护。反对教育改革不是对某些特殊群体或者个人的利益诉求，其利益相关者是全体学生，间接的是全部德国家庭，他们都是抗议成功的潜在受益者。学生运动是积极自由的



表现，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无疑为其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堵塞交通、占领教室等激进活动妨害的是他人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但就这些被妨害者可能都是潜在的受益者而言，他们便不得不做出一定牺牲。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自由优先于消极自由。

总体而言，德国学生在政治上非常成熟，抗议的目的还是对话。从中学的互助式学习到大学的研讨班及小组报告，理性讨论已成为德国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6月份长达四小时的街头封锁不是简单的静坐，而是当场与校长展开讨论，而且每通过一个决议都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原

则进行民主表决。秋季占领讲堂时学生们也与赶来劝阻的校长进行讨论，最终争取到他的允诺，不报警清场，举行的一系列演讲、咨询、辩论更是为促进理解、达成共识。

#### 四、社会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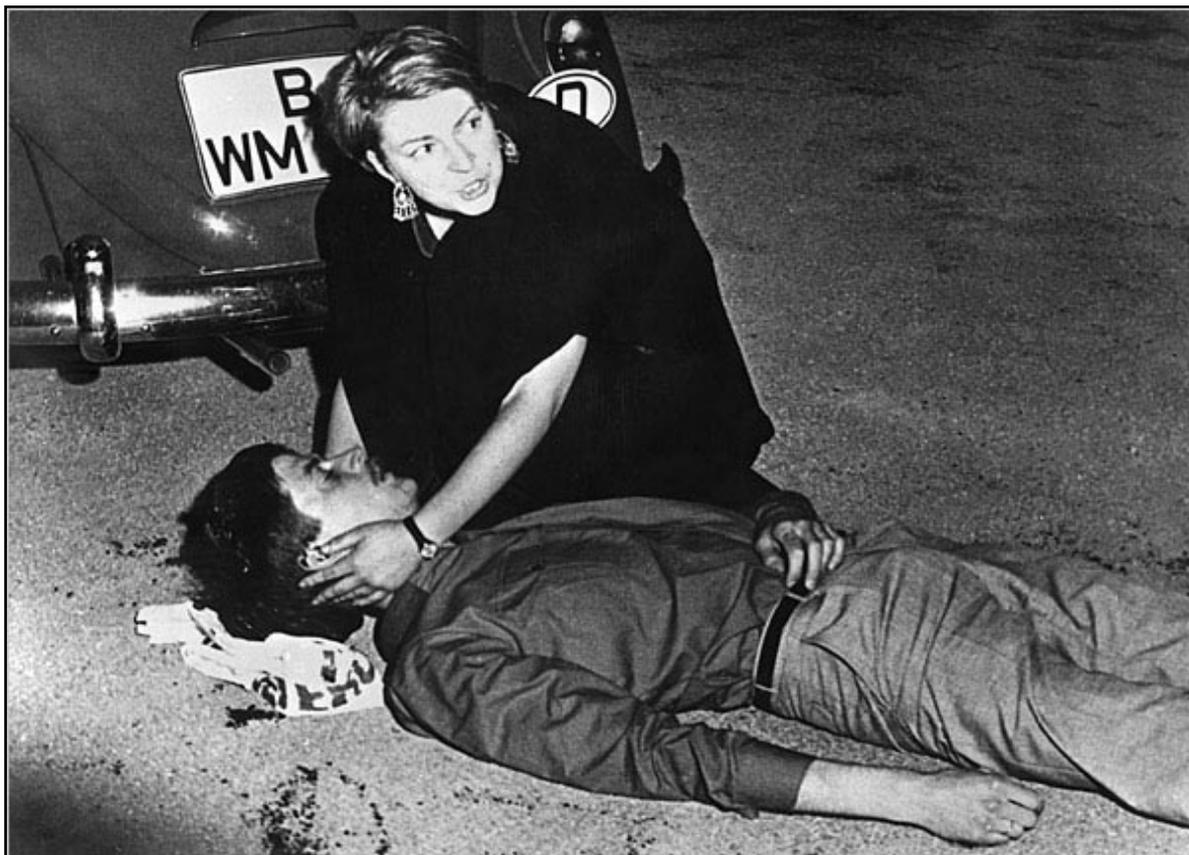
68之后，德国社会对学生运动的批评甚多，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反而不时成为嘲讽的对象。夏季运动刚开始时，就有媒体文章用“学生们又上街了”的口吻讥笑他们无明确目的的群体狂欢。知识界、文化界也不像60年代时对学生运动表示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几大主流媒体都对学运做出有所保留的评价，当然，按照政治倾向，论调上有明显不同。《法兰克福汇报》整体上赞成博洛尼亚计划，揭发学运组织者的激进作为，但也认为教改需要做出很多调整，《时代周报》多有称赞，但更会指出学运计划安排、目标设定上的不足，以及学生们忽视博洛尼亚计划带来的好处。

学生们的直接支持者来自高校教师，包括保守的教授们。教授们，尤其是人文科学的教授们是洪堡教育理念的坚决捍卫者，早在学运开始之前，就有天主教神学系教授以辞去教席的方式表示抗议。所以，与60年代学运中多数教授们的保守表现不同，特别在秋季的抗议活动中，教授们和其他教师多有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以示支持。图宾根大学校长报警驱散抗议学生后，一位神学系教授在他的一堂讲授课开始前特意发表了一番批评校长、声援学生的演讲，指责这位校长是当时唯一一个报警的校长，致使学校声誉蒙羞。另有一位修辞学教授撰写公开信在教室传发，谴责校长的行为。即使是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为了惩罚学生对历史建筑的破坏报警也受到校内教师和校友的舆论压力。可以看到，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发展下来，德国已经形成非常自由宽松的氛围，即使并不完全同意抗议者的主张，但也赞同他们以合适的方式表达意见，促使全社会共同参与讨论。

#### 五、官方反应

拥有暴力机关的政府如何应对社会运动带来的突发状况可以衡量一国民制是否稳固、成熟。游行、抗议、示威等社会运动手段在德国依赖于联邦基本法第八条所保障的每个公民的集会自由权。据Rudolf Wassermann主编的《基本法评注》所述，这一权利自启蒙运动之后得到当时德国各邦国法律承认，但在1848年复辟后受到严格限制，直到1918年革命的冲击下这些限制才被解除，而在魏玛宪法中集会自由还未被表述为根本的民主权利之一，在随后的纳粹时代则被彻底剥夺，由于这

一惨痛经验，制订基本法时，没有经过任何争议乃至讨论集会自由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通过，在其后的 60 年代成为学生运动的合法性来源。然而，即便得到宪法层面的承认，集会自由在战后德国初期并未得到很好保障。1967 年 6 月 2 日伊朗国王 **Mohammad Reza Pahlavi** 访问柏林，数百名柏林大学生聚集抗议伊朗独裁统治，遭到伊朗随行人员殴打，在场德国警察不仅没有制止，而且很快用警棍和高压水枪开始了镇压学生的行动，一名 28 岁的大学生随后被一便衣警察开枪打死，这一事件直接点燃了 68 学运高潮以及极左派组织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武力对抗，抗议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不断的流血冲突促使德国政界、法律界开始反思社会运动的合法性空间，在反思代议制民主局限性的同时，集会作为直接民主的意义被承认，法律界开始探讨抗议活动适度触犯法规的合法性基础，德国警察开始接受灵活处理社运突发事件的培训，改善与抗议者接触的手段，一些激进的抗议方式亦被允许。另一方面社运参加者也积极寻找合适的运动方式。各方合力最终促成了今日德国非对抗的社运环境。



6 月 17 日图宾根学生封锁城市交通时，学生们首先要求在场的警察局长承诺不会下令驱散学生，警察局长当即表示在不发生严重事件的前提下不会干涉抗议活动，市长跟学生交涉多次未果后，与学生妥协，约定了四个小时的时限，校长也不得不在街头与学生进行讨论。11 月 17 日图宾根大学上千人参加的游行队伍以游击战的方式在市内多处交通要道上穿行、静坐，最后一次 12 月 17 日的游行学生们也在冰冷的街头静坐了半小时，对此，跟随的警察都保持了克制。冲突当然仍旧存在，在柏林，由于学生抗议规模之大对市内公共场所造成巨大影响，柏林警方出动了防暴警察，大量学生被捕。11 月初图宾根学生占领一间讲堂后不久，校长也以干扰教学秩序为由报警，警察在 11 月 12 日清晨驱散了在讲堂内过夜的学生。五天之后，学生们卷土重来，校长很快闻讯而来，试图通过封锁教学楼阻止继续前来的学生，但在学生们的质问下，且因受到舆论压力，同意不再阻拦。在其他德奥大学，清场也间歇发生。

官方最终的反应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对抗议议题作出回应。12 月 10 日波恩举行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即就此进行讨论，但教育部门推行博洛尼亚计划决心始终未变，在细节上会做出改进，联邦教育部长沙万女士则宣布各大学可自行决定是否将学士年限延长至四年，并声称硕士入读并无名额限制。《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在德国经济不景气、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教育部门对已经筹备十年的教改计划的调整已很迅速，但学生的要求大部分没有达到，运动仍会继续下去。

图片 1 和 2 分别为图宾根学生抗议的照片，图片 3 为 1967 年学生抗议伊朗国王 **Mohammad Reza Pahlavi** 后的冲突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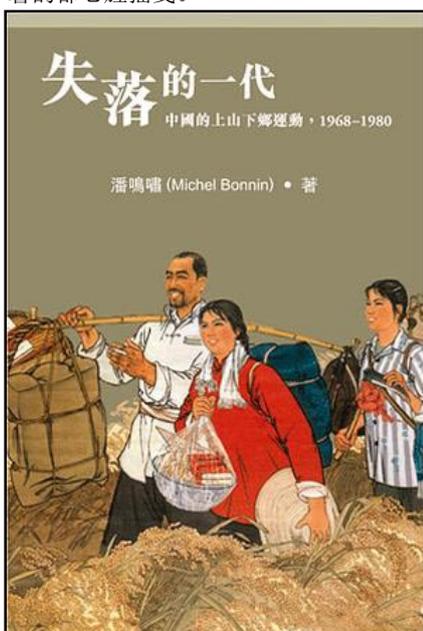
## ESSAY 随笔

## 从蛇皮袋到黄鱼车：大陆地下书摊的春天和秋天

范绅士（上海）

人类精神的命运常常与书籍血肉相连。在那些极端的年代，书籍的封禁、阉割乃至焚毁喻示着精神所遭受的禁锢和劫难。然而，愈是这样的时代，人们反倒对那些“被”敏感的书籍充满饥渴，于是，一个个屡禁不绝的地下黑书市场和阅读公社就悄悄地诞生了，手抄的或自印的书页犹如火种在饥渴慕义的人群中秘密传递。文革时期著名的手抄本、黄皮书、灰皮书在民间的流传，已构成这个国度十分奇特的一段阅读史。相比于毛时代的酷烈，今天用丝绒装扮起来的盛世中国在言论出版的尺度上明显开放得多，图书市场的眼花缭乱，乍看去还真让某些焦躁的人士误以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遥遥在望、红袖相招了。大约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都市（也包括某些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书贩子，他们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四面了望，神情警觉。通常会选择高校后门口之类热闹而暧昧的地带，铺开脏兮兮的床单布，倒出一堆不知从什么渠道搞来的山寨港台书刊，不用说，此时立马就会有一帮文化看客围上来，由此开启了山寨禁书的险峻事业。

回想起来，1997、1998 年似乎是地下书摊难得的春天，贩卖的书籍品类之繁杂，可与菜市场相伯仲。其中有一类是旧书，七、八十年代之交再版或新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居多，如人民文学版的《九三年》、《高老头》、《于絮尔·弥罗埃》、《汤姆·索亚历险记》，上海译文版的《艰难时世》、《莫里哀喜剧六种》等等，也有少量过去的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纸页泛黄，面目肮脏，有的书内还残留汤汁、菜叶、口水之类的经年渍痕，多是从各种企事业单位图书室外流出来的处理品，翻开第一页通常盖有各种单位印章，××轧钢厂图书室、××中学图书室、××卫生防疫站工会图书室、××清洁管理站图书馆、××棉纺厂图书馆、××无线电厂图书室、××党校图书室之类。不过，书摊上最抢眼的是另外两类书，一类是港台出版的时政历史类书籍的山寨版，纸质粗劣，品相难看，错字连篇，内容反动，但备受欢迎，每当夜幕低垂，街灯初上，书摊周围总是熙熙攘攘。记得当时出来一本李医生的回忆录，顷刻间抢售一空。那时海外颇为流行的一些出版物，如《许家屯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谁杀了林彪》、《高岗魂断中南海》等都在地摊上闪亮登场过。也有些人是冲着书摊上的色情书刊去的，这些色情书大多是吾国古典情色文字，封禁已久，诸如，全本《金瓶梅》、《肉蒲团》、《灯草和尚传》、《痴婆子传》、《欢喜冤家》之类，基本上，台湾《思无邪汇宝》收录的明清艳情小说多有亮相。有些街角的小书店也会公然销售些港台翻印的性学书籍，如高罗佩的名著《秘戏图考》全本，内收秘书十种及《花营锦阵》图册，价格惊人。过去这类禁书一般只有特权人士方可沾着口水，肆意翻读，如今已入寻常百姓家。伴随着国人久经压抑一朝复苏的欲望，地下书摊的生意兴旺发达得让路边卖烤红薯的都心旌摇曳。



曾几何时，身背蛇皮袋，蹲在地上的经营方式渐被黄鱼车所取代，这种由人力向机械的飞跃是否在回应城管时代的到来，不得而知。不过，黄鱼车对文化气候的敏感，倒是堪称一绝。大约 5、6 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社会关注，十分热销，后来风传遭禁，未几，二书的山寨版赫然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黄鱼车上，很是招摇，制作水准至少在封面上几可乱真。07 年又有八本书被禁，各路黄鱼车上的山寨版立马应运而生，几如山鸣谷应、风生水起之类的自然现象，正所谓擒之适成纵之。章女士的书出了《伶人往事》后，在大陆遂成绝响，不得不在港台面世，但黄鱼车跟进快速，章女士的书几乎被一网打尽，从自撰的《最后的贵族》、《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云山几盘 江流几弯》、《这样事和谁细讲》到主编的《五十年无祭而祭》各种山寨版本横竖俱有。如果拿《往事并不如烟》和《最后的贵族》对读，是一件益人神智的事，据说有好事者，将大陆版删节处与港台版全本对勘，读出不少微言大义，其中刀斧手大刀阔斧的阉割与无微不至的删削，几达鬼斧神工的境界。06 年三联书店出了本《八十年代访谈录》，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 80 年代怀旧热，没几年，黄鱼车推出山寨版全本，拿大陆版和港版对照起来阅读，效果更为惊人，大陆版把一哥们生生给割掉了——原本查

女士访谈者为 12 人，大陆版变成 11 人，在牛津版的序言中，作者对此表示了遗憾。

在防文人之笔甚于防川的国情下，黄鱼车似乎颇为古怪地扮演起通常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启蒙角色。近几年来，黄鱼车上的历史类书籍渐已超过时政类，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全本）、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山寨版把书名改成《中国七十年近代史》）和龙应台《大江大海 1949》几成标志性图书。这其中最热门的还是党史类，以前的山寨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晚年周恩来》、《吴法宪回忆录》都畅销不衰，而且版本众多，有繁体简体，大字小字，横排竖排，有图无图，分册不分册，套封不套封，有错字无错字，琳琅满目，似乎很以读者为上帝，据说作者看到都会买上几本题赠友人，以广其传。

最近的一些山寨书，也是沿着这一脉络，如，《聂元梓回忆录》，《丁盛将军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还可加上前几年的《王力反思录》、《十年一梦》等，俱属文革当事人的畅叙幽怀之作。此外，还有《百年林彪》、《红太阳的陨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饿鬼》、《墓碑》、《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叫声父亲太沉重》、《一滴泪》、《龚楚将军回忆录》、《司马璐回忆录》等，这最后一本书很有点特别。作者既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者，早年又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参与者，18 岁加入中共，到过延安，见识过中共高层领导，1943 年脱党。最早知道作者名字，缘于大陆内部印行其所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黄色封面，装帧相当简陋，无出版社，无出版地，无出版年代，属于三无印刷品，当时浑然不知作者乃何方神圣。由于作者经历传奇，身份双重，看他探幽索微，发掘秘幸，臧否人物，读来饶有趣味。在这本回忆录之前，作者 1952 年在香港刊行过早年回忆录《斗争十八年》，据其自述，这本书叙述有所隐晦，未能振笔直书，此一遗憾在晚年回忆录中得以弥补。有意思的是，文革高潮时期（1967 年），此公曾在香港刊印《刘主席语录》，版式模仿《毛语录》，据说在海外十分风行，当时就有人将《刘主席语录》与《毛主席语录》对读，引以为乐。不久，刘遭废黜，《刘语录》也厄运当头，据说愤怒的香港造反派一个晚上冲进出版社门市部将其全部焚毁。

比较特别的是，黄鱼车上还现身过国民党将军的回忆录，如，《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还有些书转瞬即逝，如《胡兰成·天地之始》，再没见到过。感觉更为怪异的是，近期以来，随着城市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大，黄鱼车的数量大为减少，漫步街头，黄鱼渺然，诸大都市，唯余城管，但山寨书的更新速度却大为加快，几乎每周一书。有朋友笑说，一辆黄鱼车承载了一部沉甸甸的中国现代史。

## VISION 视觉

### 云南稻农的影像武器

燕舞(北京, yanwu1924@263.net)

意外发现《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孙敏等主编，马美艳等摄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 年 6 月），是 2009 年 11 月 28 日在南锣鼓巷一个叫“朴道草堂”的书店。书店藏在南锣鼓巷中段西部的帽儿胡同，布置得也很简约，如果不是我搜得“昆虫记”、“植物记”等主题图书的刻意和某种幸运、缘分，也许就无法发现这本同样低调的摄影集。

书其实是 3 年半前出版的，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回家，一气呵成地读完。原来，2004 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稻米年”，当时提出了“稻米就是生命”的口号，意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推动稻米的可持续生产。作为一种积极回应，“绿色和平”在 2004 年 10 月 16 日的“世界粮食日”组织了约 70 名农民、水稻专家、稻作文化专家、记者及志愿者等参与一个名为“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农业巡游”的活动。

巡游途中，“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结识了 5 位分别来自傣族、普米族、爱尼族和哈尼族的世代种植稻谷的农民。“为了更真实地见证稻米的重要性，以及谷子与生态、稻农生活与文化的关系”，2005 年年初，“绿色和平”将 5 部相机交给这 5 位几乎从未使用过相机的稻农，鼓励他们



在云南摄影师耿云生的必要指导下，尽可能原生态地记录自己与“稻米”这一主题有关的生活。

2006年2月，这5位稻农摄影师第一次远离各自的偏远故里，来到昆明，从他们拍摄的数千幅照片中精选出101幅，开始举办“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正是这个巡回摄影展的延伸出版物，时任“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经理的林志光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这些照片是完全没有摄影经验的稻农拍摄的，或者，照片里面所盛载的情感是外来摄影师永远无法注入的”，“希望让更多远离土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稻农的眼睛去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对土地与稻米的感情。让我们这个祖祖辈辈被稻米养育的民族，可以借此契机，关注探讨稻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踏上真正的稻米生态之路。”

偶遇《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这本“旧书”，备感亲切：在我鄂东北的故乡，幼年时我也是下过稻田的。我所在的小乡村虽然不像书中种双季稻那么辛苦，但种一季稻也并不轻松。由于懵懂无知，童年的我最盼望插秧的夏天，因为那时可以卷起泥泞的裤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蘸着红糖水吃油条。

大人们为了减缓腰酸背疼之感，从培育秧苗的田里把秧苗转移到稻田前，往往会坐在一种船形的凳子上。由于这种凳子有一个光滑而略弯曲的宽阔底部，坐在上面，被同样顽皮的小伙伴一推，就可以滑出一段很远的距离。但如果速度过快，就会人仰马翻，弄得满身是泥、一脸狼狈。更糟糕的是，赤脚在田里插秧，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玻璃渣或其他异物划伤了脚，或是被嗜血的蚂蝗咬上。

也许，没有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那些辛劳、惊险和苦中作乐，就难以切身体会真正的土地伦理。看到《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我立马想起资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受“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于2005年9月正式启动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0个村民作者和10个青年导演，让他们进京接受一定的拍摄技术培训后，回到各自的村庄拍摄村民自治的状况。

“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和“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都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影像平民化民主化的潮流，让影像成为草根阶层呈现自我、伸张话语权的有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正式启动，其实比“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的启动要早上半年，但后者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显然超过前者——村民们拍摄的照片和纪录短片这几年已经在北京的“村民自治国际研讨会”上展览，并在美国的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西大学放映和香港国际电影节、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瑞士真实电影节及柏林世界文化宫放映，在中央电视台也有所呈现。或许，“村民自治”在当下仍是远比“稻作文化”更吸引人的词汇；或许，吴文光在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号召力的确超过很多他的同行。

我为自己在过去3年多错过了《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而后悔，其实，“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的介入者之一、云南学者孙敏女士也是不容忽视的纪录片导演。她为《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撰写了一篇详尽的跋，她在1998年至2003年间担任过《山茶人文地理》及《华夏人文地理》副主编——“她在1999年就写出了第一篇讲述滇西非凡抗战故事的长文《国之殇》”，《父亲的战场》（章东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的作者就为没能与她合作撰写这本“中国远征军滇西田野调查笔记”而遗憾：“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永远感激她推开了滇西战场的历史之窗，让我有幸用自己的双脚，踏上了这片我们中华民族父辈们的光荣战场。”

调查滇西抗战、寻访野生稻谷发源地，你可以约略猜出一位云南籍女纪录片导演长年累月在忙什么，她的相对寂寞可能正是为其艺术理想支付的必要代价。《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虽然是3年前出版的，但这本书并不旧，时任“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总监的施鹏翔还担心“中国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3年过去，这种担心反而变得更为严重。路透社北京2009年11月27日的电讯就表示，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已为抗虫转基因水稻发放生物安全证书，其商业化种植可于两三年后开始。对此，“绿色和平”照例是“表示极大的担忧”，并在其官网中详细分析，称：“首先，转基因水稻可能通过花粉传播而污染传统的水稻品种，对于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就长期人体健康而言，转基因水稻的食品安全性尚不明确。同时，转基因水稻更因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而对国家的粮食主权埋下定时炸弹。”

当然，我也请教了从事科学与环境报道的记者朋友，她认为“绿色和平”的主张有时是相对激进的，但也不可忽视。施鹏翔在《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中不光坚决反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对杂交水稻的生态和社会代价也颇有微词，他认为“一方有一方的水土和气候，农田不是工厂，而是一个生态系统”，“农业没有单一的出路，只有按照多样生态条件的多种出路。它相信农民——土地——生态之间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真正的绿色革命只能从田中来，往田中去。”

《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的封面照片取自1965年出生的云南省维西县攀天阁乡的普米族妇女熊贵芝拍摄的当地妇

女背着孩子插秧的作品——一位年轻妈妈背着可能没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插秧，泥浆溅湿了卷起的裤腿和双手；封底照片出自1954年出生的李自康拍摄的丰收图，这位云南红河县甲寅乡米田寨的哈尼族医生（曾为兽医）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他的4个女儿都在昆明打工，他和妻子在家耕种自己的承包田，并帮三女儿带她的两个孩子。

一个插秧的封面，一个丰收的封底，就浓缩了云南稻农种植水稻的全过程。个中辛苦，不妨翻阅书中其他照片。在熊贵芝的镜头底下，海拔2500米的攀天阁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稻种植区”，这里的一片稻田是由沼泽改造而来的，“在水深的地方连牛都难以施展，只好真人上阵”；好不容易插下去秧苗，“在攀天阁高海拔的环境里，一株秧苗要逃过春天的降温、扬花时的霜冻，才能幸运地熬到秋天收获的季节”。



1949年出生的西双版纳景洪县勐宋爱尼族稻农黎明富，“多年来一直是农村基层的农业科技骨干，他最大的愿望是培育出一种高产并适应当地气候的杂交水稻种子”，在5位稻农摄影师中对水稻最有研究的他，数年前曾用卖菜钱买过一个相机，专拍病虫害的片子并送到县里请教农科专家。因此，在总体上不是靠技术主义优势取胜的“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中，黎明富的摄影作品在拍摄技法和选材上更为纯熟一些。

黎明富拍摄了不少稻谷收割的场景，一位青年男子居然赤着脚在稻田里割稻子，他那镰刀都不太会握的女儿也埋着头紧随其后。而忙着收割稻谷的妇女们，中午时分只能在田埂上吃些从家里带来的简单饭菜。让我比较震惊的一幅图的照片说明说“稻谷打了就在田里晾晒同时扇去糠皮”，两位农民子弟就那样拿着大扇子扇风以扇去糠皮，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臂力啊！

稍有些疑惑的是，不知道《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中的图片说明是否也出自5位稻农，我怀疑可能是介入这个项目的专业影像工作者代笔。像黎明富拍摄的一幅秧苗零散错落地分布在稻田里的照片，其说明写成“音符一样跳跃的秧苗”，这个过于浪漫化的解说让我很不屑一顾。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参赛的稻农摄影师都想祛除外界对艰苦的稻作生活任何哪怕半点过于浪漫化的想象。

稻农摄影师李自康家乡红河州的哈尼梯田在其他专业风光摄影师的镜头下简直美轮美奂，而且红河州近年一直致力于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冬春时节，哈尼山梯田引来了走马灯似的摄影人。据说最热闹的时候，连脚架都插不进去”，但李自康的图片还是强调“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世世代代一锄一镩创造的奇迹”。

李自康拍摄的“打稻谷的农民”就特别感动我，那位穿着印有“西洋复合肥”字样的廉价T恤的青年农民就那样举着一把刚收割的稻谷抽向打谷槽，“同样的动作一打就是一天”，并没有穿深筒雨靴的他就那样站在还有积水的稻田里。

相形之下，28岁的云南新平县嘎洒镇大槟榔园的傣族妇女马美艳拍摄的丈夫轻轻松松扛着打谷槽的照片，非常像1950年代的红色招贴画中那些英气逼人的劳动模范，反而无法引起我的好感。倒是她拍摄的一位傣族男子劳动归来的照片更真实更动人，他趿着拖鞋、赤裸着上半身、扛着锄具，左手的草帽遮住的水瓶一看就知道是用过的大号矿泉水瓶被废物利用，满头大汗已经让他的头发软塌下来……

在5位稻农摄影师中，马美艳的作品是最严格地围绕着稻作生活这一中心命题来拍摄的（其他稻农摄影师的照片已经延伸至中缅边贸、村民生产和生活协作、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互动等各种主题），而且她的图片极富延展性。马美艳拍背着装黄鳝的小箩筐的村妇，原来，“沟里田里的黄鳝就如一项环境指标，农药化肥用多了，鱼和鳝就少了”。由此，我们得以重新确认稻田养鱼、鸭稻共作等种养结合的古老稻作模式的现代价值。

马美艳也拍种甘蔗的果农，种水稻相对较低的比较收益就轻易显现出来。马美艳还拍老妇人正牵着喂草的耕牛，原来，“许多稻作民族都有尝新米的时候第一碗饭要先给牛吃的习俗”。

1985年出生的云南新平嘎洒镇花腰傣族的姑娘白云仙，是5位稻农摄影师中年级最小的一位，和朋友在外学做生意的她按理说是和土地的直接联系最少的，但她农忙时还是回家种地，而且“她也承认自己不愿意也离不开土地”。在中国盲目的大城市化运动中，早有论者质疑将农民全部转化为工人和市民的可行性，白云仙“不愿意也离不开土地”的表白应该可以引发

我们更多的思考。

薄薄 120 页的《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其实内涵异常丰富，正文前面对“稻谷简史”的介绍在看这本书之前或之后都有仔细重读的必要。正是看了它，我才知道：人类种植稻米有一万年的历史；稻米是世界上食用人口最多的农作物，是 25 亿人的主食（2006 年的数据）；全球仅亚洲栽培稻资源就有 14 万份不重复的种质，我国已收集并编目的就有七万多份；全世界超过 90% 的稻谷产自亚洲和在亚洲被消费掉……

据说，云南哈尼族有一个传统习俗，如果父母诞下新生儿，便要在村寨脚的树林旁栽下三棵小树并将胎盘埋在树底，其泛灵崇拜式的生态保护实践值得深思，人与土地的良性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早在 1200 多年前，与元稹、白居易同倡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李绅创作出了他名垂千古的《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天，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传统解读多认为《悯农二首》是“揭示社会不公”（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第 481 页，中华书局，2007 年 6 月），读完《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我倒觉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追问应该在土地伦理的层面赋予它更多现代内涵（尽管李绅写的是小麦而非稻谷），孙敏导演的提醒或许就具有这种价值：对于一个以有限的土地喂饱十三亿人的国家来说，对于用自己的汗水喂饱十三亿人的农民来说，稻米就是生命。

图片 1 和 2 来自于书中作品

## TRANSLATION 译介

### 在德黑兰读韦伯

作者：查尔斯·库兹曼

译者：吴万伟（武汉，[wuwanweione@yahoo.com.cn](mailto:wuwanweione@yahoo.com.cn)）

最近，在摆样子公审伊朗异议者的时候，一个不大可能的疑犯遭到了指责，那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人指责他的理性权威观点煽动人们起来从事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伊朗改革运动的著名战略家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在胁迫下写成的忏悔中解释说“人文科学的理论包含着意

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哈贾里安“承认”韦伯的世袭家长制政府的观点不适用于伊朗。哈贾里安宣称该理论只适用于那些把“人民当作剥夺了任何公民权利的臣民来对待”的国家，它“和伊朗的现状完全不符合，没有任何相关性。”

哈贾里安在胁迫下对韦伯的谴责是荒唐可笑的，但这并不令人吃惊。自 6 月 12 日引起争议的总统大选以来，德黑兰强硬派政府已经开始了针对社会科学家的广泛行动。这种镇压一点也不新鲜。在过去几十年，每年就有一两个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因为颠覆国家的罪名而被捕。那些学者往往是被抓起来几个月后在发表了“忏悔”录像后被释放出来。但是今年，经过让人吃惊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ussein Moussavi）选举活动后发生了针对官方选举结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伊朗监狱中的社会科学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至少十多个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受到审判，被法院点名的不审判的帮凶就更多了。

该政权对社会科学家的敌意可以追溯到伊斯兰共和国创立之日。伊朗革命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关闭了大学，驱逐了那些被认为不够伊斯兰的学者和教授。前领袖伊玛姆·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Imam Ruhollah Khomeini）在 1980 年就警告说“我们的大学生已经受到西方毒化了。”他指责说太多的教授听从西方主子的指使为我们的学生“洗脑”。所以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



来制订伊斯兰化的课程，打算在四年后大学重新开放后实施。

但是伊朗大学继续讲授西方课程，西方著作的翻译比革命前出现得更多更快。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大量在西方留学的伊朗学者返回国内。政府当局对他们充满怀疑，禁止他们从事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一般来讲允许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伊朗大学的招生人数大幅度飙升，从革命前的大学适龄人口的 5%翻一番，在 1990 年达到 10%。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 30%，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增长尤其迅速。在 1976 年伊朗只有 27000 社会科学的学生，如今已经超过 50 万人。

哈贾里安在胁迫下所做的证言中说“今天，每个城市里的国立大学、自由大学、函授大学、私立大学都在忙着训练学生在这些领域获得更高的学位，根本不顾及不正确的内容。”

伊斯兰共和国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 (Ayatollah Ali Khamenei) 在今年 8 月对大学管理者的讲话中描述了社会科学大受欢迎是“令人担忧的”趋向。他说“许多人文科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和不相信神圣的伊斯兰教导的基础上的。大学里讲授这些学科将导致人们对宗教原则和信仰产生怀疑，持保留态度。”

哈梅内伊把教授描述为“软战争”前线的“指挥官”，伊朗强硬派使用“软战争”这个词来描述西方引导和组织伊朗青年的努力。他认为教授有责任教会学生避免西方影响，把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性讨论”限制在“安全环境下的可靠人物”中间。哈梅内伊说，否则可能面临“破坏社会环境”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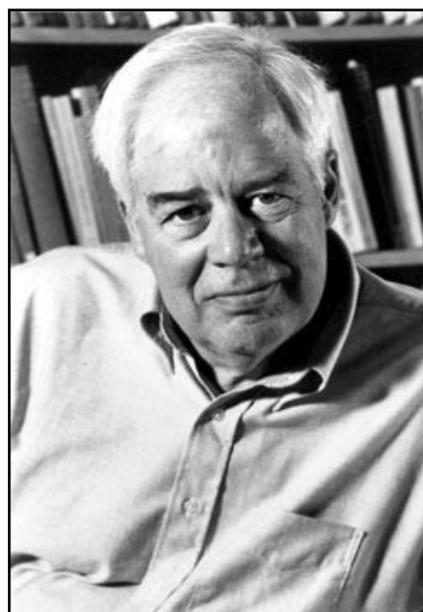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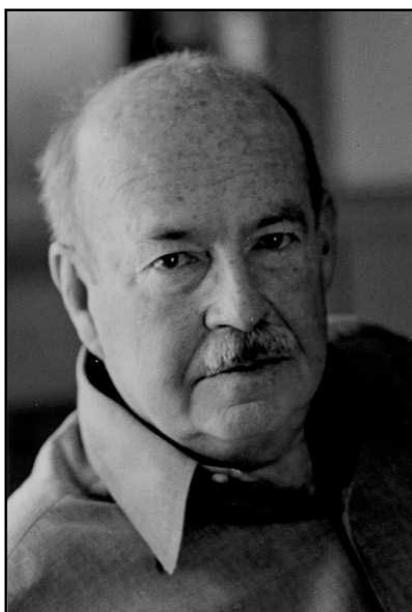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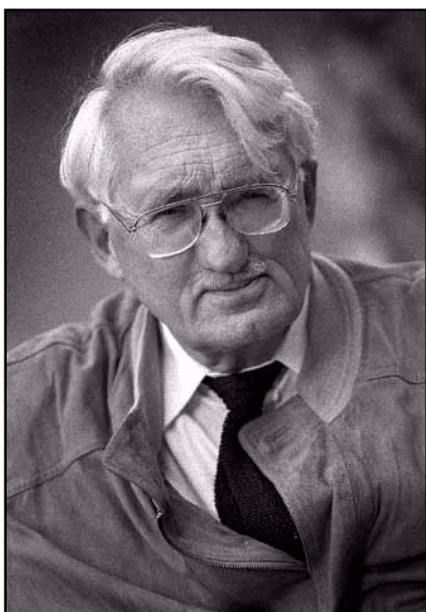
这种言论加剧了净化大学的呼吁，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严格审查。伊朗专家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之一阿亚图拉穆罕迈德·伊玛米·卡沙尼 (Ayatollah Mohammad Emami-Kashani) 在 9 月份的电视转播的大会上宣称“我们国家的大学不能用西方的模式讲授人文科学。”

被指责应该为伊朗的动荡负责的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一个人。其他社会科学家比如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约翰·基恩 (John Keane)、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和没有指名的女权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也被指责“威胁国家安全、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

把这群学者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是他们都相信独立于国家干涉之外的公民社会的存在是民主和人权发展的必须。这个观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独立的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流思想的空间。在公共空间软弱的地方，社会就更容易遭受国家的主宰，这个担忧是哈贝马斯从韦伯那里借鉴来的。

2002 年，哈贝马斯在改革派运动的一些崇拜者的邀请下来到德黑兰旅行。(在他的开场白中，摆样子公审的检察官实际上指控哈贝马斯的短暂访问是西方世俗化伊朗的阴谋的一个证据。) 伊朗许多社会科学家虽然笼统地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但批评他只依靠西方历史经验作为公共空间发展的基础。哈贝马斯在旅行期间一直倾听伊朗年轻知识分子提供的对公共领域的伊斯兰解释。正如哈贝马斯建议的那样，社会为了发展“理性的”公共话语就必须消除宗教性吗？西方的宗教宽容观念仅仅适用于基督教吗？传统的伊斯兰机构比如研究机构和慈善基金会能够为活跃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贡献力量吗？

尽管有这些不同意见，哈贝马斯的理论在伊朗受教育者中间仍然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反对国家对私生活的干预。哈贝马斯在德黑兰的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这或许是他演讲历史上遇到的最多的听众，他的观点进入了伊朗政治话语的中心。前总



统穆罕默德·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 和他的盟友把推动公民社会作为改革运动的中心任务。他的政府在 1997 年上台, 给予任何申请的出版社办报纸的许可证, 希望创造自由的媒体, 这个战略在强硬派司法部门逮捕、禁止和流放了国家的大部分独立出版社和记者后彻底崩溃。哈塔米政权允许网吧扩张以及私人拨号上网。今天, 伊朗人是世界上最多产的博客作家。

自哈塔米的第二任期在 2005 年终结后, 伊朗政府试图扭转他的改革。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2007 年的调查发现 43% 的受访者至少积极参加了一个公民社会组织, 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本地区其他国家。除了正式组织外, 非正式的群体还组织各种活动, 包括到伊拉克圣地朝拜的宗教活动。宗教信仰的这些自发表现开始取代国家举办的周五祈祷等官方活动, 它的参加者自 1979 年革命以来已经下降了三成。

公民生活的扩张吓坏了伊朗政府, 今年夏天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更加剧了政府的焦虑。当局已经炮制出了偏执狂阴谋理论, 把伊朗社会科学家和国际公民社会积极分子联系起来。

伊朗政府指责他们就像最近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黎巴嫩等地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那样试图在伊朗发动“天鹅绒革命”。强硬派伊朗报纸和网站引用了伊朗学者和欧美同行的每一次已知的或想象的接触, 无论多么友好的接触, 包括在西方大学和私立的基金会进行的研究资助或者访问研究。摆样子公审中的指控和被告在胁迫下的声明等都增添了更多令人想象的成分。伊朗同事告诉我可以期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申请者的增加, 因为研究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

伊朗社会科学家因为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和研究公共领域而受到骚扰和监禁。伊朗政府的目标似乎是不仅破坏公民社会的机构而且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本身。

“Reading Weber in Tehran” By Charles Kurzman, <http://chronicle.com/article/Social-Science-on-Trial-in/48949>

查尔斯·库兹曼 (Charles Kurzman),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教授, 著有《不可思议的伊朗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图 1 为伊朗著名战略家赛义德·哈贾里安 (Saeed Hajjarian), 图 2、3、4 分别为哈贝马斯、帕森斯和罗蒂

## SPEECH 演讲

### 东洋出版的秘密

时 间: 2009年11月22日

地 点: 上海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

主讲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mailto:postdadaist@gmail.com))

感谢今天在场各位能来到季风书园, 今天我就日本出版的情况展开漫谈式的观察。来到上海, 感觉温差很大, 这种温差不只是气温上的更是文化氛围上的。近年京城降雪频频, 而从媒体传出的各种消息看来, 北京的舆论气候可能比实际天气还要冷。但来到上海, 我却有了更多的温暖感。在京城, 自由派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后经常形成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峙的情绪, 但是在上海则全然没有。出版业内部问题重重, 让我们把焦虑的眼光暂时从国内投向海外, 思考一下邻国新闻出版做大的秘密、从技术性到制度性的原因, 思考一下其中哪些无法复制, 哪些是可以借鉴的。

众所周知, 日本是现代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出版工业作为一种产业是一种现代文明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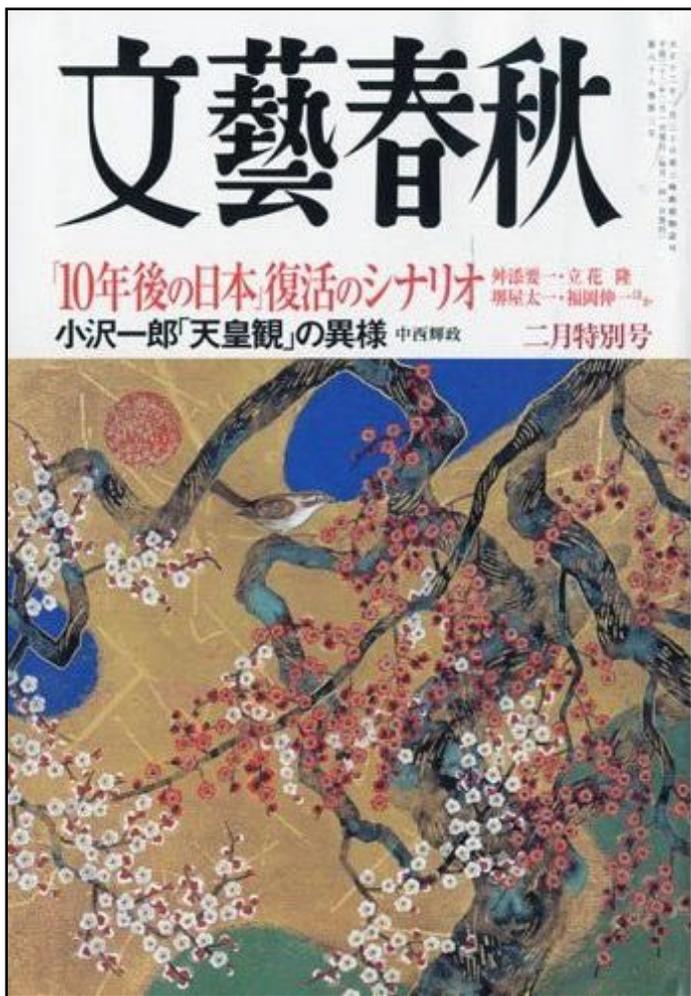


印刷技术、造纸工艺等在内的近代化成果，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化程度的一个反应，另一方面又反哺于这个社会。可以说出版业不仅创造了社会文化，还对塑造国民文化性格社会形态和酿造社会文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我就做一个简短的日本新闻出版漫谈。我将从四个方面谈一下出版业外围的互动机制：出版与传媒的互动、出版与评价激励机制、出版业的“东洋标准”、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保护意识。

我对出版观察范围实际上是包括纸质出版并且涵盖新闻媒体、创意与内容产业的大出版概念。越是传媒发达的国家，出版业的互动机制越明显。2004年《出版大崩溃》是日本资深出版家的畅销著作，在国内由甄西老师翻译出版后在出版业界不小的反响。2004年世界范围内出版业经历了一个冬天，但是仍有复兴态势，日本中国都是。业内很多人士都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效应对纸质出版业带来强大的冲击，但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反应其实有点过激。新媒体摧枯拉朽的态势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背后却又有出版人情绪化反应的一面。互联网可以作为出版的一个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对出版业形成了一种新的刺激，使某些传统出版资源得到激活，进而得到增值。

举个例子来说，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拉开引进海外纯文学作品的大幕。譬如有一本书，是日本著名新生代小说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风格冲淡，基调忧郁。这个作者是所谓“非特族”一员，也就是社会中的一个自由人。作为“下流社会”一分子，一个非特族在社会剧变中内心有着隐隐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忧，但同时又享受着自由的生活状态。她的这部小说评价很高，被誉为“日本版弗朗索瓦兹·萨冈”。她的小说最初是“Light novel”（轻小说），也就是以手机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日本的手机服务比较完善，用户只要注册缴费，服务方就会提供大量的内容供用户直接下载。她的小说经过手机媒介进行了第一次传播。而手机用户都是读者，所以这本书的受众相当广泛。但是手机小说并不是这本小说的最终形态，最终还是落地为纸媒出版。至少百万人通过手机知道了这个作者，这成为一个高效的广告。同时日本又是有读书传统与阅读习惯的民族，所以小说出版后，理所当然成了一部畅销小说。这是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激发。互联网驱动市场，蛋糕变大。虽然纸质出版并没有占到比以前更多的份额，但是市场蛋糕增大了不只一圈，所以从总量上来说不仅没有“崩溃”，而是相对发展，呈螺旋式上升。



### 出版与传媒的互动

日本人口在一亿两千万与一亿三千万之间，而日报的发行达到七千万到八千万份，计算下来各种刊物基本达到每天人手一报（刊）。在战后持续60年时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被传媒深度渗透与开发的国家。日本全国性报纸有五大《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除了上述全国性报纸外，还有三家跨区域报纸：《北海道日报》、《东京新闻》（下属《中日新闻》等四份报纸）和《西日本新闻》。各地方也有自己的报纸（各县的日报）。除此之外还有宗教团体报纸，像公明党系的最大核心组织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和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等等。可以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媒大国。日本的报纸大量刊载书刊广告，最昂贵的头版大多都是书籍广告，我这里有一些实物给大家展示。这有东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姜尚中教授发行六十余万册的销量新书《烦恼力》的广告；这是手机小说的广告；这里是一整版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广告；这里是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的广告，等等。这些发行量动辄上千万的主流报纸，以第一版乃至整版来做书刊广告在中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传媒出版不仅仅体现在广告上，还有内容选题的互动上。

几年前，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著作《検証戦争責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本书实际上是在 2005 年《读卖新闻》上连载一年，旨在检讨战争责任的大型历史问题长篇专栏的结集。而这个发行量在一千万份的大报无疑为书做了一个极好的广告。随后便推出单行本，然后中文版跟进。说起日本的杂志，书业中经常有“杂高书低”或“杂低书高”的说法，也就是出版社推出杂志，有时以杂志为主导，杂志带动书籍的销售，有时情况倒过来。但是书籍与杂志总是紧密联系的。日本杂志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有一百多种杂志，很多杂志都是“百年老店”，从战前就存在的杂志现在还在。鲁迅先生日记中所拉的书单子中的刊物，比如《中央公论》、《文艺春秋》杂志到现在仍然存在。

日本杂志按出版周期分为周刊与月刊。报纸从价格上来说相当于一听饮料，周刊相当于一杯咖啡，月刊则相当于一碗拉面。大报最严肃，周刊最娱乐，综合性刊物最学术。比如《东洋经济》，在地位上仅次于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而综合性杂志又称“论坛志”(Opinion 杂志)，内容是杂烩，从时评到著名专栏作家的虚构与非虚构连载并存。岩波书店的《世界》是纯粹的左翼刊物，而《中央公论》则相对保守；《文艺春秋》及产经新闻系的《正论》等属于右翼杂志。综合杂志格调相对学术化，有些像中国的学刊。日本主流社会的社会思潮与思想动向离不开这样的刊的舆论引导。这些杂志封面报道都是主打文章。比如平成皇室这个话题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关注，出版社会马上跟进寻找写手、知名作家和名记来操作。凭借传媒庞大的发行量，广告效应明摆着，所操作的选题确保形成眼球效应。在这种媒体-出版互动机制下操作的书，往往会比较容易畅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进入老龄社会，这在杂志与媒体上也有所表现：所谓“银色阅读”在日本国民阅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日本出现了面向高龄读者群定制发型的小众刊物，千册上下，定价高昂。这些杂志有特定的读者层，是富裕社会的奢侈品，订阅者虽然少但是绝对铁杆。比如一种叫做《Sight》的季刊，风格前卫，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日本朝日电视台有一台叫做“辩论到天亮”的深度辩论节目（曾做过关于中日关系的辩论），现场直播，由朝日签约金牌主持人、早大毕业的政论家田原总一郎主持。这个辩论节目让观众非常亢奋，经常邀请主流学者、辞职前任首相、现任防卫厅长官等做嘉宾，话题广泛深入。节目播出后单行马上本问世，很多都是畅销书。传媒与出版互动过程非常短，热播效应还没有消失，书就出来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传媒-出版互动机制，非常耐人寻味，似乎也预示了中国未来大出版的趋势与方向。

### 出版与评价激励机制

现在出版物可谓方方面面五色杂陈。作为出版界，需要对出版物有一个评价激励机制来引导大众阅读。在日本，主要的评价机制有两个：奖项与书评。纯文学奖、推理小说奖、非虚构奖、学术著作奖……大大小小的奖项有五百种以上，广泛认可则有十种以上。很多奖项战后一直在评，评奖过程程序公正透明，像我国的“长江学术奖”那样的乌龙事件绝少听说。并且这些奖项的影响力不是像茅盾文学奖仅限于极小的圈子。去年获得芥川奖的华裔女作家杨逸的小说《时间渗透的时空》，因涉及二十年前的八九事件，在国内无法介绍。她是获得芥川奖的非母语写作第一人，这无疑是一个崇高荣誉。

书评机制中，各大报刊的书评版是主要的形式。那么如何取舍对象呢？主要靠中立的书评委员会机制：每家大报延聘十位作家、学者，每位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术业有专攻。但作为书评委员则持第三者的中立客观立场，根据书籍本身的学术定位与学术价值提出自己的判断，写成书评，而书评的报酬不菲。《文艺春秋》的书评版“Book Club”篇幅并不大，但 1-2P 的书评据说稿酬可高达 6 万日元。

譬如，立花隆是《文艺春秋》记者出身的著名评论家。记者时代的立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1972 田中角荣深陷洛克希德事件黑金丑闻，立花对田中角荣的



“金脉”深度调研，并在《文艺春秋》以超大幅的篇幅发表，乃至田中角荣被拉下马。前几年，立花隆发现某中国学者的一本冷门话题的书籍，便在《文艺春秋》上发了篇书评，这本书的销售状况为之一变，冷门书甚至重新加印。日本出版的评价机制与书评机制，确实不失为对出版非常有效的激励，也是一种动力。

### 出版的“东洋标准”问题

我本人作为一个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来越大，异形本增多，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也不得不为藏书而犯愁。后来我进某家出版社工作之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资源浪费环保问题，对书价造成直接影响，造成出版业恶性循环。

日本出版史上，也过有这样的时期，好大喜功，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款暴发户争相用成套精装本书籍来装饰书柜的畸形的风气使然。但如今早已经移风易俗了，代之以开本小巧、装帧考究素雅的审美趣味，成为所谓现代出版业的“东洋标准”。我去东京神田、早稻田一代的旧书店淘过书，全集时代的图书是绝对的豪华版，不仅有皮面还有封套，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批量处理的对象。

主流出版物分为三种开本：单行本、“新书”本和文库本。这些版本除了尺寸上的区别还有功能上的分工。单行本基本相当于我国大三十二开，单行本出版三年后会出文库版。但是这个规则在近期也有所改变，因为读者越来越追求实用廉价，所以文库本会提早出版。“新书”版不是说内容上的“新”，它是大小介乎于三十二开本与文库本之间的尺寸，内容反映学术前沿信息，关注当下时事，多由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执笔。新书本尽量用大众传媒式的表达去专业化，旨在引起大众读者的关注，而且其价格非常便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日本最大的学术书店岩波书店旗下的经典文库本学术文丛，它非常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但是范围比后者还要广泛，可以说是古今“和”外，一网打尽。文库本精致小巧，易于携带，几乎可以看作是“口袋版”，我曾经在东京的电车上看见大学生口袋里装着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这种出版的“东洋标准”对学术普及繁荣真是功莫大焉。对这点，出版界的专业人士理应有所认识与借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日本出版业的“东洋标准”，其实最早也是从德国“拿来”的。中国出版社喜欢大而无当的开本，用棉度很厚的纸张，而且设计上也令人觉得面目可憎。我认为这些中国出版界的“恶趣味”，是出版的“敌人”。

### 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

中国读书为文的人总要和出版社、书商打交道。而中国作家（除了像王朔、易中天那种的当红明星作家），在和出版社交易的时候总是弱势群体，这种地位落差就像房地产业主面对房地产开发商一样。房地产业主接受公共服务与房产商打交道要通过物业公司，而在这个过程中业主往往都会有弱势的挫折感。我有一次开会时问甄西老师的译著《出版大崩溃》有没有卖过五万册，他给我的回答是上海三联根本没有告诉他实际印数。而据我所知，甄西老师当时是出版业最高责任部门——新闻出版署的官员。连他都如此挫折，遑论一般作者。很多写手都对与内地出版社打交道深感头痛。

在此说一个相反例子。我有一次偶然得到一本1994年版的日文版旧书，已经绝版，是我一个老师的著作。我问老师是否知道这本书，他说完全没听说过。于是我建议联系日本的出版方，讨回老师应得的权益。老师表示同意，并委托我全权办理。于是我按照书上的地址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不到一周就收到回复。出版社方面说书在出版的时候有人去北京试图与作者取得联系，译者还到当时作者的工作单位去过，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无从得知作者的下落（彼时作者正身陷囹圄），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先行出版。出版社表示一般译著的版税是6%，鉴于未事先知会作者而擅自先行付梓的事态，作为一种罚则的性质，他们愿提高一个百分点，按7%并实际印数来支付版税。老师表示满意，于是补签合同，不到一个月版税如期到账。中间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而且随后译者还专程赴京来看望作者并约定了下一本书的翻译事宜。两相比较，我痛感中国作家面对出身商时是如何的弱势。其实这种弱势的局面对出版人也未必有利，实际上损害的是书业本身。

以上就是我对东洋出版业的一点观察和思考，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

问：新媒体出版是谁在运作？

刘：出版行业说到底还是内容出版在支撑。新媒体出版是由手机公司与盛大这样的网站联手运作的，但是作品如何落地对于作者来说区别不是很大。手机出版商会通过签约机制签约一批写手，而签约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有效。但是这种产权不会有排他性的，这是一个包含关系，纸质出版仍然是最终的落地。今天中国在信息技术上意识比较超前，但是对著作权意识的稀薄，而在日本社会新媒体对纸媒著作权非常尊重。

问：请谈下有关盗版的现象。

刘：在日本盗版会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所以对于收益与风险的权衡后，基本会选择放弃盗版。这与其出版的自由化有关。中国之所以盗版很多，一个原因是因为审查不过关，而日本的出版审查制度从战后就没有了。

问：日本从战后开始到形成今天的阅读品味经历了多长时间？而中国出版业要做到像那么回事还有多长时间？

刘：预测是有很大风险的事情。如果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必然要论及日本社会史。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以百分之十速度的持续增长，这期间豪华本也就是所谓“最昂贵的壁纸”颇盛行。而经历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本土节约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小开本的雅致开始时尚化，客观上节约了空间，利于环保。从中国来讲，社会中间层的扩大将带来从思想意识到生活观念的提升，而这将成为对暴发户式恶趣味的直接摧毁。

日本出版业做大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消费社会成型后的现象。而此前主流出版社就已经相当了得，大正年代 1925 年前后是出版业的黄金时期。讲谈社杂志的繁荣从规模上相当了得，有的刊物甚至对上海滩都有相当影响。出版行业的工作者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在经济起飞后出版业得到了量上的支撑，这不只是纸质出版，还包括动漫，有的数据显示动漫产业已经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到 16%。而中国要经历的时间不好预测，因为传统出版所带来的技术性的优势整合是否会反而使激活机制启动仍然有待观望。

问：旧书店机制如何建立？

刘：这是我个人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以前最大的二手书店中国书店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中国旧书业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周作人的文章有这方面描述。旧书店的伙计骑着板车给北大清华的教授送书，教授淘汰的书，一个电话，伙计便上门去取。这个时期旧书的受众不大，但流通效率很高，处于一个买家与卖家交易非常温馨的时代。我每次去北京的潘家园，书摊在地上，被认为价值不菲的书上全是霉菌。而在日本旧书店里淘到的旧书，品质非常好。带图片的书有很多品相非常好，至少是卫生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深刻的一个问题，答案我也不知道。

苏小和：我也在纳闷为什么没有一个交易空间。似乎我们的市场没有对旧物的珍惜，在我们的城建空间上看不到过去，所以我们的城市中只有现在没有未来，因为我们的空间是速朽的。大凡是穷人不想再回到过去，所以选择扔掉再重新开始。这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一个痛苦的模式，中国的社会到如今还没有进入到精神传承的层面。

刘：福州路的旧书店比北京要温馨，品相也要好很多，大概是因为江浙一带的文化人的读书习惯比京城要好。但是大体上来说，书的品质等等各方面不敢恭维。我在孔网上买过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此书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感觉这简直就是霍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旧书业需要扎堆，而中国旧书的规模量不是很大。东京神田有很多百年老店，离学院知识消费机构比较近。北京那么大书店很分散，移动也是巨大成本，而城市行政官员文化这一块并不重视，所以在城市发展战略需要综合考量。

问：出版社定价的时候就准备打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日本七十年代书的价格是什么状况？

刘：日本旧书业的价格大致是合理的。大致有两个渠道：书店中实物和亚马逊网站——也就是去旧书店看实物权衡比较或者在网上预订。旧书的品相与价格基本成正比。书的价格与物价相关，日本旧书价格的形成基础是在高成长结束以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一次比较长的滞涨，到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日本经历的是与中国经济相反的过程——通缩。大的物价指数框架基本未变。书本身也是一个商品，日本的书没有经过中国近十年的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要素影响书价。两个国家的物价体系不尽相同，有可比性，但也有不可比性。

成庆：中国现在旧书业很不发达，但是十几年前，武汉的旧书店却很兴盛，我曾在那里淘过不少好书。我在波士顿时，感觉当地的书店经营者与读者已经形成了阅读默契，而在中国真的是把卖书作为一单生意来做。这其实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把阅读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开始严重萎缩，而书业并不是完全靠利润来支撑，因而造成书业无论新旧的困难局面。

问：现在中国出版行业中，读者认为书价很高，但是作者认为稿费很低，出版社工作人员认为收入很低。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局面？

刘：这个问题超越了出版本身的问题，应该从其他的层面寻求答案。中国的书已经不便宜了，而出版社却认为学术书与主流的文化刊物价格过低仍然有向上调价的空间，于是读者更加接受不了。考虑到日本读者消费能力，日本颇豪华的单行本也只是在 2000 日元上下，对读者并不造成很大负担。书价高低是与消费者的接受能力直接相关的，这是基于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物价指数也有关系。社科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可以以三百万重金打造一个学术出版项目，当然他们认为这个系列丛书是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由此看来这不是一个公平竞争前提下问题，而是一种权力的博弈，是资源的单向流动。就出版的自身而言，日本出版社敲定选题永远在环境较好的酒馆中进行，作家和出版社沟通选题一概由出版社买单，出版社方面有常年的接待费。中日出版业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水平有巨大不同，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个业内的朋友，从他得知如今出版业几乎是畅销书定位的书不能做的。中国出版了无数的畅销书，而所有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日本出版业有高度商业的一面，但同时它还有另一面，就是它拥有很多出版的百年老店，及非常精英化的编辑内容产业的生产者与策划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崇高。而文科院系毕业后，比较好的去处往往是出版机构媒体，而非大企业。出版之所以能作为一种“志业”而存在，其背后往往还有国家补偿机制的支撑。纯学术书的营销缺口用刊物来补，而各类学术刊物往往出增刊，这也就是所谓的“Mook”模式。对纯学术书籍出版社不会有码洋绩效要求（或降低这方面的指标），而在中国则受纯市场主义的制约。所以最终形成书店、出版社与作者三方都不满意，而这种状况将反作用于书业，造成恶性循环，从而伤害了中国长远的文化创造机制。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